

# 民主台湾

34



1984年3月1日



# 思 安 居

美國經濟在經過三十年代以後的最大衰退，終於復甦了。隨着美國市場的活潑，台灣的外銷也就直綫上昇。訂單源源而來，工廠加工，輿論對台灣的經濟又表現出樂觀欣喜之色。一、兩年前那種對台灣經濟悲觀的論調全都不見了。

經濟的復甦與成長，不僅帶給社會的繁榮、提高人民的生活，而且社會的財富增加了，較多的人可以不必汲汲於尋找工作或到處兼業，才能有餘力支持各種精神生活，有餘暇去從事文化活動，推動社會各方面的進步。近一、二十年來台灣的社會漸趨多元化，鄉土文學、雲門舞集、校園歌曲、山地服務、新寫實電影、出版界的蓬勃、學生主權意識，乃至於民主選舉活動的熱烈等等都呈現前所未有的活潑。細察這些變化，實與近一、二十年來台灣經濟的成長有密切關係。經濟的成長，實在是一個社會進步的基礎。

珍惜這些進步，格外令人關心這個進步的經濟基礎是否牢固。目前，台灣的經濟雖已開始復甦然而，復甦的源由乃因對美外銷的增加。基本上仍然是依賴外銷，依賴美國經濟的景氣。回顧一、兩年前，當時台灣的經濟由於美國經濟的衰退而遭遇到三十年來最大的經濟危機時，台灣朝野輿論也有人洞見這種依賴性經濟的隱憂，而進行較深刻的檢討。今天，台灣經濟雖然暫時離開了最艱困的厄境，但是這個基本的隱憂並未得到解決，反而被人遺忘了。台灣經濟對外依賴性不但沒有減弱，而且經由這次靠外銷來復甦的過程，依賴程度恐怕還是更上層樓呢。

然而，美國的經濟不可能沒有起伏起的成長下去。事實上，從一九七四年石油危機到一九八三年的十年內，美國已歷經三次經濟衰退。五、六十年代，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歷經戰後成長階段。由於這段成長歷時長，曾使人們樂觀地以為，美國經濟已擺脫了「成長—衰退」起伏循環的規律（第一屆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薩莫爾遜 P. Samuelson 便曾作過這種預言）。今天，已經沒有人再敢講這種「預言」了。經濟有起有落，已成為人們的「常識」了。

以美國經濟實力之鉅大，對經濟衰退都不敢掉以輕心（事實上，經濟衰退問題在過去十年是美國人民最關心的話題。眾所週知，卡特總統連選失敗，主要就敗在經濟問題上）。台灣經濟力量要比美國小很多，卻是這麼高度地依賴美國市場，這是很令人擔心的。

# 危談經濟

美國經濟不僅起伏波動，而且波動的幅度也是愈來愈大，最近這次衰退的程度，便是三十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後所僅見。未來情況會是怎樣呢？我們以為也不可太樂觀。至少有幾個因素，使得未來波動的幅度可能會增大：一、今天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體系，其規模範圍之龐大，是前所未有的。這不僅表現在美、日、西歐諸國生產力的空前提高與生產規模的空前龐大，還因為過去二、三十年來美國應用其政治影響力以及其他輔助性的工具，如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國際開發總署等等而干涉多數第三世界國家，打破這些國家的外匯管制，關稅等金融及經濟政策，從而將大部份第三世界國家納入國際資本主義，建立了一個空前龐大的世界性資本主義體系。然而，資本主義的經濟起伏，基本上是一個宏觀的經濟現象，是大規模生產、分配、銷售所產生的。規模的加大，孕含着波動幅度增強的可能性。

第二、地球是有限的，世界的資源與市場也是有限的。五、六十年代美國經濟的持續上升，基本上與當時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不斷地擴張相配合的。今天，這個擴張已近尾聲，生產力不斷提高，而市場卻不易再大量擴大，很顯然會造成嚴重的經濟危機。

第三、近十多年來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成立了各種原料產品及市場的合作組織（如石油出口國家組織OPEC以及各種區域性的共同市場），開始維護原料，初級產品的價格，並且保護本國的民族工業。當然，這個過程還很曲折，美日等國也不斷透過跨國公司，國際貸款等之方式企圖加強控制市場，價格等等。但總的來說，美國愈來愈不能如往日般對於世界各種原料予求予取。美國以世界百分之六的人口，消耗世界百分之四十的原料（平均而言）。這種有利地位在第三世界人民的覺醒與進一步要求掌握自己資源的時候，一定會減弱。

以上是我們初步觀察所得。當然，所有這些都是長期性的問題。然而，「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台灣近三十年來的經濟發展，一直欠缺長遠的考慮，五十年代似是要走「民生主義」的道路，六十年代以來則是緊跟美、日的後頭。但美、日經濟有些什麼問題則很少探討。這種盲目的發展實在該反省了。

居安思危，經濟對台灣有莫大的重要性。在此台灣經濟開始復甦之時，我們願「不合時宜」地提出一些擔心，希望能引起更多朋友來共同探討。

**評論****1** 居安思危談經濟／本社**瞭解台灣****6** 選後的平靜／近聞與短評**7** 台灣去來／艾伯里

報導選舉後台灣社會各面

**10** 台灣學生運動三十年(中)／速宇

保釣後、台灣學生運動在文化、社會及政治層面的發展

**17** 蔣介石違憲連任／陳漳生

從第一屆國大會議起，蔣介石每屆都有違憲行動

**22** 蔣總統不會作錯了決定吧？／「自由中國」社論

「自由中國」反對蔣介石修憲的歷史性文章

**23** 海外對總統三任問題的反應／方望思／原載「自由中國」**探討中國****5** 趙紫陽訪美與對台政策／近聞與短評**56** 再談了解中國／李哲夫

回復33期林中平的意見

**認識世界****26** 帝國之腦(五)／范棟譯介

介紹美國太上國務院——外交關係理事會

**思想****31** 第三世界經濟發展問題與區域整合的政治經濟學／林中平

從問題導向方法論分析第三世界及台灣的經濟

**41** 從波蘭獨立工運談起／高風

談工運的意義，並及解放神學的一些問題

**歷史****44** 台灣——美利堅合眾國的第三十二州或五十一州／卜今

回顧十九世紀美國對台企圖的一段歷史

**48** 清末台灣的一個考察(三)／戴國輝作／林真理譯

本期介紹洋務運動在台前期史

**駐家錄****58** 「黨外要照鏡」是烏文章／一讀者

寧人先生的回覆

**4** 編輯報告**43** 這是您的刊物(稿約)**59** 訂閱是最好的支持

# 編輯報告

經濟與民主運動，初看似是不相干的兩碼子事，實是有密切的關係。民主運動的成長，往往有其經濟的基礎。事實上，近代意義下的民主運動，主要是由於工業革命之後新興資產階級要求政權，以保障既得利益，並廢除封建時期各種阻礙資本主義生產的障礙而興起的。即以台灣的民主運動而言，七五年之後的空前蓬勃，也因為當時的新興資產階級的支持才發生的。可見民主運動深受經濟發展的影響。

另一方面，民主運動的目的，也常和推動經濟的發展有關。資產階級參加民主運動，主要就是透過立法及監督政府的方式，來獎勵投資、確保財產提高行政效率以更有效地服務工商業（即服務資本主義體系）等等，等等。工農階級，則希望透過選舉，保障他們就業權利，防止被過份剝削等等。知識份子支持民主運動，也常是看到了民主運動能夠推動社會的進步。除了提高生產力外，知識份子也往往較重視分配平均的問題，防止經濟上無形的手妨礙了人民的自由。

經濟與民主運動既有這麼密切關係，作為關心台灣，支持台灣民主運動者，對此當然不能忽視。

特別在台灣這種地方，在國際資本主義體系下尋求經濟發展，有許多複雜的問題存在。這許多複雜問題，在台灣很少會考慮到，今天，我們來到海外，有機會接觸更多消息與思潮，使我們可以擺脫在台時那種唯美國馬首是瞻的局限，更應當有責任來探討這些問題。

讀者將從「第三世界經濟發展與區域整合的政治經濟學」看到一個全新的視野。該文作者林中平先生讀者應不會陌生，他上一次批李敖等人人權觀的文章引起很多讀者的注意，他的深思、博學與獨創性，讀者可以從本文再次得到驗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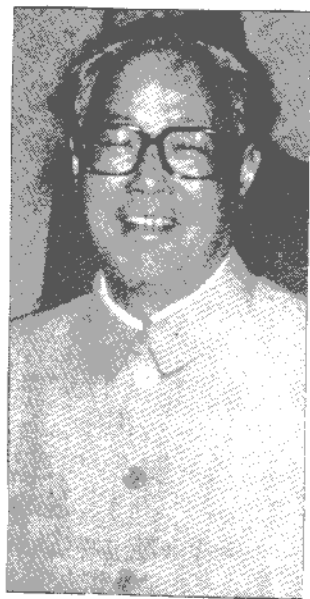
跳出框架看問題，是我們來到海外這個思想較自由的地區所應努力的方向。別讓我們人在海外，而腦袋仍在台灣。在台灣較少被注意的題材，便是我們要注意之處。我們一貫對帝國主義的討論與批判，便是基於這種編輯哲學。本期這方面文章仍有多篇，每篇各有其新的角度，都能引人深思。

台灣將面臨改選總統的過程。本期「三十年來台灣民間輿論選編」正好選錄了一九六〇年蔣介石修憲連任時，「自由中國」半月刊勸諫的文章。作者陳漳生的背景介紹追溯自第一次國民大會，當時蔣介石即已違憲。讀者還可以看到台灣這個政治之癥「法統」是怎麼產生的，如何演變的。

讀者將發現，上期本刊弄錯了一個地方，使兩面對調。「從國際關係看台灣問題」、「從波蘭獨立工運談起」及兩則讀者來書回答都應在上期刊出，限於篇幅，而主要是限於經費，無法擴版刊出。

我們的經費目前有了困難，這不僅影響一些文章不能及時刊出，也影響我們的出刊時間。上期較遲出版，就是因為經費不足，印好的刊物多放在印刷廠十天！因此，我們希望讀者的協助，請尚未訂閱的訂閱，或捐款、或介紹朋友訂閱。不管我們的主張正確與否，你不難發現我們嚴肅地在探討台灣問題。希望這樣一個難得的陣地能夠在大家共同關懷捐助下繼續成長。

# 趙紫陽訪美 與台灣問題



今年一月初趙紫陽總理訪問美國，曾引起台灣及海外華人普遍的關注。有關這方面的評論很多，其對於中美外交、國際戰略、中國國內影響，美國大選及外交政策等等方面，我們不擬多談。這裏我們較集中討論趙紫陽此行對台灣問題的影響。

趙紫陽在美有關台灣問題的言論，不出近幾年來中共政策之外，亦即繼續強調以國共和談來達成中國與台灣的統一，並允以維持台灣現狀。衆所週知，國民黨當局從未表示和談的意願。趙氏想必早已熟悉此情。故此次來美時，對國府之呼籲並未特別落力，他所倡言的和談，其聽衆顯係親國府或一般中間人士，以及美國民衆。其目的不外是爭取一般華人的同情，以及拉攏美國民間輿論使其促使美國政要不再阻礙國共和談。這些方面趙氏來訪無疑是有成果的，儘管此成果也不是什麼突破性的。

然而，作為台灣問題的主角——台灣人民，趙紫陽的訪問並未特別重視，而海外一般關心台灣前途人士及島中可以看到黨外言論也未見態度上轉變的跡象。這在一方面，反映出中共對於台灣人民的了解，尊重與重視程度都沒什麼變化。國、共和

談仍是中共對台政策的基石，台灣人民的力量在中共心目中還遠不足以與國民黨相比，而台灣人民爭取民主的鬥爭也未得到中共多少同情或支持。這表明台灣人民在爭取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力上，還要經過相當長一段堅苦的奮鬥，而國、共和談對台灣人民鬥爭，以目前所能看到的作用，仍將是負面的。

趙紫陽訪問之前，台灣黨外正歷經一次選舉席位上的失敗。這種「失敗」很容易予對台灣民主運動缺乏了解與同情者輕視台灣民主運動與台灣人民力量的藉口。另外，趙紫陽訪華府時，台獨人士前往示威。然而示威人士遠少於上次鄧小平來訪的示威人數，這將給中共認為台獨力量已在消退中，從而更容易促使中共與國府和談的決心。我們固不認為，海外台獨足以代表台灣人民的利益（他們的一些作法，例如遊說美國參議員，要美國來「決議」台灣的前途等，更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但我們更不認為，國民黨足以代表所有台灣人民。

趙紫陽訪美所表露的對台態度，再一次證明中共已失去其站在人民的立場與理想主義色彩，表露了中共現實主義的「威力」。在此「威力」下，台

灣人民的鬥爭無疑地還要經過一段艱苦的時期。然而，台灣的民主運動決不會一次的「失敗」就垮下來。相反地，這種「失敗」將逼使黨外人士更加努力。台灣還有更多中下層民衆，也都正在朝爭取自

己權力的方向曲折地發展。台灣的局勢是動態而充滿了各種活力的，台灣人民的努力終將有綻開花蕾的時候。



# 選舉後的平靜

選舉後的台灣看來相當平靜。黨外有幾份刊物（「前進廣場」、「生根週刊」等）被停刊，但這在台灣已不是大新聞。更多的黨外新刊物新出或重組（「前進時代」、「台灣年代」、「台灣時代」、「政治家」、「夏潮論壇」等等）。趙紫陽訪美雖引起國民黨的些微緊張，也並未發生重大的突破。向荷蘭購買潛艇計劃受挫，在台灣引起黨外一片檢討之聲，後來似乎也是不了了之。黨外一度籌組常設機構，作為建黨的雛形，也似乎未到成熟階段。

然而，這些看似平靜的外表，却是大決定或大變化的醞釀時期。黨外各方豪傑正在重新布署，刊物出多了，還有些路線也正在重新擬定中。康寧祥、許國泰這兩位最受注視的黨外人士何去何從，尚無明朗的表示，顯示還在檢討中。富有社會意識傳統的「夏潮論壇」傳聞也在調整方向中停刊三期。

而最大的決策將是在國民黨最高層領導人中進行。二月十四日召開的十二中全會將要決定下屆「總統、副總統」人選，這將影響國民黨領導繼承及權力分配的問題。在我們截稿時結果尚未知曉。

國民黨去年選舉的勝利使得蔣經國安排權力位置容易多了。然而，勝利容易使人自滿，更容易暴露一些平時小心翼翼地偽裝起來的真面目。例如，素以開明面貌出現的中國時報，近多月來的言論轉趨保守，這將有助一些人認清一些真相。

我們不願作太多高層人事安排的內幕報導或推論。往下紮根是民主運動的主要工作，在目前「平靜」氣氛下，更需要我們耐心而細緻去從事群眾的聯繫與對台灣社會等方面的研究工作。願與讀者共勉之。

艾伯里

# 台灣去來

對於久不曾回台灣的人來說，回台灣實在是一個奇異的經驗。並不是在太平洋上空感到近鄰情怯有何奇異，那是必然的情感反應。那種奇異的感覺最尖銳時，是走在湧擠的西門町到處都是人，甚至到中部的小城也可以感覺到人口密度一平方公里五百多人的壓力。奇異的是街道變得窄，城變小了。當朋友問起台灣有什麼改變？我忽然想起幾個最近一兩年才到台灣觀光的美國人，向我描述他們對台灣的印象時，我是如何的吃驚，以致於私下歸納他們的說詞是慣有的美國式誇張。如果我誠實回答他們的問題，我的朋友也會像我當初聽到外人描述台灣時，那麼吃驚的，像是活了這麼久，才第一次真的認識台灣。但事實是，大家討論過後，也一致認為台灣是一直在變的，或者如一般人愛講的；台灣也在進步。

講起來，街道並不是真的變窄，而是街道上的汽車很多，二綫道當三綫用，騎樓前還停滿了車子。在台北自行車幾乎已絕跡，摩托車也不似以前那麼多了。連中部小城汽車的使用很普遍，幾乎有店面的地方，門前都停有「私家車」。這個現象應該可以解釋成有錢的人更加富有了，汽車逐漸會成為家庭用品。以目前台灣五、六家汽車廠的年產量約五萬輛來講，一般人買部車都得排隊（尤其是裕隆出的專為計程車用的），可見台灣的汽車市場是有潛力的。而趙鐵頭一手促成的大汽車廠計劃，將來一年會供給至少十五萬輛豐田車來看，不是沒有道理的。問題是那來那麼多路面擺下那麼多車。台北在上下班時間，街上的混亂，湧擠，不親眼看到是難於相信的。開車的人都知道遵守秩序的重要，一個年青的計程車司機說，但是不能只是少數人守規矩，到頭來守規矩的人是混不到飯吃的。這是實情，台灣並沒有守規矩的物質基礎。雖然，交通警察連緊要關頭都溜掉了（計程車司機如此說），連十字路口車子真的開不動時，倒是碰到好幾次，計程車司機自己下來指揮交通，畢竟老百姓和官家來比是耗不起的。

也許和這幾年的不景氣有關，連街上常可看到

年輕人成群結隊的閒逛。這些年輕人貌不似學生，打扮更不像了。如果晚上在夜市碰到會以為是附近工廠的工人，在白天看到，自然會設想他們是無業的。這幾年工資固然上升了，但倒掉的工廠、公司行號也不少。當台灣官方口中直呼工業升級時，在美國北方以鋼鐵廠為重心的小城，所看到的集體失業現象，可能也將在台灣出現。經濟政策是一個問題，教育政策也是一個問題，在時代變遷間，總是有人會被犧牲掉的。粗淺的看，是會導致社會問題的，例如，犯罪率的上升，尤其竊盜。現在台北的公寓房子幾乎家家戶戶都裝上鐵窗，沒有遭過偷的應該是奇蹟了。想起多年前，林洋港、林鐵嘴剛接內政部時，曾大言不慚的說要在幾個月內讓「鐵門窗業」生意蕭條，笑話沒有大過於此的了。犯罪率的上升，也表現在台北街頭午夜的攔路搶劫。有個也才從美國回去探親的男士，就在聖誕夜給兩三個開着轎車的青年人拿着小刀，搜走了身上的錢。聽起來有些不可思議。台灣什麼時候也這麼進步了。

整個社會已呈露出一種脫序的現象，舊的道德日漸式微，而新的還沒成形。以前在路上，人被車子撞倒了，看看也就過去了。現在有的計程車司機看到摩托車騎士被撞倒，去旁邊看了高興不講，嘴



吧還咒着「給他死！給他死，撞死了活該！」講起來當然活該，摩托車經常在車縫邊鑽來鑽去，擋了路不講，有時還擦壞了車漆呢！下雨天，在寶慶路遠東百貨公司邊，一位五十來歲的男人，打傘從陸橋下來走進擺滿了地攤的騎樓，傘收得慢些，雨水淋了幾滴站在旁邊挑東西的中年太太，這個中年太太馬上扳起臉一手就往那男人打了過去。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是夫妻為點小事在吵架了。似乎每個人都脾氣暴躁，吃不得點虧，陌生人間除了彼此討厭之外，似乎還有仇恨。

---

#### 羅大佑的出現是必然的？

---

很難知道現在的年輕人在想什麼。不過連一九八四年來臨前夕，趕着去聽羅大佑演唱會的年輕人，却也不難猜想他們在想什麼。當然他們會想些愛情的事，想些年輕人的苦悶，也可能多少想些中華民國以後要怎麼辦。其實那個晚上不只年輕人去，社會人士，中年人也不少。而羅大佑在舞台上的表演，雖然沒有「The Rolling Stone」的Mick Jagger那麼狂野，却比Bob Dylan來得熱烈些。以英美的搖滾樂團演出來比，羅大佑的樂團當晚的演出是相當精彩的。好的不是台灣流行歌形式的搖滾化，而是內容的本土化。在他頗為工整的歌詞中，我們聽到與我們處境相關的聲音。有人說他是批判歌手，他歌詞引起的震撼，也可以詮釋為政治性的，或文化性的，或藝術性的，或生活性的。對台灣居民的耳朵來講，他的確是鄧麗君之外的另一種聲音，刺耳、尖銳、沒有空隙可以沈醉逃避。在一個平均國民所得美金兩千六百多元的社會裏，他的出現是必然的呢？還只是偶然的？

---

#### 沒有輸家的開放政策

---

講到流行歌，就不能不提去年的台灣電影。兒子的大玩偶雖然出過風波，戲院裏能看到的還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好。以國民黨的文藝管制政策來看，這部電影的確有太多問題了，例如我們台灣人的貧窮、愚昧、無知，竟然可能在三民主義下的新社會產生，這無疑是「為匪宣傳」了。但畢竟那是過去的事了，沒有過去的落後，怎麼可能顯示出今天的

進步呢？怎麼可能顯示出國民黨的德政呢？似乎是在這樣的認識下，這部電影才能過關。而這件風波除了暴露統治階級內部在面臨新時代時所產生的矛盾和由此引起的路線鬭爭外，實在是對這部電影的藝術成就無所傷害的。「兒子的大玩偶」以及黃春明另一部小說「看海的日子」得予製作成電影，並非是偶然的。若非台灣電影已到窮途末路了，若非宋楚瑜看到電影可以在世界各地抵擋中共的電影外交，宣傳價值非常之高（李寧也這樣認為的），國民黨的電影政策是不可能這麼大幅度改變的。當然，這項開放政策的結果，沒有人成為輸家。表面的印象是國民黨更開朗了，更進步了。如果勉強要講，誰輸了的話，那是黨外在十二月的立委選舉中，輸掉了一半的席次。

---

#### 配票、買票與組織戰

---

以「後見之明」來看，康寧祥的落選是必然的。但是事前有誰敢這麼無知的猜測呢？而許國泰的落選，無疑也是個意外，不過據說國民黨桃園縣黨部主委，在選舉前夕去許國泰總部請教，臨走前丟下一句話，說許國泰的實力當在五萬來票，上不到六萬。如果早兩個禮拜前，這還可以想法補救。開出來的票；果然也沒上到六萬。而國民黨提名的和報備獲准的，其當選票數都在伯仲之間。配票配得這麼精確，應該是國民黨這次大勝的主因。在台北區，據說關中動員了十幾萬人，作準確的市場調查。在投票當天下午，勝負已經見曉了。此一說固然嫌誇張，例如動員人數據國民黨自己估計也沒那麼多。但可以確定的是，國民黨在打組織戰的能力，以及收集選民動態的情報的能力，均已進步到，不須靠作票的水平了。除了台南高李麗珍的案子之外，北部落選的黨外，沒有人指責國民黨作票。民間也甚少此項傳聞。只是不公開的買票，倒是大家都在談的。例如，蔡辰洲可能花了二億五千萬，自己在國泰企業員工間以各種名義發放獎金。高忠信花了一億。如果金錢能買得了選民的支持，台灣選民的政治覺悟似乎還是有利國民黨維持目前一黨統治的局面，而國民黨對於台灣現狀的掌握及了解，在策略及技術上的操作，也有它精明的一面，不只跟着台灣社會的風潮在動，而且常能擊中要點，使台灣社會的動向由其左右。

# 台灣學生運動卅年

## 保釣運動以後的多元化運動

「六一七」大遊行以後，保釣運動的高潮，表面上似乎已逐漸消沉，但經由這個運動所提昇的政治意識並未消失。學生們開始關心中國與台灣的未來，關心台灣的政治體制，進軍社會服務、介入選舉，致力於台灣的民主化運動。台灣的學生運動多元化，活潑了。然而運動的消長絕不可能隔離於當時的社會、文化、思潮。本文的後半部將從文化、社會和政治三個層面，介紹和討論受學生運動影響下的各種運動。

六〇年代迷失於存在主義，現代文學的慘綠少年們，在百老匯、凱旋門遊蕩了幾年後，終於覺悟「根」的重要性，在七〇年代初回歸鄉土了。

## 理想主義在消失

當然，政治對台灣百姓來說，除了選舉期間，日常生活會受其影響之外。平時的生活裏，賺錢是主要的大事。工人賺錢為一口飯，商人賺錢為利潤，白領階級賺錢是為了儲蓄，買下一棟房子。賺錢是很正經的工作。連黨外的新生代聽說出來幫人競選，也講價錢的。理想主義色彩的消失，可能會使黨外推動的民主化運動，走向另一個方向。這條新的路，可能使民主化運動成為爭取利益再分配的口號，提高了參與運動的報酬，可能吸引更多騎牆的中產階級介入，使得政治運動與經濟基礎掛鉤，而

## 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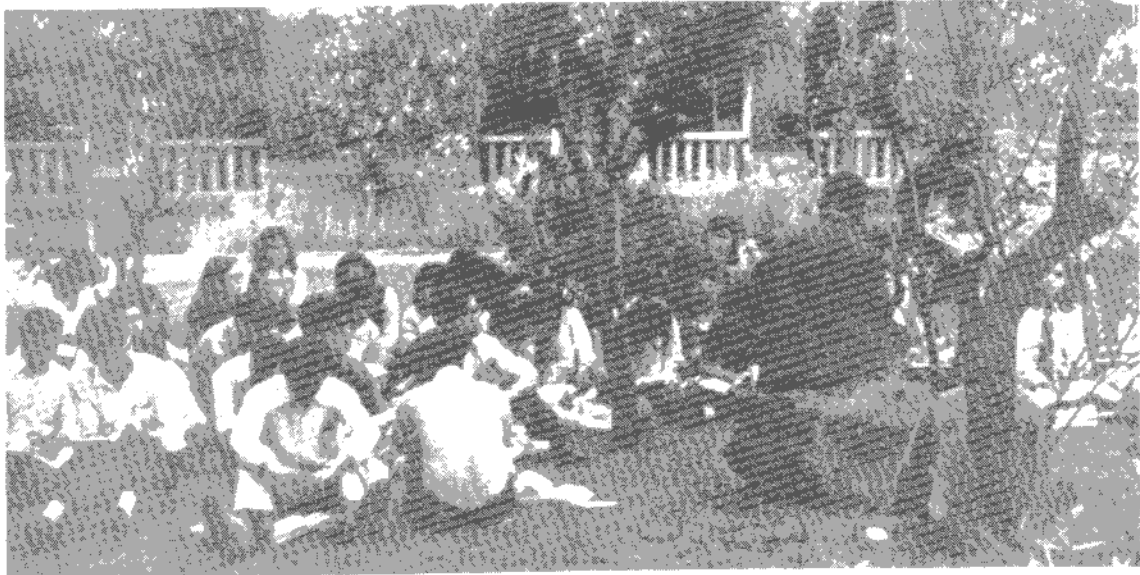
### 1 雲門舞集與鄉土戲劇

舞蹈方面，林懷民率領了一批青年學生，創辦「雲門舞集」，將傳統平劇、地方戲劇與西方現代舞蹈結合，在一片西化聲中，將青年人的注意力逐漸扭轉回台灣本土的藝術。

王禎和是一位很有批判力的鄉土作家，他在「望你早歸」中，探討台灣農村的羅漢腳（無依無靠的老單身漢），流落在大都市內出賣勞力，過著有今日不知是否有明日的淒慘生活。一九七七年，耕莘文教院的實驗劇團演出「望你早歸」。為求逼真，劇中對白保留了許多原始、土氣的台語。這是自新劇絕跡後，二十餘年來首次的寫實台語話劇公演，而且演出者大多為在學大專青年。

與台灣現況更為貼近。在一個沒有理論指導的改革運動過程中，理想會逐漸消失，妥協的性格也會出現的。握有三分之一的選票，如果也可以控制三分之一的資源，那麼妥協在台灣目前的政治操作中，也多少有民主的意義。問題是，妥協了之後，什麼也沒有，那麼意義在那裏呢？

最後，應該講的是，對於在家鄉辛勤工作的同胞，一個以局外人身份所做的任何觀察，分析，都含有一個旁觀者慣有的基本謬誤（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這些謬誤，不能也不應該解釋為惡意的。當然，避免這些謬誤的發生，便是回到台灣定居，以局內人的角度來看自己的事，相信那不會是很愉快的事，但是有什麼比這個更重要呢？



## 2 唱我們的歌

史惟亮和許常惠很早便默默地從事台灣民歌和山地歌謠的採集，可惜大家並未注意，西洋熱門歌曲仍然主宰台灣青年學生音樂活動。尤其是廣電台每晚播放的「西洋熱門音樂排行榜」，更成了青年人的流行話題，連主持人陶曉清也成了青年偶像。

一九七六年，在陶曉清主持的一場熱門音樂演唱會中，浪迹異國甫自歸來的李雙澤（註二），手持著可口可樂，背著吉它，走上台去指責陶曉清多年來從事文化買辦，精神鴉片中國青年。他要求大家同聲齊唱「總理紀念歌」。有人報以噓聲，有人熱淚盈眶，掌聲不絕。原在餐廳駐唱西洋歌曲的楊祖珺（當時為淡江外文系學生），受了感動，從此不唱西洋歌曲。跟隨淡江學生在校園內的草坪舉辦了第一次「唱我們的歌」戶外演唱會。美麗島、少年中國、紅毛城等清新的中國新民歌立即傳遍了台北各校園。大勢所趨下，陶曉清亦開始播放中國歌曲，金韻獎、校園歌曲、現代民歌等取代了原有的西洋熱門音樂，然而當局竟因楊祖珺與王津平的師生關係，嚴禁她公開演唱，並力捧包美聖、蔡琴等其他民歌手，現代民歌的老祖宗反而被埋沒了。

然而，具有批判精神的民歌手不會永遠沉寂下來的。楊祖珺從事幾年社會工作後，八三年的立委選舉，她以歌聲、玫瑰和愛為標幟，投入台北市的選戰，展開台灣的「綠黨」活動。羅大佑，畢業於台北醫學院的年輕醫師，脫下白衫，披上代表叛逆

的黑衣，用他嘶啞的嗓子譏笑孔老夫子的「之乎者也」，批判傳統的假道學，感嘆現代青年的無力。新作「亞細亞孤兒」更公然地批評台灣的白色恐怖，深獲台灣年輕人的喜愛。在楊祖珺競選中，羅大佑也上台助選。

## 3 鄉土文學運動

五、六十年代的台灣文學界籠罩在反共文藝、西化文藝以及鴛鴦蝴蝶派文藝中。這三類文藝，基本上都是在逃避現實，麻痺讀者對現實問題的關懷。釣魚台運動把人們的注意力拉回現實中，學生開始不滿意瓊瑤的小說或惡性西化的文學。於是在六十年代初期，被主張全盤西化的文星所捧起來的余光中、白先勇等人的作品，開始遭到學生及年輕讀者的批判與唾棄。相對的，以關懷台灣現況、描寫中、下層人物的鄉土文學，開始受到廣大讀者的注意。

鄉土文學並不是自那時才開始的。早在日據時代，許多台灣文人為反抗日本的殖民統治，便常以鄉土文學的方式表達他們的抗議與鬥爭。但這早期的鄉土文學在國民黨政權來台初期，受到更悲慘的迫害。二·二八事件以及一九五〇年代初期的大逮捕，使許多鄉土文學作家死的死，逃的逃，坐牢的坐牢。這段鄉土文學的香火在五〇年代便被撲滅了。直到六〇年代，林海音主編的聯合副刊逐漸刊登殘存的一些舊鄉土作家的作品，然而終究不能匯為文學巨流。

D調 3/4

1 : 3 - 3 | 2 5 2 | 1 - 1 | 6 - 0 6 | 5 - 7 | 7 2 4 | 6 - 5 1 |

我們 搖籃的 美麗島 是 母親 溫暖的 懷抱  
 婆婆 無邊的 太平洋 懷抱著 自由的 土地

1 : 3 - 3 3 | 2 5 2 | 1 - 1 | 6 - 1 | 5 7 2 | 4 3 2 | 2 - 7 | 1 - 1 1 |

驕傲的 祖先們 正 視 著 正 視 著 我們的 腳 步 他們  
 溫暖的 陽 光 照 耀 著 照 耀 著 高山和 田 園 我們

1 - 1 1 | 1 2 1 | 1 - 1 | 5 - 1 | 7 - 7 | 7 - 2 | 1 - 5 | 5 5 5 |

李雙澤 「唱我們的歌」



## 新歌大家唱！

李雙澤紀念基金會

1977年

六〇年代末期，台灣因為出口導向經濟急速膨脹，農村衰退，人口從農村大量流向都市，巨型變遷中暴露了許多社會不合理、不正義的一面，而成爲一批年輕作家寫作的題材。他們默默地耕耘到了七十年代初期終於綻放出倍受人注目的花朵。釣運喚醒年輕人對身邊社會的關懷，於是反映社會的鄉土文學便受到年輕知識份子的歡迎。鄉土文學流行起來，逐漸取代了西化的現代文學派。

鄉土文學的流行，喚醒了人們的社會意識，這自然是當局所不樂於看到的；而它搶走了部份文藝市場，更使一些反共及西化派文人恐慌。七七年間，彭歌、余光中、尹雪曼等人爲首，大呼「狼來了」，給鄉土文學戴紅帽子，企圖扼殺鄉土文學運動。然而，一個運動一旦爲社會大眾所接受，而且如果它反映了社會的真實且從之得到養份，將是很難被扼殺的。戴帽子最多只使當時正在熱烈進行的文學理論論戰停止，却未能使鄉土文學的創作中斷。相反地，政治的干預反而使人們看清政治與文學的關係。鄉土文學作家，如王拓、楊青矗，從文學中的關懷社會、改革社會，終於躍進到政治改革運動中。

文學、藝術、音樂的中國化、草根化，使形而上的文化落實在鄉土、社會層面，影響了更多的青年認同、關懷自己的鄉土。

### 社會運動

#### 1. 向社會進軍

王杏慶（註三）曾參與大學新聞、台大青年的編輯工作，保釣運動中，是一位關懷時代與社會，肯思考的學生領袖，鑑於家園多難，他放棄留美獎學金，留在台灣與社會結合，獲得當時台大代聯會主席王復蘇的支持，在一九七二年初成立「社會服務團」，利用寒假展開調查工作，調查農村問題、都市貧民、警民關係、勞工問題和地方選舉的民衆反應，原本計劃在工作結束後，收錄所有的工作報告，出版專輯。可惜因諸種因素，調查報告始終未見公佈，但此行動已首開大專學生參與社會服務的風氣。

一九七二年十月，接任的台大代聯會主席謝復生喊出「百萬小時奉獻運動」，要求台大學生每週奉獻二小時，到十字路口、鄉村、工廠爲廣大社會基礎民衆服務，在暑假期間並派出九隊服務隊下鄉服務。可惜這一個活動並未在台大獲得廣大和長久性的支持，不過台大的口號却影響了其他學校。各大學內服務性的社團紛紛成立，例如台大的「慈幼社」，政大的「愛愛社」，輔大的「仁愛社」，東海的「工作營」，清華的「科學服務」，淡江的「樸毅社」……。除了淡江的「樸毅社」曾揭發一件山地人口販賣案（註四）而引起社會注意外，其他的服務社團只停留於愛心活動。但較諸將時間消耗在舞會、彈子房，縱使是流於形式的社會服務也是一大進步。

#### 2. 百達山地服務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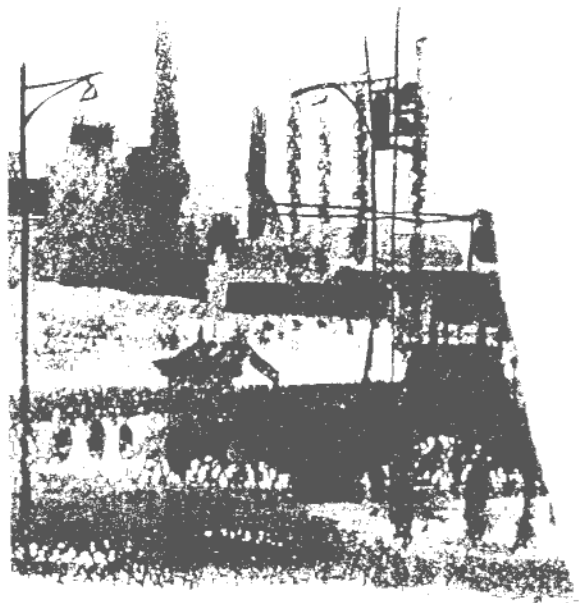
# 楊青矗 工廠

一九七三年春天，就讀於高雄醫學院的陳永興（註五），召集了分散在各大專院校的舊日台南一中同窗，成立百達山地服務團。他們選擇海拔高、交通不便的屏東霧台鄉，有計劃地展開長期的服務工作，十餘年而未間斷。他們服務的項目包括醫療、衛生教育、農業指導、組織山地人才……。陳永興並不斷在報章雜誌發表文章，討論各種山地社會問題。大學生們雖有熱情，但往往是口號叫得震天響，做事只有五分鐘熱度，尤其參與服務工作，也有不少是公子、小姐們的玩票性質，但百達山地服務團十幾年持久性地服務山胞，證明了台灣仍有一些紮實、誠懇的大學生。陳永興後來也參與黨外活動。去年他又出來接辦歷史悠久的「台灣文藝」。

### 3. 新女性主義

六〇年代是美國婦女運動緊鑼密鼓的時期，在美國伊州恭逢其盛的呂秀蓮，返台後，一九七一年十月在聯合副刊發表「傳統的男女角色」，鼓吹新女性主義，向傳統不合理的思想挑戰，隨後呂秀蓮和其友人又成立拓荒者出版社，出書討論男女問題，在學的大專青年首先響應，很快地便漫及已婚的婦女。雖然自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的婦女已爭取到入學求知的平等權，但傳統的框架使多數女學子的視野狹窄到——讀書爲了拿文憑，當嫁粧；應對有理，只爲了待價而沽，釣金龜婿，組成家庭後，女性多退居第二線，相夫教子。這是人力上的一大浪費。新女性主義的倡導者，呼籲婦女們「先考慮當一個人，再考慮當女人」，主張權利、義務平等、男女同甘共苦。對於屈服在「男主外、女主內」傳統信條已久的中國婦女，這是再一次的思想解放。而新女性成員公開討論娼妓問題、關心農工婦女。這對於一向被保護得像小公主般的大專女同學，更是一大震撼。

除了思想傳播外，新女性主義者更進一步從事具體的社會服務工作——設立「保護你」專線。由幾十位學有專長的婦女義工，爲不幸被遺棄或強暴的婦女，提供必要的法律、醫療、心理和安全服務。然而設在台北和高雄的「保護你」專線却不斷受到當政者的壓力，並強迫減少服務時間。屢經挫折後，呂秀蓮意識到——唯有政治改革才能帶動社會



鄉土文學的流行，喚醒了人們的社會意識

改革，於是一九七八年的選舉，呂秀蓮投入增額國民代表選舉，七九年因美矚島事件而下獄。

### 政治

#### 1. 蔣經國接班與言論開放

七〇年代初期，台灣的言論突然開放了，青年們熱烈問政，這固然與保釣運動所掀起的政治熱潮有關，另一方面却因是蔣經國接班的權術利用。

國民黨來台後，蔣介石鑑於大陸慘敗之際，他的親信部屬紛紛逃跑投降，不肯爲他盡忠死節，於是積極培植自己兒子蔣經國爲繼承人。在蔣中正的呵護下，他以非軍人身份歷任國防部總政治主任，國防部副、正部長。在一九六九年，他被任命爲行政院副院長後，接班的跡象便更明顯了。這種「家天下」的權力轉移，自是令許多黨國元老不服。於是蔣經國便暢言革新，開放言論自由。授意大學雜誌改組，納入許多自由主義學者和台大在學青年，

# 再論學生運動

陳鼓應 著

民主廣場及其他  
談談言論自由  
我對韓國學潮處理方式的看法  
保障基本人權  
開放學生運動  
再論學生運動  
學生的權利與義務

陳鼓應呼籲「開放學生運動」

利用他們提出改革的要求，來向元老派們開刀。在一九七〇年至七三年間，大學雜誌的言論，空前地活潑。後來蔣經國目的已達，大學雜誌緊縮，幾度「改組」之後，又回到死氣沉沉的原狀。但一部份有良知的成員，經過這段被利用的經歷後，便投入民主運動洪流中。

## 2 民主之春在台大

保釣運動發起時，當時台大代聯會主席李大維，態度軟弱保守，事事都必須請示校方，於是各社團負責人聯合組成台大保釣委員會，才有「六一七」大遊行的誕生。鑑於李大維的無能，王復蘇以「全校普選代聯會主席」，「接管學生活動中心」，「爭取言論自由」為政見，在七一年九月當選為台大代聯會第一位黨外主席。王復蘇任內非常積極，針對國是，發表了幾篇宣言；並發動「社會服務團」。校內自治方面，代聯會通過「台大學生聯合章程」，普選學聯會主席。但是校方駁回章程，並發動流言攻擊王復蘇。

這時期的台大校園，民主波濤澎湃洶湧。七一年十月，法學院舉辦「言論自由在台大」的座談會

，法代會散發傳單，指出台大言論四大不自由。會後，情治單位約談學生，當時的代訓導長張德溥代學生們承擔責任，他自己日後却因而失勢。同年十一月，法代會又舉辦「民主生活在台大」座談會，會中陳鼓應呼籲「開放學生運動」。七二年一月大學雜誌刊登陳鼓應「開放學生運動」的演講全文，四個月後，中央日報連著六日刊載「一個小市民的

良暗示我們青年：要關心國事，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豈非「未恰當」之失言？這種堅定民心，駁斥敗北，異化之風氣的重大事情，都不能談，那還有什麼可以談的呢？「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我輩青年學生，平日食用皆取於這個社會，一旦有事，豈能不略盡微薄之力於這個應待關愛的社會、國家？若說這些都「未恰當」，誠令我們今後不知手足將何以措置！

白其餘三位本組未聯絡上之看法：  
此次座談會列席指導的三位先生已經首肯願意蒞臨指導，這是由學生負責去聯繫，本與課外活動組率不上關係；也不干系主任調導長的職責與尊嚴。如果說要求召他們三位出席情形，事前已由同學提供聯絡的電話號碼，可詢問之，即知是否出席；以及事後學生是報上去的會議記錄亦可知之。雖不成上述的三位先生，行徑乖違，必須先判調導處簽名報到嗎？

又查本校歷來的活動舉行情形，亦無此前例可循。故不論如何，調導單位實無法可據，無理可講，而制止此次愛國座談會的舉辦。  
了，我們沉重悲痛的心聲：

失去家園的人是可憐的，而失去國家的人更是可悲復可恨！此所以以色列亡國二千餘年後所激發的臥薪嚐膽之壯志，雖因強敵環伺四周，而未遭併吞之由也。「覆巢之下，無完卵」此為賢人志士一再實於人民之大義；我總統蔣公亦勉吾儕：「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乘上述之訓示，我青年自應關心國事，發揚中國歷來愛國志士為保民族、救亡圖存奮勇邁進之精神。系何初次展示吾人關切國家憂患之赤誠心意，即遭王訓導長與周主任兩位先生之制止，使我輩青年愛國熱忱無從傾注，激湧的熱血，如被棄置於廢冰荒雪裏！誠令我等哀痛傷心至極，

在哭訴無著之際，痛仰其委由于  
鈞長 務使愛國意識高展伸張，而阻遏此愛國意識者，得到應得之懲罰。  
。是為國家民族之幸，人民之福！

謹呈

負責人：蔡...  
江文...  
周威仲(史三) 蔡...  
李... 高敏雄(曹三) 林...  
13

心聲」，作者署名「孤影」（註五），主張苟安度日、不問時事，並大力反對學生運動。中央日報印發單行本，大量贈送，並發動各機關學校晨讀此文。這是官方對主張學生運動者的公開打擊。國民黨大張旗鼓的圍攻，反而激起人們的反感。當時大學雜誌言論尚未完全緊縮，便刊登了許多反對的意見。台中藍燈出版社出了一個小冊子「也是一個小市民的心聲」，作者獨人先生以大量的社會現實問題，反擊「孤影」粉飾太平的說詞，引起廣泛的共鳴。「獨人」的文章在海外「釣魚台快訊」轉載，對海外留學生運動關心鄉土，了解台灣也有推進之功。

緊接「言論自由在台大」座談會之後，同年十二月台大法代會又舉辦「中央民意代表改選辯論」，由陳少廷與周道濟對辯，陳主張全面改選，周則另提方案以維護法統。這個辯論的產生，自然與蔣經國打擊元老派以便接班的背景有關，因為元老派多數在萬年中央民意代表內。然而，國民黨當局（包括蔣經國在內）並無誠心全面改革。故辯論會中陳少廷理直氣壯，佔盡上風，事後國民黨採用的却接近周道濟的主張。雖然如此，三千多學生的參與以及事後校園各刊物的熱烈討論却使台大學生上了一堂極寶貴的政治課。後來台大出了多位黨外新生代，與此不無關係。

七二年六月，蔣經國就任行政院長，接班工作大勢已定，於是言論再度緊縮。七三年二月初，陳鼓應、王曉波和錢永祥等台大師生被警總逮捕，理由是這幾人聆聽陳省三訪大陸的錄音帶（註六）。二十四小時後，這幾人雖然獲釋，陳鼓應却從此不能教書，不能公開演講，發表文章。七四年春，台大哲學系再度發生大變化，十幾位較有理想的教師同時被解聘。一度活躍，有朝氣的台大校園自此歸於啞寂，舞會、郊遊又主宰了大學生。繼任的代聯會主席竟在蔣中正去逝時，攀龍附鳳地發起「獻機報國」運動，然而將近八千萬元的捐款却被教育部和國防部不明不白地「處理」掉了。一向秉持理想的台大學生領袖，由此首開投機、鑽營的風氣。

### 3 成大事件

遠在台南的成功大學有一個歷史悠久的社團——Σ社（按Σ是希臘字母），以建築系的學生為主幹，社員們有人辦雜誌，有人參與選舉，幫蘇南成競選。七〇年前後，Σ社的社員，有人被「逼」轉學至淡江文理學院，於是兩校的學生便串連上了，會就讀於空軍幼校的成大學生蔡俊軍在圖書館內閱讀「資本論」而思想左傾。他的影響並擴大至淡江

#### 淡江學生發起「雙重國籍座談會」

陳 雷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五月廿六日

茲為本社擬舉辦「國人在外設籍設產」之愛國座談會，無端遭受本校（淡江文理學院）調停單位之制止乙案，分條申訴詳情於后：

甲、為何舉辦此次座談會？

古云：國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緣此可知心之左右吾人之行動至巨矣。故 國父蓋心建國為五大建設之首。聲 總統府公昭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之反攻復國指針。皆足證實：一個國家的興衰，是深繫於國民精神的昂揚或是萎靡。近歲，黨中央每逢重大集會必呼籲國人勿因安適的物質生活而腐蝕了我們反共建國的精神意志；其對於心理建設的重視，可足令吾人替惕而互勉共勉！

近聞立法委員莫宜元、楊登洲兩位先生在三月四日分別提出施政質詢：據來自海外消息，我們此地有不少黨政軍高幹幹部、民意代表、工商及文化鉅子，在國外置產設籍等。「顯然是對反共復國缺乏信心；」這股歪風如不及時遏阻，任其發展滋蔓，必將導致友邦人士之輕視，影響民心士氣，莫此為甚！「我等本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之憂時憂國精神，遂舉辦此次座談會，藉著三位列席先生——立學莫宜元、律師林勝球及報人兼政論家德樹樹之指導，使我們更進一步鬥心、愛護我們這個國家，進而壯志建國，使時代所賦予我們青年、的神聖使命；光復國土，重建三民主義之新中國，得以在短暫的期間內，欣見其成！是為擬辦之緣由。

乙、調停單位制止之理由：

此次座談會原於五月二十日獲得課外活動組周宗賢主任之批准，再呈到訓導主任王久烈先生處時，即遭阻撓。俟二十一日即由王訓導長傳言于周主任：停止此次座談會之召開。而王訓導長並以此「不准」之理由，隨即避而往。此一愛國座談會，遂告流產。至二十三日，適遇見周主任，又報告以不准召開之事，並當面詢及其先前准辦之意見。其則改爲不獲的理由是：

（一）崔德禮先生已來電話表示不能來。

（二）論題未恰當。

（三）其餘三位本組未聯絡上。

丙、我們對制止事辦理的意見：

（一）對崔先生（知青蘇部書記長）不能來，即不能舉辦之意見：

崔書記長先前曾答應我們：他本人很樂意來參加此次「強心理建設」方面的座談會，不過可能會稍晚到場。詎知二十一日，電告於學校：謂其當日有事，不能前來列席指導云云。我們的疑問：

1 難道崔書記長因事不能前來，就不能舉辦座談會嗎？

2 其他三位先生雖通身份事或成不合法，致不能列席指導座談會？

（二）論題未恰當之看法

何謂「未恰當」呢？是學生不能談這個問題嗎？果若如此，那府院

校園。最後因調查局派遣「細胞」滲透，在七一年底而告案發，被判刑學生包括成大、淡江、輔大、文化、空軍官校的學生，有殷商的兒子，亦有外交官的家屬。他們在獄中並不「悔改」，有人十年刑滿，出獄後立即投入黨外活動，高壓政策無法扭轉他們對國民黨的認識。

---

#### 4. 淡江校園覺醒了！

---

在美國主修黑人文學，並接受海外中國學生運動洗禮的王津平，在七五年回到他的母校，淡江外文系任教，淡江原是一個替有錢人子弟開後門的半學店，學生活動以玩耍為主，不關心時事。但是，自從有了王津平，淡江校園變活潑了，在張建邦校長支持下，王津平開放淡江週刊的園地，讓學生批評不合理的制度，他鼓勵學生們愛鄉土、唱自己的歌、關懷中下階層，於是在他的影響下，淡江外文系畢業的高材生到電子工廠當女工，在夏潮雜誌揭發女工問題。男同學畢業後，拒絕預官考試，寧可下放當大頭兵。七八年，淡江十二個學生社團聯合發起「雙重國籍座談會」，並公佈有綠卡的政府官員在國外置產的情形。這件事又引起有關單位注意。王津平和淡江的學生在課餘支援黨外民主運動，更遭大忌。於是幾名淡江的學生（張裕榮、黃朝洲等）連同輔大的戴華光、劉榮基一起被捕。雖然罪名是「台灣人民解放陣線」，其實二者是半獨立的。王津平本人亦在七九年被迫離開校園和熱愛他的學生，改在淡江山下經營書店。

然而，淡江的學生們從此不沉默了。徐璫等淡江畢業生，放棄高薪工作不幹，在一九八一年籌資辦「大地與生活」雜誌，報導工人問題，並揭發「老鼠會」的大騙局，成為當時諸多黨外政論雜誌中，較具社會風格的雜誌，填補了自七八年夏潮雜誌被禁以後的空白。

---

#### 5. 中壢事件與學生

---

大學雜誌「改組」分裂後，草根系的成員投入黨外運動，致力於台灣民主化活動，一九七五年，

「台灣政論」問世，由張俊宏出任總編輯，原大學雜誌「草根」系成員亦多人加入。這是知識份子與台灣民主運動結合的一個契機。一九七七年底，台灣舉辦五項公職人員改選，投入選戰的黨外人士非常踴躍，許多大專青年都義務為黨外人士助戰，其中尤以許信良最成功地動用青年學生助選。

許信良原獲中山獎學金資助，到英國攻讀哲學，回台後在政大教書，是國民黨有意培養的新世代。七二年國民黨更動用組織的力量，保送他進入省議會。在省議員任期內，他時常不服從黨紀，公開質詢政府官員的倒施逆行，並力主廢除肥料換谷政策，為農民爭取不少權利。像他這種缺乏「黨性」的突變種，黨工人員當然是去之為快，所以七七年國民黨提名歐憲瑜競選桃園縣長。而許信良爭取提名未果後，決定違紀競選，他先後出版了「風雨之書」和「當仁不讓」來增加知名度，並大量起用大專青年和青年工人負責文宣和美工，來對付國民黨的組織戰，並組織青年工作組，動用幾百名青年人到偏僻的農村散發宣傳冊，參與的學生有來自政大的林正杰、陳國祥、楊奇芬……，台大的劉志仁，淡江的史非非和藝專畢業的張富忠。年輕人的熱情將桃園的選戰煽熱至白鐵化。「防止作票」是桃園選戰的大題目，因檢舉舞弊而爆發中壢事件，警車被燒毀，一名工人被流彈打死。這是自「二二八事變」以來，台灣第一次大規模的聚眾抗議暴動。雖然邱奕彬因此事件而被判偽證，然而國民黨長期統治下的白色恐怖，因此消除不少。民眾們對政治不再感到全然無力，也敢挺身支持黨外了。有些具有理想的青年學生，原對國民黨仍存幻想，中壢事件時，國民黨卑鄙的伎倆赤裸裸地呈現在人民面前，這些年輕人從此唾棄國民黨，轉投黨外，為台灣民主運動添了不少新血。黨外亦因中壢事件第一次認識自己的群眾力量，瞭解民主化運動是反映多數人的要求。

---

#### 6. 新生代與黨外民主運動

---

挾著「中壢事件」的餘威，一九七八年的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戰中，黨外的活動更為熱烈。從北到南，黨外已由點、線、發展到面的集合，陳鼓應與陳婉真的搭檔競選，打破了省籍矛盾的藩籬。「



民主牆」與「愛國牆」在台大校門口的對抗，吸引了大批的人潮，也踏碎了隔離學生與社會的圍牆。雖然那次選舉因美國宣佈與台灣斷交而中途停止，但已凝聚成的黨外力量並沒有消失，各種政論雜誌紛紛問世，已投入民主化運動的學生們的熱情亦沒有退却，有人從選舉時業餘義工發展成專職的黨外黨工，出任黨外政論雜誌的編輯、文宣人員（註七），逐漸凝成一股新生代力量。

七九年十一月，國民黨採取「引蛇出洞」的伎倆，在高雄黨外紀念世界人權日的遊行中挑起暴動，並以此為藉口大事逮捕黨外人士，判以重刑。一時白色恐怖又籠罩島內。一年後，選舉恢復了，美麗島受刑人的家屬披掛上陣。在一片法西斯聲中，幸而有初生之犢的新生代們抬轎，美麗島家屬多高票當選，黨外的民主運動才又恢復生機。

曾為許信良助選的林正杰，八〇年又幫周清玉製造了「周清玉旋風」。他自己亦在八一年參與台北市議員選舉與謝長廷、陳水扁同時高票當選。台北市議會因為有了這些新生黨外議員而有建樹多了。因他們的存在亦帶動了國民黨籍新生代議員們的理性化。

## 7. 在野事件，新新生代

黨外有些政治資本後，亦逐漸朽化。主流派的山頭主義最令人垢病。一些年輕人不滿於黨外的理想層次，又苦於國民黨的黨禁，便參加已成立却無功能的青年黨。八三月一月，程福星、劉一德，黃嘉光則辦「在野雜誌」。創刊號措辭尖銳，建議解散青年黨，並批判黨外，被國民黨莫名其妙地停刊，青年黨亦不承認他們的黨籍。程福星畢業自海洋學院，曾幫許信良競選。劉一德是台大政治系的學生，黃嘉光就讀於東吳大學政治系，他們都曾幫黨外人士助選，由實際參與黨外活動中，他們發現一黨外人士缺乏容忍異己、信任他人的胸襟；一味堅持新興中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路線，忽視台灣多數的中下階級，不能代表全部民意。以他二十一、二歲的年輕學生，有如此的眼界與批判能力，台灣民主的未來是光明的。

## 8. 凍土中的春芽，學生權復甦

幾年來在校園外參與黨外民主活動的青年學生們再也無法忍受校園內不民主的空氣。繼承當年王

復蘇未能完成的壯舉，台大幾個進步的社團，包括大學新聞、大學論壇、大陸問題研究社和醫訊社，在一九八二年九月聯合舉辦座談會，討論「代聯會主席開放普選」。台大當局勃然大怒，大事整肅。大學論壇社的前任和現任社長（劉一德，賴勁麟）各被記大過乙次，大學論壇社停社半年，醫訊社被強制解散。法言社抗議未果，編輯們集體辭職。然而高壓行動並沒有澆息學生們爭取自己權利的熱情。在八三年六月，代聯會主席改選時，非國民黨籍的吳叡人擊敗幾位國民黨籍的候選人，當選為代聯會主席。（註八）

一向習慣全盤掌握的訓導，安全人員憤怒不已，於是安全單位約談活躍的學生，並設法將八三年二月間流傳的「台灣獨立黨」傳單事件，嫁禍到這些學生。又散播謠言，宣稱中共投入二十萬美元在台大搞學生運動，企圖破壞自由派學生的形象。

（下期續完）

註譯：

註二：李雙澤，福建人，一九五一年生，曾是一位小「反共義士」。他喜歡民歌、繪畫、寫作，大學時代常在西餐廳、電視唱西洋歌曲，被喻為「台灣的BOB OPLAN」。他原就讀於淡江建築系，中途輟學，到西班牙、歐洲各國遊歷了幾年。七六年返台後，閉口不唱西洋歌曲，努力作歌曲，提倡「唱我們的歌」運動。七七年夏天，他因游水救人而遭溺斃。

註三：王杏慶，筆名南方朔。台大森林系畢業，現任職中國時報，著有「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帝國主義與台灣獨立運動」和「憤怒之愛」，均與學生運動或群眾運動有關。

註四：王拓依此故事撰成小說「妹妹回家吧！」刊載於雄獅美術。

註五：孤影是一群國民黨御用文人的筆名，以彭歌為首。每逢官方對現況有意見，則藉「孤影」之筆傳播。

註六：陳省三是著名的數學家，中央研究院士。

註七：速宇著，「台灣的政論雜誌——現況與展望」，「民主台灣」三十期，一九八三年三月號，第十二頁。

註八：詳情見台大人著，「凍土中的春芽」，「民主台灣」三十一期，一九八三年九月號，第五頁。

陳淳生

# 蔣介石的 違憲連任！



根據國府（國民黨政府）的憲法，總統六年一任，以連任一次為限。但蔣介石在一九四八年首任，一九五四年連任以後，又於一九六〇年違憲續任，自後四任、五任，成終身職「總統」。在蔣氏違背其「余必遵守憲法」之誓詞而撞連三任時，受到「自由中國」半月刊強烈的反對。在介紹該刊這段言論之前，茲先簡述蔣氏前兩任的概況。

## 「法統」代表者的產生

一九四八年間，國府政局之急速逆轉，軍事上頻頻失利，財政上一籌莫展；物價如黃河決口，遍地造成失業、匪患、餓殍，……。在這國困民貧的關頭，蔣介石却悉心着意於舉辦一場「政治大拜拜」。當時的情況，正如一位北大教授所說的：「大部份老百姓始終處於烽火連天的內戰情況下渡着極度艱苦並在飢病線上掙扎的非人生活」，而政府却在做「粉飾太平的工作」①一位記者報導說：「戰爭已經打到長江邊，南京却忙着趕辦大選喜事」②這情景恰似「普陽已陷休回顧，更請君王獵一圍」，也使人想起「火燒圓明園」的前夕，敵軍已兵臨城下，而皇上猶巡走熱河獵一圍。

陪同「君王獵圍」的，是什麼樣的「代表」呢？

原來，「代表」的產生，絕大部份是由國民黨黨中央的圈定，而後經過一下「民選」的手續。包

括花瓶性質的民青兩黨的配額及社會賢達的挑選，均由國民黨當局的安排產生。就政黨成員而言，國民黨黨員幾佔百分之九十的壟斷名數——其人選背景多屬C.C.派、黃埔系、藍衣社及三青團份子。就社會階層的代表性而言，除了極少數幫閒文人之外，盡是軍閥、政客、地主、豪紳、買辦、富商及幫會勢力。用國民黨內桂系一位要員的話：「國民黨裝璜民主，拉來以曾琦為首的青年黨，和以張君勱為首的民社黨，但給與這兩黨的代表席位，不到總數的九分之一。至於三黨代表成分則一模一樣。構成買辦、軍閥、貪官、污吏、地主、豪紳在各地選舉代表時，C.C.和復興特務，再加上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大雜燴。」③

此外，由大會主席團的名單上，更可具體地看出代表們的身份與階層性。主席團裏的要員如：何應欽、白崇禧、薛岳、劉峙、錢大鈞、趙恆惕、張群、谷正綱、吳忠信、馬星野、朱家驊、陳建中、馬超俊……，全是大陸政壇上權傾一時的顯赫人物。他們之中，有的是擅稱一方的軍閥，有的是翻雲覆雨的政客，有的是殺人如麻的特務。在那官民矛盾尖銳對立的時代，這些官意、黨意人物竟以「民意」代表自稱，這比資本家要做工人代表更為不可思議。然而，這些構成份子，便形成國府所謂的「法統」延續人。

國府「法統」的代表者，在紛紛逃離大陸的前夕，群眾南京大會堂裏，熱熱鬧鬧地舉辦了頭一次

也是最後一次的「大選喜事」。

#### 毀憲之始——制訂「臨時條款」

南京召開的國民大會，整個過程都捲入鬧烘烘的選舉糾紛及派系鬭爭。最早的糾紛是三黨配額的問題，民青兩黨數度以退出大會為要脅，要求配給國民黨所保證的名額。接着是國民黨內部爆發，更為嚴重的中央提名與簽署代表之爭<sup>④</sup>，「因此選舉糾紛就在各地如火如荼的爆發起來，於是，通電抗議者有之，發報詆譏者有之，控之於官廳法院者亦有之。」<sup>⑤</sup>蔣介石曾召集簽署代表發怒地說：「因你們的問題不能解決，竟致失眠。」<sup>⑥</sup>但彼此仍不肯退讓。開幕前夕，突然發生簽署代表們紛紛進入會堂絕食<sup>⑦</sup>，而鬧劇的高潮，則是抬棺材請願。以至這次選舉，「笑話之多，開中外古今紀錄」<sup>⑧</sup>。無怪目睹種種奇形怪象的台籍代表余登發感慨地說：「民國三十七年我到南京開國民大會，在國民大會堂看到十幾具棺材，我心裏很奇怪，就問內地的代表到底是怎麼回事，他們才告訴我，原來是有人抬棺材到國民大會來抗議選舉不公平，這個事情給我很深的印象。」<sup>⑨</sup>

絕食、抬棺的鬧劇剛落幕，蔣介石本人也接着表演了一幕要退出選局的假戲。四月四日，國民黨舉行中委會臨時全體會議，討論總統、副總統候選人問題。蔣氏突然表示無意競選總統，寧願當行政院長。他有過這樣的一段談話：「你們做錯了，要我來負責。你們又不肯聽我的話，勢將蹈民二覆轍。民二總理辭却大總統，問題不在袁世凱，就為着黨人不聽他的話。」<sup>⑩</sup>蔣氏主張首屆總統可提名國際知名的黨外人士來擔任。消息傳出，國內外輿論紛紛對胡適加以揣測。據說胡適煞有介事地查閱「憲法」內總統職權，認為：「照這樣當總統不算太忙，我還有寫文章的時間。」<sup>⑪</sup>

蔣介石宣佈無意競選總統之後，國民黨政要立即在丁家橋中央黨部召開中常會。議論紛紛，久議不決。張群乃起立直說：「並不是總裁不願意當總統，而是依據憲法規定，總統是一位虛位元首，所以他不願處於有職無權的地位。如果常會能想出一個補救辦法，賦予總統以緊急處置的權力，他還是要當總統的。」<sup>⑫</sup>由是常會緊急通過所提意見，蔣

主席乃欣然出任大總統。四月十八日，國大乃一哄而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臨時條款的制定，授與總統以龐大無比的權力，使其凌駕於「戒嚴法」與「緊急命令法」之上，使立法院所能發生的牽制作用消失殆盡，使內閣制的行政院淪為「總統的御用機關」。這樣，「臨時條款」的制定，「十足表現了政府一隻頒佈了憲典，另一隻手又把它撕毀了。」<sup>⑬</sup>因而有位學者強烈抨擊「臨時條款」的制定，乃是「毀憲之始」<sup>⑭</sup>。

五月廿日，蔣介石終於坐上了「總統」的寶座，然而局勢的急速惡化，已近「夕陽無限好」的時分！未及數月，連續爆發遼沈大戰、濟南大戰、平津大戰及淮海大戰，蔣軍節節慘敗，主力兵團損失殆盡。軍事上土崩瓦解之際，蔣介石在財政上却做了幾件重要的措施：其一是八月十九日，以「臨時條款」授予的特權，發行新幣「金圓券」。通過這一幣制，從人民手中掠去三億七千多萬美元的金條、銀圓和外幣（而這同時，孔、宋家族却紛紛將家財滙存到外國銀行）。其二是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派蔣經國持他的親筆函去上海訪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着俞即將中央銀行在去年八月間，依靠發行金圓券強向人民兌換得來的黃金、白銀移運台灣。其三是一月十六日，蔣氏召見俞鴻鈞和席德懋（中國銀行總經理），要他們把中央銀行和中國銀行存在美國的外匯，化整為零，存入私人戶頭<sup>⑮</sup>。這幾件「善後」工作安排就緒後，蔣氏乃開始做逃台的打算。

#### 賄選及終身職代表的誕生

一九四九年冬，蔣介石在眾叛親離的潰敗情勢下帶着殘餘的部屬逃奔台灣。翌年三月一日，蔣氏「復職」，將代總統李宗仁逐往美國，報復了桂系逼他「引退」之恨。六月間韓戰爆發，美第七艦隊駐防台海，蔣氏乃得以從容「整修內部」，以重建威權。

一九五四年春，國府召集逃散中的南京時期的國代，舉辦第二屆總統選舉。這次選舉，和上屆比較，顯得十分冷清，副總統激烈角逐的場面已不復再現，會議中主席團的競爭反倒成為新聞的焦點。此外，彈劾李宗仁和聲討吳國楨案，竟成為大會熱

烈討論的兩大主要政治論題。蔣介石仍和前次一樣，沒有發表競選演說，僅在開幕時致詞宣稱：「光復大陸的機運已經在握。」<sup>16</sup>閉幕時則在演講中說：「全體國民，如其對於政府有不民主的批評，或其有不自由的檢舉，如同箝制思想，束縛言論，或秘密警察，特務橫行的事實，那我們政府當然要誠意接受，……。」<sup>17</sup>蔣氏說這話時，正值他主政下的「白色恐怖時期」。「特務橫行」，正是這時期的主要「政績」。

在這第二屆大會中，國府立了許多玩法的措施。如修改「國大組織法」，給與非法集會以合法化；如訂出「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出缺遞補補充條例草案」，使國府不經人民投票程序而委派「代表」以湊足開會人數。而其中尤為違憲的是：利用御用大法官解釋，將大陸選出已告期滿的「代表」予以無限期的延長<sup>18</sup>，由是產生史無前例的「終身職代表」制。

國府既賦與民意代表以終身職的同時，也配給代表們以終身俸。這樣，為了維護一家一姓的終身「總統」的頭銜，僅以六年一度的「政治大拜拜」而言，其耗費國庫錢財，便足以駭人聽聞。據保守的估計：

(1) 第一屆「總統大選」的耗費，據當時的刊物報導：「到會的代表據估計將達兩千五百人，每人所領得的路費及地方當局敬意等，暫以二億計，合共五千億。」<sup>19</sup>而實際上報到的人數是二千八百多名，則估計代表們的車馬費當化費近六千億法幣之鉅。

(2) 一九五四年第二屆「大選」，「在財政拮据的現狀下，政府要拿出一千多萬元開一次國大二次會。」<sup>20</sup>

(3) 一九六〇年第三屆「大選」，「總費用當在五千萬左右。」<sup>21</sup>

由於「憲法」明文規定「總統」不得連任三次，但到一九六〇年改選時，蔣介石仍不肯身退，乃醞釀修改「臨時條款」，以遂其終身連任之意志。為要代表通過修改「臨時條款」，於是高價賄選，每名代表發給出席費新台幣一萬元。而當時一個陸軍少尉的月薪是一百多元（中尉的月薪是一九〇元）、下士是七十元、上等兵四十八元、一等兵四十

五元。<sup>22</sup>

僅以一九六〇年蔣介石賄選和一九二三年曹錕的賄選作比較：曹錕的賄選款額是每人五千元支票，賄選人數是五百多議員。而蔣介石的賄選款額是除每人一萬元現鈔作為出席費之外，每月還需長期津貼高水準的生活費二千元（即每年津貼二萬四千元，每六年需付給十四萬四千元），賄選人數則多過曹錕國會的五六倍。可知蔣介石「賄選總統」的總額，遠超過曹錕「賄選總統」的總額。

而且，曹錕的「賄選總統」只是一次，而蔣介石的「賄選總統」却多達五任<sup>23</sup>。蔣氏在第五任連任選舉時，代表們自嘲這是「最後的狩獵」<sup>24</sup>，雙方議價，每張選票高達新台幣七萬元、配給洋房一棟（每戶用地九十坪，目前市場高漲到三百多萬）。這場「最後狩獵」的選舉，據保守的估計，總共花費新台幣高達三億元<sup>25</sup>。曹錕賄選，只當了一年「總統」，而蔣介石賄選，却當了二十七年「總統」。蔣氏死於第五任任內，第六任的繼任者是他的兒子蔣經國。這樣，蔣姓總統不只是終身職，而且行「世襲」制。一位黨外人士指出了近期的龐大耗費：「總統選舉雖然是每六年一次，對於一千多位總統選舉人却必須持續不斷的供養，這部份的花費約在每年六億五千萬之譜。……每六年選舉一次總統、副總統的全部費用是新台幣九十三億元。」<sup>26</sup>這是蔣氏父子「終身總統」及「世襲總統」的昂貴代價。

#### 終身職總統的反對聲浪

蔣介石雖千百倍於曹錕賄選，但從法制觀點而言，尤其嚴重的是他的毀憲禪連，誠如「自由中國」社論所批評的：「以修改臨時條款的手段，來完成修憲連任運動，將是中華民國的千古罪人，難逃寫歷史的人唾罵！」<sup>27</sup>

蔣介石要違憲三任時，作為反映當時民間輿論前鋒的「自由中國」雜誌，大加反對。該刊連續發表了這十幾篇文章表示異議：「蔣總統不會作錯了決定吧？」、「海外對總統三任問題的反應」、「籌安會的醜劇」、「好一個舞文弄法的謬論」、「修憲已沒有『合法途徑』了！」、「亨利·魯斯對於蔣總統連任所暗示的意見」、「重申我們反對修

憲的意見」、「臨時條款等於憲法！」、「擁護蔣總統繼續領導而不贊同連任」、「敬向蔣總統作一最後的忠告」、「護憲乎？毀憲乎？」、「洪憲帝制期間各方申討之文獻」、「豈容『御用』大法官濫用解釋權？」、「修憲、毀憲與責任」、「蔣總統如何向歷史交待？」茲簡介幾篇文章中較突出的論點如後：

桑明：「亨利·魯斯對於蔣總統連任所暗示的意見」一文，提及「時代」週刊發行人亨利·魯斯表示蔣氏不宜連任第三任。文中並以國際巨頭的瓦訪，感慨最高當局沒有與友邦的巨頭有任何交往，作者指出：「關起門來做皇帝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曹德宣：「擁護蔣總統繼續領導而不贊同連任」一文，抨擊主張修改「臨時條款」，俾蔣氏得以再連任，是「掩耳盜鈴的辦法」；認為「所謂『捨正路而不由』，反不如修憲之直接了當」。當時國民黨方散佈着這樣的說詞：「今日反共抗俄非蔣總統繼續領導不可，此外殆無人勝任者。」曹德宣駁斥說：「以彼掌政三、四十年之久，尙未培養出來一、二替身，矧人生必有死，任何人不能例外。設一旦有變，果真沒有人領導反共抗俄，……。」曹氏懇切呼籲：「應尊重憲法，萬不可出爾反爾，任意曲解破壞，視憲法如兒戲。若此惡例一開，後患真不知伊於胡底？」並勸告不可重演違憲勸進的歷史：「若夫袁世凱、曹錕輩又何曾不有所假藉，認為情形特殊，捨我莫屬，而被部下擁戴欺騙、製造輿論、鑄成大錯。」曹德宣文章發表之後，受到國民黨當局嚴重警告，而且長時期遭受政治迫害。

顧達德：「籌安會的醜劇」一文，發表的時間，已值台北「國民大會」籌幕召開前數月，正是「群魔亂舞——紛紛勸進」的時刻。代表們在當局的示意下，醞釀着修憲勸進，致力於「修改大總統選舉法」，使「連任無限制」。如此，「不但成為終身的獨裁元首，而且可以世襲，……則民國大總統與『一姓家天下』的皇帝，實質上是相等的。」勸進的「籌安會」活動中心人物，「是有名的『太子派』，極力想……製造一頂世襲的皇冠」，而當時「所謂『各省代表』原是抱定攀龍附鳳的志願，……何況在軍警特務控制之下，又有誰敢於反對呢！

」這也實在就是台北一幕勸進活動的寫照。

葛文候：「洪憲帝制期間各方申討之文獻」一文，發表的時間，正值台北「大選」緊鑼密鼓的前夕。文中陳述歷史文獻，抨擊「袁世凱祇是專為『一姓家天下』打算，腦筋中根本沒有絲毫民主共和的觀念。」本文和「籌安會的醜劇」一文前後呼應，兩篇「討袁」的文字，讀者溫故知新。

「敬向蔣總統作一最後的忠告」一文，是「自由中國」的一篇社論。文章指出：「蔣總統身居總統高位，兼之三十多年來積威之勢，使得左右的人只好承伺顏色，揣摩意旨，遇事不敢明辯是非，甚至還要顛倒黑白。……十年來的台灣政治，就是在這種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的情形下，一天一天敗壞下來的。」並批評蔣氏周圍，「製造各形各色的政治神話，以掩飾權力看個人的意圖。」

「蔣總統如何向歷史交待？」一文，也是「自由中國」的一篇社論。文中抨擊國民黨當局：「黨政方面寡廉鮮恥的作風，一天甚似一天；司法界的貪污腐化，一天普遍一天；為目的而不擇手段的事件，出之於官方的，一天多一天，……。」

在歷經整個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的思想箝制及國民黨對蔣氏「神化運動」的政治空氣下，上述的批評言論，實為時代的希音。然而蔣氏依然一意孤行，捨我莫屬地「成為終身的獨裁元首」。

大會開幕式上，蔣介石蒞臨致詞，仍然宣稱：「共匪已臨到了『夜半臨深池』的絕境。」「我們政府必會很快的朝着『光復大陸』的目標向前推進！」閉幕式上，蔣氏再度發表演說，宣稱：「這次大會一切程序，都是根據法理來進行，……實在是給予匪共傀儡以打擊！」

當雷震強烈反對蔣介石違憲連任的時候，他的好朋友胡適博士却悠然走上主席台，在「無記名制度」<sup>23</sup>下，投了他「神聖的一票」。

「終身總統」的種種，和反對者們的聲音，都不可磨滅地寫在歷史上！

\* \* \*

這裡我們從「自由中國」雜誌上選出「海外對總統三件問題的反應」和「蔣總統不會作錯了決定吧？兩篇短文，以供讀者參考。前一篇文章藉海外的反應意見，對蔣氏「獨裁專制不求進步的態度」

，施以強力的抨擊；後一篇文章為該刊社論，代表着反對派最早的反對意見。兩文各有其特殊意義。

註譯：

- ①樓印彥：「如何能粉飾得了太平？」載一九四八年三月廿七日「觀察」第四卷第五期。
- ②引自「觀察」特約記者報導，見「觀察」第四卷第七期，第10頁。
- ③王捷三：「李宗仁競選副總統」，載於「廣西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
- ④根據國民黨制訂的選舉法，每縣選出國大代表一名，其候選人由黨部提名或兩千人以上選民簽署提名。選舉結果，造成許多中央提名落選與簽署代表當選的糾紛。
- ⑤見「第一屆國民大會專輯」，原載南京東方出版社。
- ⑥「觀察」雜誌，四卷八期（一九四八、四、廿四），第14頁。
- ⑦三月廿八日，顏澤滋等十名簽署當選代表進入國大會堂絕食抗議。「無黨派代表胡適、于斌、莫德惠等奔走調停。」（見「觀察」四卷八期，第16頁）但胡適等幫閒，並無效果。
- ⑧儲安平：「國大評論」。「觀察」四卷九期。
- ⑨引自王拓：「黨外的聲音」，第26頁。
- ⑩引自「觀察」雜誌，四卷八期（一九四八、四、廿四），第14頁。
- ⑪同註③
- ⑫程思遠：「李宗仁先生晚年」，第5頁。文史資料出版社出版。
- ⑬詳看樓邦彥：「論『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載於「觀察」雜誌四卷十期（一九四八、五、一）。
- ⑭同註⑧。
- ⑮見程思遠：「李宗仁先生晚年」，第18頁、32頁及35頁。
- ⑯引自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九日蔣介石在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開會致詞。
- ⑰引自香港「新聞天地」（一九五四、四、十），第16頁。
- ⑱根據國民黨「憲法」第廿八條規定：「國民大會

代表每六年改選一次」。

- ⑲「觀察」四卷五期，第11頁。
- ⑳「新聞天地」（一九五四、二、二十），羅柏特：「國大會門開處」。該文報導稱：國大報到的第一天，「就發出三百多萬現鈔，難怪第二天，美鈔黑市上漲至一對二十九元。」
- ㉑「新聞天地」，一九六〇年二月廿日出版，第8頁。
- ㉒參看台北「自由中國」半月刊「讀者投書」欄：第二十一卷七期，「談談離職軍文人員的身份與待遇」；第二十一卷九期，「請速改善下級官兵眷屬的生活」；第二十二卷十二期，「一群士兵的幾個疑問」。
- ㉓七十年代海外釣運時期，從港、台來美的留學生之中，盛傳着有關蔣介石連任終身的一則政治笑話：有一天蔣介石夢見孫中山，孫怒責他獨裁，而且霸着位子不下台。孫盛怒之下，拿着手杖要抽他，蔣連忙辯說：報告總理，我只做了一任總統呀！第二任是「于右任」（「余又任」），第三任是「吳三連」（「吾三連」），第四任是「趙麗蓮」（「照例連」），第五任是「嚴家淦」（「俺家幹」）。
- ㉔見鄔素：「六年一度『大拜拜』」，載一九七二年四月一日「新聞天地」。
- ㉕路柏蘋：「國代笑嘻嘻·民衆滿肚氣」（一九七二、四、一），「新聞天地」。該文以國府鉅大開支而指責享受特權的代表說：「怎麼對得起國家，對得起領袖？」這是典型的國民黨式的輿論。始作俑者便是他們的「領袖」，但他們從不過問：「領袖怎麼對得起國家，對得起人民？」
- ㉖吳乃仁：「怪事一牛車」，「生根週刊」八期（一九八三、五、十）。
- ㉗「自由中國」半月刊社論：「重申我們反對修憲的意見」（一九五九、十二、十六出版）。
- ㉘雷震回憶說：「在投票選舉總統之日，胡適出了席，他說：『這是無記名制度，我要出席，但不投蔣介石為總統一票。』我覺得他有點投機取巧，我根本不出席那一次會議。」（「雷震回憶錄」，第76頁）按：雷震也是國大代表，但他堅持原則，拒不出席。

我們深感有選編三十多年來有關台灣民間重要言論文獻的必要。透過這些言論，不僅可以使我們對於被官方蔽蒙扭曲的實情，有另一面的了解，也可使我們從先行者們艱苦奮鬥的經驗中獲得激勵的力量。這裏，我們將一系列地選刊具有代表性或影響力的言論，每篇言論將作簡略的背景分析，並評介它的時代意義。同時，我們歡迎讀者推薦值得選刊的文章。

轉載自「自由中國」1959年6月16日

早在一年以前，台北方面有一件不見於文字的政治新聞，就是說蔣總統恐怕還要做第三任。做第三任是違憲的，因為憲法第四十七條明明白白規定：「總統、副總統之任期為六年。連選得連任一次。」如果蔣總統真要做第三任的話，就得修改憲法。此所以「修憲」與「做第三任」，實際上只是一回事的兩種說法。

第一件政治新聞，在當時曾引起海內外關心國是的人特別注意，也使得他們特別惶惑。後來，到了四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蔣總統在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上，以斬釘截鐵的語氣說：

「我可以代表中國國民黨、代表政府來說，我們不僅是沒有修改憲法的意思，並且反對修改憲法。」

「反共復國的武器，如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等，莫不皆是，而憲法則尤為反攻復國的有力的武器。所以必須尊重它，而且維護它，才能達到反共復國的目的。」

「反對修改憲法」這一句話，任何人——只要他有一點政治常識，都會了解這就是蔣總統決心不要做第三任的明確表示。對於這一表示，除當時在場的胡適先生說要舉起雙手贊成以外（見四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日報），海外的輿論也接着一陣喝采。大家都認為這是蔣總統明智的決定；過去的惶惑，似乎可以澄清了。

但是，事情究竟不是這麼簡單。自蔣總統聲明反對修憲以後，有許多不可理解的事象接二連三地發生。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官方與國民黨的報紙對於蔣總統這樣一個重要的聲明，沒有發表社論來闡揚，同時對於海外輿論的反應，也不轉載一點消息。●蔣總統明白地說，他是代表國民黨、代表

社論

(一)

## 蔣總統不會作錯了決定吧？

政府表示反對修改憲法，可是某些國民黨籍的國大代表仍然不斷地在搞修憲運動。到了最近，以國民黨員為絕大多數而又以國民黨為中堅的所謂「各省國大代表座談會」，居然公開地乾脆地表示擁護蔣總統再連任。●反對修憲，當然是反對以任何方法變更憲法條文的規定，可是自蔣總統說出了反對修憲的話以後，各方面還在盛傳蔣總統如要連任第三任，不必修憲也可以經由其他的方法達成，如增加臨時條款這一類的作法。

以上這些事象或傳說，又給蔣總統那個聲明投射了一層陰影。

所以本刊第二十卷第一期的社論，是以「欣幸中的疑慮」做題目來評論這件事，我們在那篇文章中的結論，是希望蔣總統能更進一步對於大家的疑慮再作澄清。

到了最近，蔣總統對於這件事畢竟又講話了。但是他這一次的講話，並不是澄清大家的疑慮；相反地，而是加深大家的疑慮。

蔣總統對於這件事的最近一次講話，是五月十八日在國民黨二中全會紀念週上說的。除再度聲明反對修憲以外，關於再連任問題，他說：「我一向不為自己的出處考慮的有三點。即●不要使敵人感到稱心；●不要使大陸億萬同胞感到失望；●不要使海內外軍民感到惶惑。」這一段啟人疑竇的話，正是當前海內外輿論界評論的中心。在香港，有好幾個為爭自由而反共的刊物，如「聯合評論」、「祖國週刊」、「自由人」、「自由陣線」等等，不斷地在明白表示反對蔣總統做第三任。他們所舉的理由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從國家法制的觀點講，有的是從團結反共的角度講，有的評論到三十年來蔣總統對於國家的功過，有的舉了近代史的某些事例，而力勸蔣總統珍惜身後的令名。本刊上一期那篇香港通訊，報導了香港這般輿論的一部份，但那只

是一部份而已。台北方面，真正的輿論一向是流傳於街談巷議而不大見諸文字的。關於這件事尤其如此。可是本月一日出版的「民主中國」（民社黨的刊物）却發表了一篇「修憲與連任」的社論。委婉陳詞，而其結論是說：「吾人確信蔣總統的反對修憲，係出於至誠。吾人更信蔣總統絕不會失去憲法的依據，而連任三屆總統。」

本刊對於這件事的態度，簡單地講，就是擁護蔣總統反對修憲的主張，同時也就是不贊成某些人所搞的連任運動。我們始終認為，今天所說的「不修憲」，當然包括着「不連任」，這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事體。

我們保持這個態度，不自今日始，早在四十三年蔣總統當選第二任總統的時候，我們已明確地表示出來。那時，本刊（四十三年四月一日出版的第

十卷第七期）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目是「敬以諍言慶祝蔣總統當選連任」。在這裏，我們特就「憲法遵行」與「憲政根基的培養」這兩點講。我們說過，「憲政的實行，一方面要靠一部憲法，更重要的一方面，要靠行憲當局對於憲法的認識和誠意。尤其是在憲政實行的初期，更是如此。」接着，我們還特別強調地說：「僅憑主觀的認識和誠意，是不夠的。認識和誠意，必須體現在制度的建立。」同時我們更說到，如果蔣總統能夠在這第二任的六年當中，確實地做到「以自由對奴役，以民主對極權，以憲政對黨治」，則中華民國歷史中的蔣總統，將等於美國史中的華盛頓再加上哲斐生。五年前我們所講的這些話，大可以作為我們今天的態度的註腳。

轉載自「自由中國」1959年6月1日。

從蔣總統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發表反對修憲聲明後，這半年以來，海外自由反共人士對於這一牽涉到總統三任的重大問題，表示了一致的關切。在「自由中國」半月刊第二十卷第四期上，我已在「請看香港發出的台灣政治颶風警報」中，做了一次初步的報導。現在這一篇通訊，便是對這一問題的進一步報導。

最近從台北發出的消息，蔣總統此次在國民黨二中全会總理紀念週上，對修憲及三任問題發表意見時，雖堅持反對修憲的一貫立場，却對三任問題沒有做明確的表示。據說這是由於目前有三項顧慮：●不使敵人感到稱心。●不使大陸億萬同胞感到失望。●不使海內外軍民感到惶惑。但另據合衆國際社從台北發出的電訊稱：「未經證實的消息說：蔣總統的第二任任期於明年三月屆滿後，繼續留任的可能性，似已不成問題。」在黨內，甚至據稱「發言者曾保證，無論是國內或是在海外僑胞社會中，絕大多數的輿論都擁護蔣總統繼續為國家服務。」

然而，據我們所知，事實與「發言者的保證」，似乎還有一段距離。至少在這個最足以反映海外輿情的香港，對於這一問題，便是仁者見仁，智者

見智。大體上說來，倒還是「反對者」多於「擁護者」。現在，為了使台灣的人，能真正明瞭海外的反應，特將正反兩方面的意見，都客觀地扼要介紹如下。

現在，先說贊成蔣總統連任的意見。

幾個月以前，香港便有若干人用「大陸流港難民」的名義拍電報回台灣，而促請修改憲法，懇請蔣總統連任。據說電文中有這樣幾句話：「在此反攻復國期中，應以蔣公繼續連任總統為宜，副座陳公曾謂：總統一職，是不能由任何人充任。」儘管據熟悉內情的人說，這是政府派在海外的工作人員發動的，但我們不妨姑妄誌之。

最近，在反對修憲和連任之聲大起之後，香港「天文台」和「工商日報」，曾表示過一些贊同的意見。儘管這兩個報紙的意見，說話還難免有些含糊之處，然大體上是站在擁護總統連任三任這一邊，是絕無問題的。所可怪的，倒是「香港時報」却始終緘口不言，所以無從報導。

在五月二十日出版的「天文台」上，任畢明先生在「憲法與總統問題」中，表示了他個人的意見。任先生開宗明義便說：「修憲呢？不修憲呢？蔣總統應不應連任呢？這刻許多人在談論着。我個人

海外對總統三任問題的反應

香港通訊，五月廿四日

方望思



選編

對於這個問題所感覺興趣的，只有一個事實，因為我所見到的，也是一個事實。」因此，任先生認為：「我不想對此說什麼，因為這是一個鐵一般的事實問題，蔣不做，誰來？最好能夠清清楚楚地提出一個更適宜的人來！一個面臨事實的問題，決不是囫圇、虛擬、空論所能解決的。有位讀者向我開玩笑：『請毛澤東劉少奇來吧！』這雖笑話，但反蔣最烈的，當推他們兩位。」任先生幾乎想用「開玩笑」的口吻，給反對修憲和連任者，戴上一頂紅帽子，便可見任先生擁護之情為如何了！

不過，一般認為比較明白表示擁護總統連任三任意見的，倒非「天文台」，而是「工商日報」。「工商日報」在五月二十四日有一篇社論，題目是「從國家觀點去解決下屆總統人選問題」。該社論雖然認為「那些主張用修憲方法，以解決總統任期的，不僅技術有問題，而事實亦決難取得多數國人的同意，這次國民黨二中全会不把修憲問題提出討論，我們認為，這是相當聰明之舉。」然這只是表示不贊成「任何拿着憲法去討論總統任期」而已。該社論主要的還是強調連任的需要：「在事實方面，大多數人都認為在這非常時期，由蔣總統去繼續領導政府，無論對內外觀感都總要比「中流易馬」，為更少不良的影響。同時人們也還記得，以前蔣總統固曾一度退休，但退休的結果，却使當時的中國政局，陷於不可收拾。基於這一難忘的教訓，所以人們都覺得由蔣總統繼續連任，以期反攻大業的及早完成，實為目前國家所需要。」

然而，反對蔣總統連任三任的意見，却也說得振振有詞，其聲勢之大，在目前確實是壓倒了擁護者。因為意見太多，無法詳細介紹，只能略述最近一些最具有代表性而且影響最大的意見。

在香港最足以反映海外自由反共人士共同意見的「聯合評論」，近在五月八日便發表過一篇胡越的「蔣真要連任第三屆總統嗎？」現於五月十五日出版的第三十九號第一版又發表了一篇轟動一時的文章，正題是「反對修憲」，副題是「不贊成蔣連任第三任總統」，而著名又破例用「本社同人」四字，特別表示這是代表該社的共同意見。在五月二十日出版的「自由人」，還用「本報訊」方式在第



這是一組諷刺蔣介石執行獨裁政策的漫畫。于右任諧音「余又任」，吳三連諧音「吾三連」，趙爾達諧音「照例連」。吳三連和趙爾達都是台灣時下的名人。漫畫原載留美知識分子刊物「華府春秋」。

二版加以扼要報導，並在第一版報頭旁邊，特別加注了一行大字：「聯合評論社同人反對修憲的意見（詳見第二版），即此一事，已足見海外自由反共人士對於此項意見是如何的重視了。可惜「自由人」限於篇幅，報導不詳，現特將該文第三節「蔣何以非做第三任總統不可？」的意見，按原文照抄如下：

「以下還要就蔣總統是否適宜於連任第三任總統的問題，把我們的意見歸納為下列的四點：

一、蔣總統實際掌握中華民國的政權，已歷三十年以上，在三十年以上悠長的歲月中，他不僅不會為國家奠定一個安全鞏固的基礎，反而把國家弄成如目前這一殘破不完的景象；說再假以六年的時間（到那時候他已屆八十的高齡），他便可以一反過去之所為，而為國家求得一新生命，我們必須坦白說明，我們確實不能再對他寄以這種信心。

二、最近這個十一年，本來已進入行憲時期，照理說，蔣總統既已接受國民的付托，立於國家元首的地位，應如何發揮這部憲法的精神，使一切政象納於憲政的常軌？但這十年以來台灣的政治，所與過去在大陸沒有憲法以前的不同之點，究竟在那裏？不要說一黨專政的推行，比較過去大陸時期已變本加厲，也不要說憲法所規定人民的基本自由已被剝奪無餘；甚至期待政府實踐諾言、召集一個類似二十二年 前廬山談話會那樣的反共救國的會議，給予一般國民以一個對國是貢獻意見的機會，他也斷然不許！其獨裁專制不求進步的態度一至如此，

說我們還要變更憲法，非請他做十八年乃至終身的總統不可，我們不能不坦白的說：有人主張這樣做的儘管好自爲之，我們反對這樣做的，一定斷然反對。

三、據某官員說：『人們深信，國內外並無角色能比得他。』請問：假定這位官員所說是對的，以中國之大，人民之多，何以只能剩下如蔣總統這樣一個孤家寡人，其餘一切的人則盡屬奴才，無足齒數？大家試平心靜氣的想一想：這是不是與蔣總統三十餘年所造成的政治風氣，有一種不可分的關係？曾國藩說：『辦大事者，以能找替手爲第一義。』蔣總統負責領導中國的政治已歷三十年以上，平日應有維護人才之心，也應有培植人才之責！可是由蔣總統的性格所能採取的途徑，則不僅不能維護，唯有摧殘，不僅不能培植，唯有不斷加以奴化；今天到了他的垂暮之年，仍不能找出一個可以代他而起的替手，豈不是事理之當然？更從另一觀點來說，也假定某官員所說是對的，則蔣總統至少應該是一位舉國無敵的超人，但何以共黨蟻居大陸已歷十年之久，而蔣總統却只能困處台灣一隅，而不能損及他們的一根毫髮呢？凡此，可見某官員這種不通的說法，都只能作爲蔣總統不適於續任的鐵證，而決定不能作爲非他續任不可的論據。

四、中國能否反攻復國，決於世界是否能有更大的變化，但世界的變與不變，却與蔣是否續任總統無關。質言之，世界要變，蔣不任總統還是會變，不變，蔣就是續任總統也還是不變。至於不憑藉武力反攻大陸，這是蔣總統親自對美國的一種諾言，蔣總統在任一天，要變更頗不容易，換一個人，却或許有逐漸改變的可能，這說明爲了認真要反攻復國，蔣總統也不能再幹了。

反對修改憲法，不贊成蔣總統連任第三任總統，這是我們的主張。」

「聯合評論」的意見儘管在措辭上顯得率直和激烈一點，然其基本觀點，都可代表大部份海外人士。所以一經提出，接着在五月十八日同一天出版的「祖國週刊」和「自由陣線」，也都用社論發表了類似的意見。

「祖國週刊」在「再論總統連任與修憲」中，首先強調「憲法之莊嚴，不容任何人以任何藉口違

犯忽視。」而認爲：「如果在此時勉強修憲，則是違憲。如果另行設法通過某種條文，使總統可以連任三次，則與憲法第四十七條抵觸，亦是違憲。」但該刊特別聲明：「並非反對蔣先生繼續領導自由中國」，却坦白指明許多「力勸蔣先生連任總統」的人，是「爲了自身利益」。主張「如果蔣先生決心維護憲法，他可以向黨內黨外誠懇地重申其反對修憲的意見，並明確表示不再任總統候選人。」

「自由陣線」則在「當前台灣問題的重點」中，特別強調當前的重大問題，不是「第三任總統問題」，進而認爲蔣總統「在明年總統任期屆滿之前，此時正該明白宣佈不做第三任總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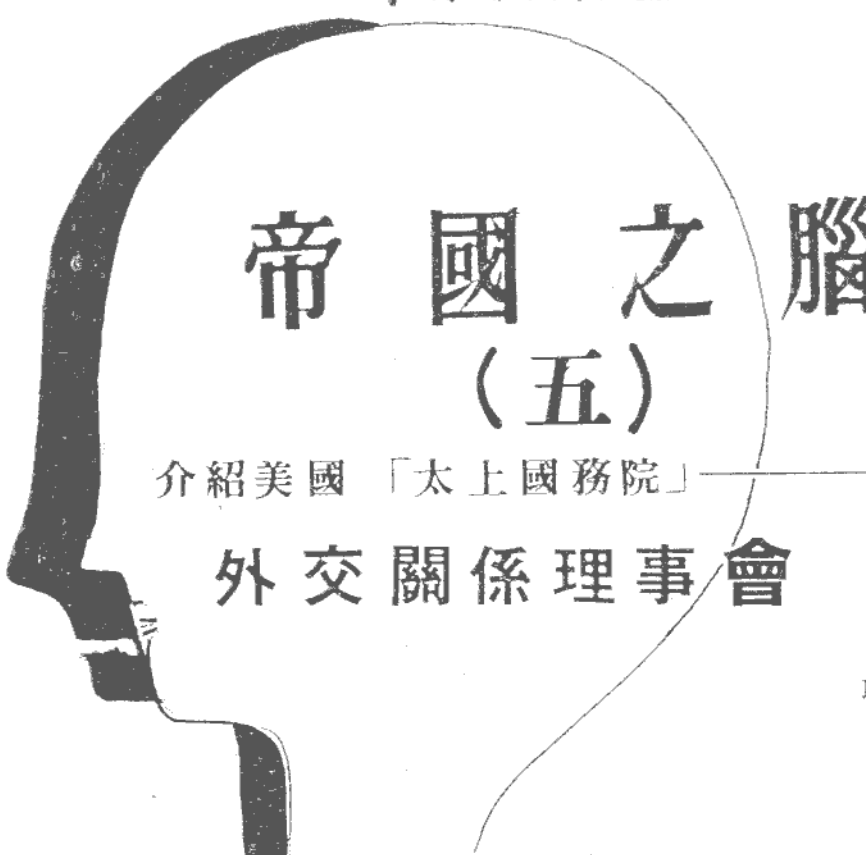
左舜生先生接着也在五月二十日的「自由人」，於「蔣總統連任問題」評論中，提出了一些個人的意見。左先生儘管承認「反攻復國依然少不了蔣先生的領導」，却認爲：「假定去年蔣先生發表反對修憲的時候，同時聲明他決不願連任第三屆總統，這次的紛擾便根本不會起來；就在今天，如果他願補作這樣一個聲明，這種紛擾也可立即平靜下去；如果他始終避免不談，則難免不有種種的推測、紛擾或且愈趨複雜，最後的結果，不僅於蔣先生個人不利，其損害或且及於國家。瞻望前途，我們確實不能不有點憂慮。」最後，左先生還進一步說了一番「不僅不贊成蔣先生連任第三屆總統，而且自始即不贊成蔣先生任總統」的道理。

李璜先生接着也在五月廿二日出版的「聯合評論」上，發表了一篇題爲「勸進的歷史還要重演嗎？」的大文。李先生認爲這事足以說明：「中國士大夫之不長進，不爭氣，永遠停留在攀龍附鳳，拉住轎子，苦苦要抬的階段。」因爲李先生的基本看法是：「元首之於民國，也不過是國民的公僕，並非帝國時代的皇帝，即使這一公僕服務得特別好，也不能說『一生不應被任何人代替』的。何況在民衆十分苦悶之中，國際友人又主張『變下較好』。」且據某民主自由人士兼政論家由美返國過港時說過，美國朋友的想法是：「Change is better。」

從以上這一些簡單介紹看來，相信台灣的人看了，便不難知道海外人士對這一問題的反應爲如何了！

五月廿四日寄於香港

事情的真相，往往比表現出來的現象要複雜而重要得多。本文所介紹的，便是一例。表面看來，美國外交由美國總統及他所選定的國務卿及國家安全會議等來主持。這些人都是向美國總統負責，間接地便是向美國選民負責，以此體現全“民”作“主”的“民主”。但事實上，美國外交另有一個太上國務院，不受選民的監督，而由一群極端有權有勢的人組成。這個太上國務院具有極大的影響力，而且其影響力不因誰當總統，或那個政黨而削弱。更重要的，這個組織及其運作方式是那麼地不顯眼，以致於如果你去問一個路人，十之八九不知道它的存在，不知道他們的民主權力原來被這麼操縱的。



# 帝國之腦

## (五)

介紹美國「太上國務院」

外交關係理事會

范棟 譯介

取材自：L. SHOUP & W. MENTER,

“IMPERIAL BRING CRUST”1977

前文提要：

本文共分四部份，第一為該理事會簡史取材自原書第一章於本刊29期刊出。第二為它的人事網取材自原書第二、三章於本刊30期刊出。第三部份，理事會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具體影響，第31、32期着重介紹二次大戰前後，理事會的戰爭與和平計劃取材自原書第四章，那裏我們看到行動中之帝國之腦其用心之深，規模之大。如你認為那只是蛋頭學者們的“紙上作業”則請印證於本期開始譯介的理事會對落實美國外交政策的具體影響，讀來能不令人心驚乎！

此段作者採個案研究的方式探討對外關係理事會在對德政策（1944～1946），美國入侵瓜地馬拉事件（1954）及對華政策的變遷（1969～1972）取材自原書第五章，下期則專論理事會在1940～1975年間與美國對東南亞外交政策的關係。

譯者原擬直接進入結論。但因前幾次所介紹者為理事會的原則方針。如何具體落實到實際的外交運作上，亦為不可忽視之層面。因此加譯一些個案，俾全文更為完整。

—— 編者

“外交關係理事會”是一極具影響力的私人組織，有時被稱作“真正國務院”

——馬文及伯納·卡布

“外交關係理事會在半世紀以來，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制訂有極重大而具體的貢獻”

——紐約時報

### 理事會的世界觀與二次戰後美國外交政策的落實

前文提及的戰爭與和平計劃，標致著理事會正式與美國政府緊密合作，共同來制定美國外交政策的頂點。由此定出的外交政策格局，四分之一世紀以來基本上沒有受到什麼挑戰。其所謂的「大生存區」，後來改名叫眾所周知的「自由世界」，而美國外交政策的指南是以防止此區受到任何侵擾、破壞「既存、秩序」為脈絡。很快的此「破壞既存秩序」的力量被認定是一由莫斯科為主腦的「陰謀」。但是在事實上所謂「破壞既存秩序」多半來自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要求。

戰後對外關係理事會繼續在外交政策上扮演著主導的角色，它的影響力可經由其位居要津的會員來落實，它的討論會及出版品繼續指導著有關外交政策之討論範疇，使其不越出紐約金融寡頭們可接受的界綫。

冷戰時期對外關係理事會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現在還不可能全面介紹。一方面，大部份的政府及理事會在此時期之檔案尚未公開；另外，理事會之影響實在太廣，探討其與美國外交政策之關係，實等於探討美國外交政策之全部。但是已有足夠的資料可從下列美國對外關係的個案事件中看出理事會在落實美國外交政策上所扮演的角色。

#### 一、對德政策 1944~1946

在一九四〇——一九四一年間，大生存區的概念不包括德國控制下的歐陸。後來當同盟國的勝算在握時，此大區也就相應的擴大。其中最重要的當然就是戰敗後的德國本身。戰後的對德政策是理事會推行其世界觀的試金石。

由戰爭與和平計劃中構出之戰後世界藍圖已經規劃了，如何處理戰敗後之德國。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八日提出的E-1-B63號備忘錄討論戰後賠償的問題。一九四五年七月三十一日之A-1-B124號備忘錄之主題為「戰後對德處理綱要」。此二文件中對處理德國問題的立場可概括為一「溫和」的和平立場：其內容為：德國非納粹化，解除再武裝之潛力，對某些受戰爭損害的國家付出有限度的賠償。

但更重要的是需將德國納入戰後歐洲及世界經濟體系，並避免任何會造成德國社會不安的措施。相對地，蘇聯則希望有大量的戰爭賠償，以打擊納粹的主要經濟基礎——德國大企業的方法來防止其復活。理事會當然也贊同非納粹化，但却不能因此阻礙了將德國納入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路程，而這是理事會最為優先的考慮。關於賠償的主要問題，理事會堅持，讓德國保持現有工業設備，以德國未來的生產品出口來償還其從西方之輸入，而不是直接從德國現有之生產來賠償。換句話說，在對德索償方面，美國對德出口商將比蘇聯人有更高的優先。簡言之，德國應重新納入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體系。蘇聯人的著眼點則是想借戰爭賠償來重建戰後之經濟。「溫和派」同時也反對以移走德國工業裝備的方式來賠償戰害，其理由為這將過份打擊德國經濟，造成社會動盪並將延遲德國以出品償西方債的時間。任何將促進德國與蘇聯之經濟聯繫，或者會促使德國之社會秩序發生根本改變的措施，都應予以阻止。總之賠償的著眼點不在於懲罰納粹德國的侵略罪行，防止日後德國重新武裝；而是著眼於如何將德國納入資本主義體系，納入美國的「大生存區」。

「溫和派」的立場早在一九四三年就得到國務院及戰爭部的同意，但在一九四四年八月財長亨利·摩根索提出其對德方案時尚未得到總統的認可。（摩根索不是理事會的會員）。摩根索仍然將德國看做戰後美國的首要潛在敵人，因此提出一「強硬的」對德處理計劃。此計劃主張將德國變成一非工業的農業國家以防止其再從事侵略戰爭。摩根索同意溫和派反對以德國現有生產品來賠償蘇聯的觀點。但是其想要消除德國重工業的想法却與另一種賠償方式不謀而合——將重工業裝備運往蘇聯。更有甚者，這種將德國看做世界和平之主要敵人的想法涵著繼續維持與蘇聯之結盟關係。「溫和派」是決不同意此繼續與蘇聯合作的觀點。

摩根索的影響在一九四四年九月之魁北克會議達到最高點。羅斯福與邱吉爾在此會議中發表的一項共同申明中採用其觀點。但國務院及戰爭部立刻採取一系列積極的步驟而終使總統改變其立場。在其後之一折衷方案(JCS 1067)及克萊將軍在實

際佔領之行動中都沒有此「強硬路線」之遺跡。而到一九四六年九月拜倫部長之政策演說中正式申明此「強硬路線」是不會被採用的。

在對德方案的問題上，理事會的最大貢獻也許是為這個「溫和的」和平路線提供一理論基礎。即將德國納入資本主義體系及抗拒蘇聯的索償要求。但是理事會及其成員也直接介入對德政策的問題。一九四四到一九四六年間卅九位最具影響力的決策人物中，三分之一是對外關係理事會成員，另外三分之一隨後加入理事會。而在進行反對摩根索計劃之工作最力的四位人物則全為理事會成員。戰爭部長亨利·史汀森(HENRY L. STIMSON)在促使羅斯福總統改變心意上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其左右手約翰·麥克羅(JOHN J. MCCLOY)則為JCS 1067號折衷方案的起草人。威廉·克雷登(WILLIAM L. CLAYTON)則為波茨坦會談中關於德國經濟問題的小組中之美方首席代表。艾威爾·哈瑞曼(AVERELL HARRIMAN)則為駐蘇聯大使，在抗拒蘇聯的索償要求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此四人皆為長期的重要理事會成員。

理事會在處理對德國問題上之戰果是輝煌的，而其結果是眾所周知的兩個德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納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而較小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則納入蘇聯陣營。

## 二、1954年美國介入瓜地馬拉

一九五四年六月，阿馬斯上校(COL. CAS TILLO ARMAS)率領一小隊軍隊由宏都拉斯越界進入瓜地馬拉，在很短期間擊垮了由庫茲曼(JACOBO ARBENZ GUZMAN)所領導之溫和的民族主義政權。當時有很多人懷疑此政變是由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動的，現此點已由很多研究充份證實(註一)。入侵瓜地馬拉的「理由」當時艾森豪威爾總統說的好：

「一九五〇年，一位名叫庫茲曼的軍人掌握了瓜地馬拉政權，由其掌權後之行動觀之很難令人不懷疑，他只是一受共產黨指使的傀儡人物……舉例言之，一九五八年二月廿四日，阿本斯政府發表其農地改革條例將要沒收聯合果菜公司的225,000畝未用耕地。」

美國入侵有理的結論可由執政當局的頂層人物對什麼是「美國國家利益」的異定而得出。在此「國家利益」的觀念之形成及鼓吹上，對外關係理事會的成員及其領導人物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在戰爭與和平計劃中，拉丁美洲從開始就被包括在「大生存區」之中，而理事會對拉丁美洲最關心的是美國在那裏的經濟利益。在入侵瓜地馬拉之前的幾年間，理事會並沒有花太多的時間與精力在拉丁美洲上，很可能因為美國從來就將拉丁美洲看作其後庭，理所當然是其「國家利益」所在，是統治階級早已公認的，不必多費筆墨去「研究」了。一九五二到一九五三年間，前任主管美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史潑里·不藍登(SPUILLE BRADEN)(他也是聯合果菜公司的顧問)主持一個理事會有關拉丁美洲之動盪的研討會，其首次集會就是關於瓜地馬拉的，而由聯合果菜公司的約翰·麥考克寧托克(JOHN. MCCLINTOCK)主持討論。阿道夫·貝勒(ADOLF A. BERLE)在其日記中寫到關於推翻阿本斯政府的討論：

「美國政府理當歡迎此行動。對外關係理事會前晚之討論已大致同意瓜地馬拉政府乃是共黨，它僅執行歐門斯基十年前為其計劃的政策。我明天將去見，尼爾森·洛克非勒，他可與艾森豪將軍談談此事。」

由此看出，即使在新總統尚未選出，採取入侵行動已是理事會的一致意見，而其執行則仍落在與對外關係理事會有千絲萬縷關係的人物手中。其中最重要的是艾森豪總統本人，CIA頭頭，艾倫·杜勒斯(他同時，仍是理事會的理事)及其主持：「地下」活動的副手，另一理事會成員，法蘭克·萬斯勒(FRAUK WISNER)。一九五四年五月一船軍火由捷克運入瓜地馬拉，美國即以此為借口，入侵瓜地馬拉，而其實，政變行動的計劃是早就在進行的了。在製造輿論上，理事會當然也絕不後人，理事會研討小組長不藍登在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二日的演說中說道：

「因為共產主義是一國際性而非一國內部的事務，因此，為撲滅共產主義，即使是運用武力由美洲上之一國介入另一國也不構成一國對他國內政之干涉。」

參與入侵瓜地馬拉的最後決策者當然只能是極少數。在我們能確定的十二人中理事會成員佔了八位。而在入侵瓜地馬拉的行動中，理事會成員，政府官員及聯合果菜公司形成了一個三角網。這不是偶然的。理事會的一首腦人物，惠尼·謝巴森(WHITNEY H. SHEPARDSON)是聯合果菜公司屬下之中美國國際鐵路公司之高幹，而聯合果菜公司在一九五三年之董事長是傑佛遜·古林吉(T. JEFFERSON COOLIDGE)，外交事務雜誌首任主

編的一位親戚。當然即使在瓜地馬拉的是另外一公司，杜勒斯兄弟仍然會出兵干涉的。在瓜地馬拉的個案，則參與者的個人利益，階級利益及界定為資產階級利益的美國「國家利益」互相交織在一起，而在其中心的正是對外關係理事會。

### 三、理事會怎樣面對客觀現實

與此二個案類似的一九六二年之古巴飛彈危機，在事件之前前後後，理事會的成員不例外的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他們的做法總是，第一步，在理事會內部達成了一致意見，而後很快的他們為政府的決策者提供一套藍圖，而最後，掌美國外交政策之權貴人物，在理事會中及政府中可指出他們政策之成功之處：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成為西歐資本主義世界的支柱；在瓜地馬拉，「共產主義」被撲滅，而在古巴，蘇聯在衆目睽下，退縮了。從這些個案，很容易就得出理事會在外交事務上是無往不利的形象。就指出理事會是引導美國外交政策走向爭霸全球道路的主導角色而言，此形象大致是正確的，但却非故事的全部。正如克爾克氏在其權力之極限一書（註二）中所指出，即使在美國國勢的極盛時期，世界局勢也未能尊其旨意頤指氣使。在美國領導下之「自由世界」遭到挫敗，美國未能將東歐納入「大生存區」之版圖中國革命的成功，逼使政客們喋喋不休於誰「失去」中國的爭吵，而至越戰之潰敗其國勢更是江河日下。因此帝國之統治者必須面對現實來調整其政策。正是此項面對挫敗的調整工作使理事會遭到極右派猛烈的攻擊，被他們指為「自由派當權者」的神經中樞，要將美國及自由世界出賣給共產黨。

就理事會本身言，他們除了矢志於為美國取得一主宰全球之地位外，也願尊重客觀現實。這蘊含著，美國的外交政策必需為適應外在客觀世界的現實而調整。因此，當德國在歐陸似乎是不可戰勝時，「大生存區」並不將其包括在內。而僅管在二次大戰後甚有希望將東歐納入美國的勢力範圍之內，「正統的」理事會政策並不贊成以不惜與蘇聯一戰的姿勢來達到此目的。

此項為適應不利現實而做的調整工作，做來非常不易。承認失敗，並為新的外交政策尋求共識，對理事會及資產階級都是一件較困難的事。因為在資產階級內部冥頑的右派是有其堅強的社會基礎，而非如一般想像中只是一些參加約翰·白起社（JOHN BIRCH SOCIETY）（按：美國的一個極

右反共團體）的紅頸小商人。下面要談的幾個例子就是對外關係理事會在此「重整」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 四、對華政策的變遷（譯註）1969～1972

一九四九年，中國革命成功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標識著中國做為美國在亞洲的小伙伴的結束。二十年內美國政府盡力阻止中華人民共和國得到國際承認，希望借孤立與圍堵來挫敗中國的革命。其時，一位名叫李察·尼克森的年輕眾議員大聲斥責民主黨人「失去」了中國。美國政界竟要等到此位尼克森變成總統後才能接受此中國存在的現實，而發展出一種新關係。對外關係理事會，經由其組織的一系列中國研討計劃，對此過遲的面對現實，重整政策扮演著重要角色。雖說達到新的共識總是需要較長的時間，但在這件事例上却另有更重要的原因，使得「面對現實」的時間拖得更久。這個重要原因乃是：重新探討對華政策要到一九六二年以後，才真正提到理事會的議事表上。這時離「失去」中國時已是十年以後了。

理事會成員參與制定對華政策却遠早於此。一九四九年由國務卿狄恩·艾奇遜（DEAN ACHESON）（理事會會員）所任命的對華政策特別三人委員會全是積極的理事會成員：雷蒙·福斯狄克（RAYMOND B. FOSDICK），菲力蒲·雅色普（PHILIP C. JESSUP，1934—1942年間，理事會理事），及艾芮·凱斯（EVERETT N. CASE）。他們向政府建議並被採納的政策是孤立而不承認新政權。原先並未打算將此做為一教條化的僵硬政策，但是右派的攻擊及其後韓戰的發生及麥卡錫時代的來臨，因而不可能變通政策。右派攻擊的主要目標之一即為太平洋學會（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雅色普及凱斯皆為其重要成員。此項由右面來的攻擊其結果之一即是太平洋學會的垮台，失去其洛克非勒基金會的財政支持（福斯狄克為基金會理事長）。換句話說，是理事會整體，外交事務的當權派受到攻擊。

然而，在理事會內部早有意見認為應對中國採較開放的彈性政策。一九五〇年，理事會向其所屬的會員做意見調查，百分之六十四的人認為至少應與中國做有限度的接觸才符合美國在亞洲的利益。亞瑟·狄恩（ARTHUR H. DEAN）於一九五四，歐斯坦斯·史格曼（EUSTACE SELIGMAN）於一九五八皆建議美政府採一較具彈性的「兩個中國

」政策。狄恩是理事會理事及其關於中蘇關係研討小組的主席，而史格曼也是理事會的積極成員。一九六〇年，由理事會出版杜巴奈(DOCK BARNETT)的名著：COMMUNIST CHINA AND ASIA；CHALLENGE TO AMERICAN POLICY也主張此「兩個中國」政策。

如果僅是由於右派的鬼叫反對不可能有這樣大的成果。在外交事務當權派內部有人基於各自的理由反對承認中國，鬆弛緊張關係的政策。其中最具影響力反對「彈性」政策的兩人就是約翰·杜勒斯(JOHN FASTER DULLES)及狄恩·魯斯克(DEAN RUSK)他們兩人長期擔任國務卿將對華政策固定在強硬路線上。

這種情形要到一九六二年才改變，理事會於該年成立了一關於美中關係的研討計劃(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WORLD AFFAIR)。兩位發起其事的關鍵人物是喬治·福蘭克林(GEORGE S. FRANKLIN)，理事會的執行理事及約瑟·史拉特(JOSEPH SLATER)，一位剛由助理副國務卿轉到福特基金會任職的理事會會員。此項研討計劃由一九六二年進行到一九六六年由福特基金會慷慨贊助，並由一強力的決策委員會指導研討的方向。此委員會的領頭人物是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等理事會人物，及中國專家，杜巴奈·白魯恂(LUCIEN PYE)。而研討小組的首任組長羅伯特·白路姆(ROBERT BLAM)一個CIA的前任官員。

雖然理事會的立場是，此項研討計劃將不建議任何特定的政策，但整個研討計劃的總意象明顯地要尋求與中國建立新關係的可能。理事會的這個研討計劃為外交政策的改變打下了基礎，而終在尼克森，吉辛格手下得到落實。

決非偶然地就在理事會的研討活動既將結束時，另一個由福特基金會贊助的「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ON U.S. CHINA RELATIONS)就出現了。一九六九年此

委員會召開了其首屆全國大會。2000位與會者聽取關於美中關係——下一個十年的報告。當然各種樣的意見都在會中提出，但會中主流明顯的是導向對中國開放。此委員會的成員與理事會成員有大量的重疊。在一九七〇年，全國委員會有廿七位委員，其中十二人是理事會成員，五人是前述理事會研討計劃的參與者。如果只看其領導人物，則此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與理事會的關係就更為明顯了。一九六八至一九六九年，此委員會之主席為杜巴奈。而兩位副主席，白魯恂及羅伯特·路沙(ROBERT ROOSA)皆為理事會理事。一九七一年，亞歷山大，艾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理事會研討小組之一位領導人物，成為全國委員會主席。此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是公開的探討美中關係新政策的主導團體。正如紐約時報一九七一年五月二日社評所謂「此全國委員會靜悄悄的為改變對華政策做好前導準備工作。」

如此，培養政策改變的氣候已準備就緒，一九六九年二月尼克森下令吉辛格開始尋求打開與中國關係的一切可能。到一九七一年，公開行動開始而終導致一九七二年尼克森聞名的中國之旅。在政府內部，理事會會員不例外的，在決策上扮演著重要角色。尼克森本人在六〇年代中期曾是理事會會員於一九六七年外交事務雜誌上撰文寫道：「就長遠來看，我們無法付得起將中國置於國際社會之外的代價」。吉辛格於理事會的關係我們已屢次提到，他在那段時間乃是同時正在進行的「大西洋研討計劃」的成員，故並未積極的參加美中關係研討小組。

此個例清楚的顯示出理事會在改變一長久政策上所起的催化作用。正因為在製造適宜的政治氣候上事先做足了準備工作，當改變真正來臨時似乎是毫不化力氣。預期中的右派反對只剩下幾聲低哼而已。如此成功地將美國外交政策從徒勞無功的孤立中國轉移成吉辛格之五角權力平衡模式，而中國正是其五角之一。

註一：關於中央情報局介入瓜地馬拉政變的事略請參閱BARNETT, RICHARD J. (1968) INTERVENTION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JULLY, ANDREW (1962) CIA: THE INSIDE STORY NEW YORK WISE, DAVID AND ROSS, THOMAS B. (1964) THE INVISIBLE GOVERNMENT, NEW YORK.

註二：KOLKO, JOYCE AND GABRIEL

KOLKO (1972) THE LIMIT OF POWER. NEW YORK.

譯註：譯者原以為美中關係之變遷太為人所熟知，此段可不譯，但人們是健忘的，常不能以歷史的眼光看歷史的演變，而總是以「現在」的眼光將歷史壓成一平面。現在常聽到的說法是將四九年革命後的中國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原因歸於毛澤東或中共之政策。沒有比這再不符合歷史事實的了。故特譯此段以為證。

區域整合的政治經濟學  
與  
第三世界經濟發展問題

政治經濟學名詞大辭典

林中平



在這個國際經濟關係愈來愈密切的年代，當我們探討台灣的經濟長遠走向之時，跳出唯美、日馬首是瞻的框架，從比較全球性的關係來檢察台灣經濟，是一個值得歡迎的嘗試，是每一位真心關切台灣前途者所不能忽略的角度。這種新角度將會拓展我們一片新的視野、激發我們的創造力與想像力。這就是林中平先生這個新著所帶給我們的。

本文包涵內容很廣。作者介紹了科學哲學的一種新觀點，作為全文的理論方法架構。以此架構來評介一些與經濟發展有關的理論，最後他提出一種第三世界經濟發展可能的方向，並將之具體應用到台灣上。內容豐富、推理的嚴謹而又不失之枯燥教條，在在顯示作者淵學之博，用功之勤與思考之活。我們相信任何用心的人都可以讀得懂，而且可以從中獲取許多啟發。

由於這個題材較新，我們特別希望讀者看完後能給我們來信，談談您的讀後感或意見。我們更希望有更多朋友往這方面研究，把您們的心得寄來本刊發表。

為補助原文一些難免簡潔之處，我們針對「一般科學理論」、「現代化理論」及「庸屬理論」提供三個解釋性短文，以助部份讀者閱讀全文。限於篇幅，這三文都是極度簡化。我們期望未來有專文能介紹這三個重要的題材。

——編者識

### (一) 方法論上的一個考慮

#### ● 科學史中的許多暗示

在哥白尼提出太陽中心說以前，西方的天文學大抵上是以托勒密的地球中心的天文系統為準的。托勒密系統在當時雖然不能解決許多天文現象的問題，但是因為托的系統在當時並沒有被另外一個系統嚴厲地挑戰，所以托的系統從中世紀到近代都被天文學家廣為應用。哥白尼系統在西方是第一個向托系統挑戰的。但是，哥系統的挑戰並不成功。雖然哥系統能夠解釋許多托系統能解釋的問題，但是托系統所遭遇的許多困難哥系統照樣不能滿意地解決，如改良當時曆法的實際問題。哥系統的決定性勝利要等到近代科學的巨人如刻卜勒、伽利略才算來臨。

刻卜勒及一些當代學者首先以哥系統為工具較滿意地解決了曆法的問題。伽利略則以望遠鏡觀察到金星相位的現象，這個新問題托系統很難解釋，但哥系統却極易解決它。所以，托系統的舊問題（曆法）現在已被哥系統大致解決，而且哥系統能完美解決一個托系統極難解決的新問題（相位）。在此之後，歐洲的年青學子紛紛放棄了傳統的說法而企圖走出新路，在法國有笛卡爾學派、在英國有牛頓學派共同譜造了西方近代科學的基礎。

但是請注意，刻氏及伽氏並沒有「嚴格證明」托系統是錯誤的。十七世紀的耶穌會教士仍然可以把托系統搞成一個繁雜無比的理論來勉強解釋金星相位問題。堅信托系統的老學者們並不為刻氏及伽氏的成就所打動。能夠嚴格證明托系統錯誤的技術要等到十九世紀才出現。幾個好奇的科學家終於在

十九世紀「證明了」托系統的錯誤，可是，有趣的是連教皇在那證明錯誤的前幾十年都早已認輸，哥白尼當初的開山著作在前幾十年便已被教宗解禁。

理論和理論的鬥爭大概不是決定於說服對方（對方不會被說服的），而在於有效地切斷對方的新血注入。當刻氏及伽氏有效地吸引了十七世紀的青年學子，當十七世紀的老耶穌會教士死光以後，哥系統與托系統的鬥爭便告結束。十九世紀的「嚴格證明」只是好奇的天文學家們對哥系統所作的錦上添花而已。

類似這種理論間鬥爭的例子在西方科學史中非常多。幾條重要的暗示似乎可以歸納如下：理論間的鬥爭是以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為導向的。如果一個理論沒有另一個理論與之抗爭，那麼那個理論即使問題重重，也照樣大行其道。即使有另一個理論與之鬥爭，但是如果新理論不能解決許多老理論所不

科學的成長通常被視為是漸進的、累積的以及演化的（EVO LUTIONARY）。的確，當我們回顧生物學家把生物的種屬愈找愈多，天文學家把望遠鏡所發現的星星、星系等不斷填進星圖，實驗家的精確度一位一位地提高時，我們不得不得出科學知識是點滴增加的結論。

實驗或觀測科學的成長，總是帶來理論科學的發展。由於事實的發現是不斷地累進式，人們很自然地以為，理論的發展也是點滴改進的。

這個習焉不察的觀念自近代科學興起後，曾被盲目地接受了幾百年。然後到了一九六二年，一個年輕的物理學博士庫恩（THOMAS KUHN）出了一本小書：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主張科學理論的發展並不是漸進填加式的，而是革命式的，才改變了這個看法。一個新理論（或叫範式，PARADIGM

）並不是把舊理論填補些新材料形成的，而是和舊理論截然不連的，因而是革命的變化。

庫恩的發現產生了鉅大的影響。不僅因為它糾正了過去的觀念（當然，也有少數人不接受它），還因為它也可以應用到社會科學與人文學各部門的理論上。庫恩的這本書立刻成為學術界的暢銷書，重印了無數次。它的出版者芝加哥大學出版部因而賺了大錢。

由於理論不是累積演化的，所以一個過時的理論並非和平地被科學家們放棄，而是經過鬥爭而發展的。在科學史上，舊理論的接受者很少會放棄舊有的理論而去接受新的。理論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鬥爭的結果也不是很理性地大家都接受正確的新理論（舊理論的擁護者也很少會承認他們的理論是錯誤的），它不過使新進的科學家不再接受舊理論。這也顯示人們在對待科學理論的態度，並不是那麼理性的或「科學」的。

能解決的問題，老理論就仍然把持它傳統性的優勢。新理論必須去解決老理論所不能解決的老問題，並且更能解決一些老理論無法解決的新問題來吸引新一代的人們而造成科學革命。

### ● 對政治經濟學的一些聯想

自然科學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去解釋自然現象，政治經濟學所需要解決的問題則是許許多多廣為人知的社會問題。資本主義在西方近代的發展解決了許多過去封建社會所不能解決的問題：例如巨大生產力的釋放、資本、技術、知識的大幅度提高、對社會的控制力、對資源的利用性的增強等。到了資本主義的中、後期時，一些中心國家更進一步的使中上階級的財富大為提高，甚至工人階級也能沾到不少利益。另外，形式上的法治與形式上的民主也能夠建立起來，不管你信服與否，他們有不少東西可以展覽出來以驕人。

但是，和過去的封建及其他古老的生產方式一

樣，資本主義仍然不能解決一些極為古老的問題：例如創造一個屬於人、讓人把工作當成是飲生命的美酒的社會。大部份的人工作只不過是為了要活著、或者是為了要保持自己過去的階級地位於不墜。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的發展更帶來一些新的問題：極端的異化與疏離、失去封建主保護後所面臨的市場無形壓力、虛偽的形式民主、環境污染與核戰恐怖，對於第三世界則是產生大部份的資源浪費、赤貧化、矮化（underdevelopment）、以及一大批圍繞著中心國家打轉的獨裁或軍事政權，等等。

於是，從十九世紀以來大為發展的社會主義宣稱它希望，也能夠解決這些老與新的問題。在政治經濟學的層次上，這也是一個尖銳的理論性鬥爭。從問題導向的方式來看，如果我們只是說社會主義的理論挑出一大堆資本主義的嚴重或不能解決的問題是不夠的，我們還需進一步問一些能夠真正吸引新生代（較沒有成見與利益的束縛）的問題：資本主義的老問題與新問題社會主義諸流派解決了多少？或解決的比較令人滿意嗎？

## (二) 空想的與科學的？

### ● 這個區分今天仍然適用嗎？

十九世紀的一些浪漫的資本家也幻想、構造出一些小型的社會主義實驗，於是許多社會主義者後來使用這個區分來指出幾點：社會主義的形成是基於科學性、歷史性的分析下資本主義的「必然」崩潰後的產物。其次，在社會主義成形之前去設想它的結構等問題是空想，社會主義的構成是一個實踐與創造的過程，它是個在資本主義崩潰後的課題，目前的主要課題則是在於如何加速那「必然的」崩潰過程。

但是，這個「必然性」在今天看來是很有問題的，它沒有甚麼邏輯或物理上的必然性，而黑格爾式的必然與偶然的歷史哲學在今天究竟經得起甚麼經驗分析也是一大問題。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中心國尚未崩潰之前已經有許多宣稱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形成了，有的結果很差，有的結果十分引人爭議。在今天有那麼多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可以研讀時，同時考慮與比較研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諸流派的種種問題的時機已經完全成熟。傳統式空想的與科學的區分法在今天已經很不適用了。社會主義結構的問題已經不全是一個革命後的實踐問題，它同樣是和資本主義一樣需要許多科學性與歷史性的分析。再從問題導向的方法論來看，該問的問題是：如果許多目前的社會主義國家不能解決許多資本主義的老、新問題，如何修改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方能夠解決那些老、新問題？去分析資本主義的新發展與新危機固然重要，但嚐試去「解決」資本主義所產生的許多問題也同樣重要。攻擊對方理論最有效的一個方法可能是向人證明我們能夠解決彼理論不能解決的問題。

## (三) 第三世界經濟發展與一些理論問題

在前面兩節中我大致上說明了我討論問題的方式，從下面我希望全部專注於討論第三世界經濟發展的問題，把這個「問題」當中心來談一些圍繞它的理論。

## ● 二十世紀中期以來的一些發展 以及矮化發展的理論

三十年代經濟大恐慌以來，資本主義中心國家實行許多新的經濟政策。但是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往往不但沒有進展反而更有退步。第三世界和北邊國家（指工業先進國家。這些國家大多在北半球，故名）的貿易結果往往情形是極不穩定且愈來愈糟。面對這個大背景之下，Samuelson把李嘉圖的比較利益的國際貿易理論加以精緻化恰巧是他理論的一大諷刺，按照他的理論，國際貿易應該會促使第三世界國家與北邊經濟國家經濟平等化，但事實上，二者之貧富差距愈來愈大。新古典的國際貿易理論被Myrdal諷刺成是「火星上的經濟學」，與第三世界毫無關係。

在這種失望的情形下，兩支流派的經濟發展理論漸漸興起，一支起源於美國，一支起源於拉丁美洲。四、五零年代起源於美國的發展經濟學與當時「美援」的意識形態有很大的關係，但是他們至少企圖去分析第三世界國家許多社會結構的問題以及其潛在的發展力，並且企圖指出一條具體的解決問題的經濟政策。於是透過美援、一些綠色革命的技術，發展經濟學開始指導、或至少解釋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在臺灣方面，則有費景漢企圖用Lewis「來自農村隱藏性失業的過剩人口能夠提供工業發展所需要的無限制勞力供應」的模型來企圖解釋台灣二、三十年來的經濟發展。在拉丁美洲方面，許多人則企圖用Hirshman「選擇一策略性的工業部門來大力發展，並造成其部門的上游與下游諸工業部門發展的壓力」的模型來解釋拉丁美洲從經濟大恐慌後所發展出來的進口替代的工業發展）。

但是，二、三十年下來，在亞洲方面，大部份的國家在農村雖然有充沛的勞力，但却無法支持都市工業部門的發展。即使有幾隻小老虎可以談一談，但是事實上Lewis的模型甚至連解釋這幾隻小老虎的成長都非常困難（看費景漢對台灣經濟發展的解釋漏洞百出就是一例），更何況他們要如何解釋東南亞、中亞等許多國家的遲遲不開發、甚至矮化（Underdevelopment）的現象呢？另一方面，拉丁美洲進口替代的工業發展雖然有一定程度的重工業發展，但是在經濟方面，嚴重的通貨膨脹與進出口赤字一直無法解決。在社會方面也付出了嚴重的

二次世界大戰後，「發展」成爲西方社會科學關心的一個焦點。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與庸屬理論（DEPENDENCY THEORY）是最重要的兩種發展理論。

現代化理論認爲發展是單線式的，任何社會都歷經類似的歷史過程，只不過各國家社會歷程有先有後，先的就是現代化的發達國家，後的就是傳統的，未開發或低度開發的國家。現代化的程度，可以用國民生產毛額（GNP），平均所得，對「現代化」價值的接受，社會分工、政治整合等等尺度來衡量。

依照現代化理論，當今第三世界國家都是後進或未開發的國家。他們缺乏先進國家的各種屬性。這些屬性如能滲進（DIFFUSE）第三世界國家，就能推動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他們把十九世紀中葉以來歐美帝國主義國家的擴張視爲是這種滲進的過程。是傳播「發展」福音給第三世界人民，而不是侵略。

二次大戰後，「美援」取代了往日洋槍洋

砲，成爲美國對外擴張（或是改變第三世界使之納入國際資本主義體系）的重要媒介（當然，美國的洋槍洋砲並未減少）。現代化理論及其各種變種往往成爲「美援」的理論基礎。在台灣常常聽說的「起飛理論」，便是其中的一個變種。

四、五十年代盛極一時的現代化理論，到了六十年代漸趨下坡。新進學者紛紛另找出路，主要因現代化理論不能解釋許多客觀事實（如美援多數並未使貧富國間差距縮小，反而日益增大；如滲進一些「現代化」屬性於「落後」國家往往並未帶來預期的發展；許多受美援國家並未發展出「先進」的民主政治，反而造成許多軍事獨裁政權，等等）。另外現代化理論就其本身學理也發現許多漏洞（如單線發展的觀念，等等）。

（取材自：F, T, FITZGERALD: SOCIOLOGIES OF DEVELOPMENT, J, CONTEMPORARY ASIA, II 5, [1981]）。

代價：勞動與消費市場都產生兩極化現象、財富分配極不平均。尤其使許多發展經濟學家尷尬的是：從六十年代起，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都形成軍人政權，經濟發展並沒有帶來甚麼政治的現代化（這個問題在亞洲也是一樣的嚴重）。在這些情況之下，發展經濟學本身開始式微了，因爲它們並不能滿意地解釋與解決當初它們企圖面對的問題，許多發展經濟學家現在只局限於在考慮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收入分配問題便已滿足。可是話說回來，發展經濟學不能解決的問題有其他理論可以提供一條解決之道嗎？

## ● 結構主義 與庸屬理論

另一支對第三世界經濟的看法起源於拉丁美洲以及聯合國在Unla-Unctad中的許多知識份子。Prebsch最早即在聯合國提出南方國家對北方國家

貿易條件（Terms of Trade）在歷史中愈來愈糟的問題。南方國家們想透過聯合國做爲集體向北方國家談判的場所，但是情況却不是很如意。另一方面，拉丁美洲較溫和的知識份子並不滿意北美洲的經濟學應用到拉丁美洲的情形，純粹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往往不能解決他們急切的問題。像Furtado、Restrepo這些經濟學家就重新回到政治經濟學尋求靈感。這些結構主義者基本上是把經濟學與社會由階級、部門、利益集團所形構成的社會結構打成一片。當普通的財政與貨幣政策不能解決問題時，他們便更進一步的尋求更基本的社會與政治原因來解決問題。幾個比較著名的例子，如巴西東北角的農業問題、如哥倫比亞的土地改革問題、如智利的通貨膨脹問題等大致上都在結構主義者手上有了較滿意的解決。

結構主義者在拉丁美洲是比較具有改革傾向的。然而即使有了他們的努力，拉丁美洲的經濟仍然

是問題重重。於是另一批庸屬理論家 (Dependency theorists) 或新庸屬理論家更企圖從整個拉丁美洲的歷史、它們與中心國家的庸屬 (dependent) 關係等等來解釋為甚麼第三世界的許多努力仍然不成功——甚至是結構主義者的努力也沒甚麼用。理論家們如 Frank、Amin、Wallerstein 們企圖從資本主義的發展開始逐步地解釋拉丁美洲以及整個第三世界的矮化發展 (Underdevelopment)。在左派理論的發展上，Emmanuel 甚至提出那著名但却十分引人爭議的「不等價交換」來解釋第三世界必然的矮化發展。

本文不準備仔細介紹這些著名的庸屬理論，而只希望從問題導向的方法論來對他們提出幾點初步的批評：

首先，過份的依賴「中心——邊緣」這個概念的種種面相來解釋第三世界的矮化發展會使人推論說：一個良性的經濟成長應該是以一種非中心對邊緣的社會結構來發展。但是，非中心對邊緣式的社會發展（或說「全面性」的發展吧）可能十分少見，是否可能也是一個問題。即使在一個國家內部、甚至在一一個都市之間的發展也常有中心對邊緣的現象產生。蘇聯的經濟發展也典型地是以一種非平衡的發展模式去發展的。另外，在一些重視集體區域發展的多國家集團也有許多中心對邊緣的現象產生。在東歐共同市場中蘇聯很明顯地是中心國，在歐洲共同市場內也有許多持續矮化的現象。問題也許該這麼去提：除了庸屬理論家所熟習的惡性的中心邊緣關係之外，有沒有一種良性的中心邊緣關係？說計劃經濟便保證良性的中心邊緣關係可能是個過於單純的答案。

其次，庸屬理論家們對第三世界的整個視野是比較悲觀的。在資本主義中心國的各種形態的控制與所分配下來的分工任務之下，很難在第三世界的矮化發展下找到甚麼大的希望。Frank 曾對資本主義的一些中心國家的歷史做過仔細的分析。例如，為甚麼當歐洲殖民到美洲的歷史中，同樣是未開發的北美洲與中南美洲在幾百年後有這麼大的不同？他的答案是：按照當時的生產方式而言，北美洲貧乏，中南美洲富裕。所以當時歐洲人的注意力、控制力都集中在中南美洲，而使得北美洲有獨立發展以及向帝國主義們賺取服務費的機會。同樣的模式也多少可以應用到過去中國與日本在發展上的分歧

性。總之，Frank 希望指出獨立的發展是比緊緊地納入中心國的分工系統要好的多。（可是，也有許多證據顯示可能美國與日本的經濟史並不是那麼「獨立」。十八、十九世紀美國南部的棉花與北部的小麥大量銷往英國，以及英國在美國鐵路建設等事業上的大量投資都是事實。日本在明治初年受英國紡織品的大量侵入，她的不平等條約在日俄戰爭後才完全取消。）於是，庸屬理論家們常常建議一條路：脫離中心國家所設定下的分工系統而獨立發展。但是，獨立發展對許多小國根本無法做到。古巴革命後幾年取消了以工業發展為主導的發展計劃并且回到以糖輸出的傳統工業已經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尼加拉瓜所面臨的國際局勢可能比古巴當初有利，但是情況也不見得樂觀。更有甚之的是 Frank 也承認現在東歐共同市場、蘇聯的經濟已經逐漸地再納入了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大體系之中。蘇聯向西歐所購買的技術據估計要比蘇聯自己發展價值要高的多。這種悲觀的論調可以在最近他們在 *Dynamics of Global Crisis* 中的討論看出來。Frank 自己的悲觀論調最為明顯。

在這個情形之下，我們可以發覺到：許多庸屬理論雖然對第三世界歷史性的權力、分工、控制關係有很精細的分析，但對於解決這些問題的途徑却愈來愈模糊。一個癥結是：庸屬理論重新提出了一個大問題，強調它的困難性，但却對解決他們所提出的問題途徑很少提及。他們過去模糊指出的一條路，到現在問題可能也愈來愈多。

再回到問題導向的觀點來，我們可以多少看到它們尚不能滿意地解決重要的問題。順著這條思路，我希望在本文以下專注討論一條可能的解決問題的途徑（或至少是解決一部份問題的途徑）——區域整合 (Regional Integration)。

#### (四) 第三世界區域整合的理論與實際

二十世紀的南方國家對北方國家的出口貿易主要是集中在自然資源與農產品之上。南方國家除了有在上面提過的貿易條件的惡化的問題之外，因為基於大部份的自然資源與農產品的供給與消費曲線的缺乏彈性，這些出口貨品的國際市場價格常常變動的很厲害，所以南方國家不容易制定穩定而長

庸屬理論 (DEPENDENCY THEORY, 或譯作依賴理論) 是六〇年代興起的一個發展理論。一批拉丁美洲的經濟學家受聯合國委託, 研究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發展, 從研究中形成的一套理論。這套理論很快地風行學界, 有關書籍論文大量地出現, 還有很多人把它用來探討亞洲、非洲的發展諸問題。

庸屬理論有許多變種。但基本重點為矮化發展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它認為, 第三世界國家的現況是矮化 (UNDERDEVELOPED), 而非未開發 (UNDEVELOPED)。既與西歐國家「現代化」以前的未開發情況不同, 也不等於第三世界國家未受歐美資本主義勢力入侵之前的情況。它們不在現代化理論單線發展線上的任何一點, 當然也就不可能發展成「現代化」的社會。這個理論很明顯地要比現代化理論更接近第三世界的客觀現實, 因而它的出現加速了現代化理論的式微。

如果第三世界不可能發展成爲「現代化」社會, 那麼它是怎樣的一種發展呢? 庸屬理論認爲它是一種將第三世界國家庸屬於歐美資本

主義發達國家的發展。這些資本主義發達國家 (所謂「中心國家」METROPOLIS) 憑藉其龐大的生產力及對世界原料及市場的巨大控制系統, 按其獲取最高利潤的方式塑造了全球性的國際分工。第三世界邊陲國家 (PERIPHERY) 在這鉅大無比的無形的市場壓力及有形的帝國主義干涉下, 逐漸成爲國際性質資本主義生產大機器的一個零件。因此, 他們不可能像歐美當年那樣, 進行自己的資本主義化或「現代化」; 也不可能維持在自給自足的原來生產系統下。這就是庸屬理論所說的「矮化發展 (UNDERDEVELOPMENT)」。

庸屬理論受到來自左與右的攻擊。左派主要批評庸屬理論太重視外因 (矮化是受國外中心國家的影響) 輕視內因, 右派除堅持現代化理論外, 又舉出「亞洲四隻小老虎」爲例, 認爲庸屬理論不能解釋這幾隻小老虎的發展情況。這只是舉其最主要的。其他批評論點還很多。當然, 庸屬論若對這些批評也都有所說明或反擊。論戰方興未艾, 是近十多年來社會科學界的一大論戰。

期的經濟計劃。解決這個問題的一種方法是出口國間彼此協調出口量額以求得穩定而最理想的國際價格。從經濟大恐慌後這種出口協調合作的做法就慢慢在一群群相關聯的南方國家之間流行起來 (當然, 最著名而有效的出口組合是「石油出口國家組織」OPEC)。

另一方面, 歐洲在五零年代末也開始組織共同市場, 它們對外樹立起共同的策略性關稅 (製造業進口高關稅、自然資源低關稅), 對內則逐漸減低彼此國家間的關稅, 一方面鼓勵共同市場內的競爭, 另一方面也希望造成勞力與資本的流動性。歐洲共同市場 (EEC) 的形成有效地促成二十世紀上半葉民族主義衝突最大的地方的區域政治整合, 有效地削弱了戰後美國龐大出口力所帶來的壓力, 也有效地吸引美國到歐洲共同市場內來做投資。它多少

促成了歐洲美元的成形, 但歐洲美元對歐洲各國的金融市場也產生一定的干擾, 所以EEC近年來的主要課題之一是求得共同市場內進一步在金融貨幣政策的一致步調以來穩定歐洲美元的許多副作用, 并進一步地促成EEC的經濟整合。

### ● 拉丁美洲的一些共同市場組合

從大恐慌後拉丁美洲進入進口替代時期以後, 他們的重工業形態大致上都是民族性的工業加上跨國公司的技術的集合體。但是它們通常都遭到幾個嚴重的問題: 他們大量進口北方國家的生產性貨品但却很難在國際市場銷出他們的工業產品以達成進出口的平衡。巴西、阿根廷因爲具有不小的國內市場, 所以大致上還勉強可以吸收他們自己的工業產

品（但也造成他們國內市場的兩極化問題，因為他們必須維持一個可以吸收他們工業產品的富裕的次消費市場，而以另外一個愈來愈貧窮的次市場為代價），但是其他小國却連一個國內市場都維持不起來。市場的狹小造成生產部門的低度使用、浪費等等問題。基於E E C的成功，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都認為拉丁美洲的共同市場該是進口替代的發展模式的下一步驟。它一方面可以大幅度的擴充各國家的市場、增加生產投資、增加分工與專門化以求得技術方面的進步，它另一方面也可以藉著共同市場的保護而發展它們的工業，不致於在赤裸裸的國際市場上被迫變成一些純粹是「加工業」的國家。總之，共同市場一方面希望能抵抗國際分工的壓力，另一方面能夠利用機會增進合夥國家的工業生產力。

### ● 拉丁美洲共同市場的挫折 與後繼問題的教訓

但是，就像E E C的形成會吸收大量美國的直接投資一樣，拉丁美洲共同市場的形成必然也會、也需要吸收北方國家的投資。可是E E C在處理外國投資的條件上就要比拉丁美洲優越。歐洲國家傳統上工業已經是非常先進，所以美國在E E C的投資對E E C自身的資本額的比例而言不會很大，所以美國並沒有很大的能力利用她的投資行為、方向來影響E E C國家的自主性。另一方面，面對蘇聯集團的壓力，E E C的壯大、自主但親美也符合美國的利益。

但是拉丁美洲的條件就很不一樣。一方面它們的工業資本累積非常薄弱，所以北方國家在拉美共同市場的投資可以舉足輕重，跨國公司可以利用它雄厚的資本、技術、通訊網在拉丁美洲造成像北方國家政府部門一般的影響力，透過跨國公司的「財政與貨幣」政策的衝擊力，很少拉丁美洲的國家能夠與之抗衡。拉丁美洲國家尤其相信一個跨拉丁美洲各國的北方跨國公司很難約束。一個拉丁美洲的政府要約束一個只限制在她國內的跨國公司，要比限制一個可以在拉丁美洲共同市場「內」自由活動的跨國公司容易的多。這個問題使得許多拉丁美洲國家對共同市場的熱心大為減弱。其次，傳統上，美國把拉丁美洲看成她的後院，在沒有一個如蘇聯

集團一樣勢力的團體與美國抗衡的情形下，美國在拉美共同市場內更可予取予求，純粹把拉美共同市場看成資本主義中心國家下分工系統的一環。最後，因為巴西與阿根廷具有廣大的國內市場，它們對共同市場的需求也不急切。

所以，即使從六零年以來有不少拉丁美洲的共同市場的成立，但是在市場內國家的彼此貿易量佔各國總貿易量的比例仍然非常小。比起E E C來說，拉丁美洲共同市場的進展非常小。

可是，不走拉丁美洲共同市場的途徑，拉丁美洲各國勢必走向的另一條路也同樣糟糕。巴西、阿根廷等這幾個大國繼續走它們的老路：和跨國公司合作繼續開發它們的國內市場，而使用的手段是刻意透過稅收、信用制度等造成社會的貧富不均，藉以形成一個富裕的次消費市場來吸收它們國內的工業產品，而以另一個在生存邊緣的次市場為犧牲。這種兩極化的社會會產生社會、政治問題是必然的，但是為了堅持這種發展方式，於是武力鎮壓益形必要，這些都間接地解釋了六零年代後期拉丁美洲軍人政府與軍人勢力的抬頭的原因。當國內市場的潛能已經榨取盡時，巴西等國只好希望能透過跨國公司開始進入美國市場。但是為了要進入美國市場競爭，拉丁美洲國家必得更依賴跨國公司的技術、銷售網等，而所需付出給跨國公司的利益也就更大。當雷根政府多少刻意造成一個經濟大蕭條來解決美國的通貨膨脹等問題時，拉丁美洲國家銷往美國的路徑就立刻受阻，其結果是拉丁美洲歷史性的大欠債。

拉丁美洲當初究竟走共同市場的路好呢還是走現在這條「路」好呢？南方國家似乎仍該多考慮區域整合的可能性。

### (五) 台灣未來的經濟發展與區域整合

#### ● 四隻小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在美蘇冷戰期間逐漸成形的東亞四隻小老虎各個基於不同的歷史條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有一定程度的發展。這幾個國家的出口導向經濟大部份都以美國市場為主，透過美國各大超級市場、訂單組合、跨國公司等銷售與生產網絡向美國輸出半成

品以及許多輕工業成品。藉著它們各個在東南亞的優越的歷史條件、極端權威性的政府控制、廉價又守規矩的勞動力以及許多其他原因，這四隻小老虎在積極參加以美國為中心的生產分工體系之下都有了一定程度的輕工業的發展。但是到現在這種二十多年來的發展模式似乎已經到了一個盡頭。隨著工資不斷在上昇、東南亞以及中國諸國的開始加入輕工業產品輸美的競爭、美中關係正常化與越南易幟等所造成地緣政治的改變等等原因，工業形態的轉變已勢成必然，問題是怎麼變？

我下面希望開始從台灣的觀點討論經濟發展路途問題，我不希望牽涉進任何政治、或意識形態的論爭裏面去，只求就經濟論經濟，做一個非常初步與粗略的討論。

### ● 分工壓力與區域整合

第三世界，或甚至東南亞，對台灣大部份人來說，是非常遙遠的。台灣大部份人所最熟悉的是一些金光閃閃的美國的形象。從第二次大戰後以來，第三世界大部份的國家都多少有了彼此搞共同市場、或至少是共同出口聯盟的經驗（包括ASEAN：東南亞國協），但是東亞的四隻小老虎却非常特殊地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不同（新加坡過去加入ASEAN大部份是因為政治上的原因）。四隻小老虎居與美國或日本的關係幾乎純粹是雙邊的。貿易談判等等都是透過雙邊式的自動設限、進口配額、叫停等等方式來進行。在極為類似的國際分工情況之下，四隻小老虎彼此競爭看誰能夠把工資壓的較低、看誰更能夠保持政治的「穩定」、看誰更能夠對北方國家顯示「友好」并「獎勵」它們來投資、來訂單、看誰的「戰略地位」更重要、看誰更是美日的「忠實盟友」。不可否認的，這種惡性競爭對這幾個國家的社會都造成很大的創傷與犧牲。其次，過去的輕工業它的經濟生產規模（Economy of Scale）都較小，不需要較大的市場，所以往往在貿易談判後美國給予她國內市場約百分之二十左右的配額就很足以讓幾隻小老虎高興不已了。

但是，在發展中間性工業以及基礎工業時，它們典型的經濟生產規模都非常的大，需要更廣大的市場。而且這些類型的工業往往是資本與技術高度集中的工業，所以幾隻小老虎「充沛而守規矩」的

勞動力在國際市場競爭時就已失掉它們的競爭優勢。這整個情勢有點像夾心餅干：在下層有許多更廉價勞力的東南亞國家與小老虎們競爭輕工業，在上層則有北方國家高資本、高技術、市場傳統佔有的等等上限。夾縫裏生存實在不易，台灣的社會又不知要付出多少「友好獎勵」與「不沉的航空母艦」的代價與犧牲。諷刺的是，中美關係正常化、越南易幟、日本興起之後台灣在美國眼中的戰略地位已經大不如前了（現在南韓的「戰略地位」大概重要的多）。

為甚麼不朝向一個東南亞共同市場的方向去發展？透過這種組合我們多少可以解消過去許多與其他東南亞國家惡性競爭的現象。共同市場也可以提供一個較大、又不完全受北方國家高科技產品威脅的市場來供市場中的國家彼此發展。市場中國家更可以學習發展一些「互補」而非互相競爭的大型工業以便充份利用市場的規模。另一方面，共同市場所形成的共同關稅及其他措施可以替市場中國家形成一道屏障，至少部份地阻擋著北方中心國家所產生的分工壓力。台灣有不少不錯的歷史條件促使一般人有較高的知識水平、教育水準，但是過去積極參與中心國家所配予的分工角色的後果是使台灣成爲一個只能靠廉價勞工賺錢的地方。中心國家對邊緣國家的「分工壓力」使得大部份受教育的人民不能夠充分發揮他們的潛能而沉迷在愚民、閉鎖、與浮華的生活世界之中，這分工壓力也使得不少資金外流，尤其是不少知識份子滯留國外。許多大學教育從大學教材開始其實已經在為美國社會造就人才，在留美期間所鑽研的也大部份是為美國社會服務。我們只要比較一下十九、二十世紀一些新興而成長的國家如德國、美國、日本等和現在的台灣，看看彼此間留學與學成歸國的比例就可以看出觸目驚心的結果。

這邊需要簡短地提到：如果東南亞共同市場真的成形，中心國家對邊緣國家群的分工壓力也許將以直接投資的方式重新出現（如前面EEC、拉美共同市場所提過的）。但是我覺得這種壓力應該比較小，而且共同市場中的國家只要充分合作也多少能夠控制這些直接投資者（如果實在沒有把握，限制直接投資也不是難事，不過市場中國家至少要有足夠的資本、技術來發展他們自己區域性的跨國工業）。



---

## ● 日本模式？

---

台灣目前有不少人（大概以趙耀東為首吧）認為一方面要學習日本歷史培養大企業的做法、另一方面則該積極地與日本的跨國公司合作（如大汽車廠），並利用日本的國際銷售網以在將來打入國際市場。當他們被問及台灣怎麼能夠從跨國公司得到技術時，他們回答：「完全靠我們自己的努力」。

首先，就日本歷史發展而言，光靠大企業並不足夠，不要忘記台灣、韓國、中國東北等地對日本經濟發展的「貢獻」。日本在二十世紀初的國內市場大概就已比現在台灣的國內市場大了，但彼時日本還需要拓展她的「大東亞共榮圈」以來對抗西方的壓力，台灣今天能夠不進一步地和東南亞的第三世界國家進一步的合作嗎？（當然，我不是在鼓吹甚麼殖民主義，台灣也沒辦法扮演甚麼「東方的以色列」的角色）。其次，純粹地獨自與跨國公司合作大概很少有甚麼好結果，說「完全靠我們自己的努力」等於沒說甚麼。拉丁美洲許多國家和跨國公司合作的經驗多少可以給我們一些借鏡，當初拉美國家遲疑於合作形成拉丁美洲共同市場的結果是今天這種不可逆的困境。台灣目前尚沒有對一種未來發展的方向做完全的承諾，還有機會做不同於拉丁美洲國家的選擇。

---

## ● 一個擴大的 ASEAN ？

---

東南亞國協成立於六零年代左右。在六零年代以及七零年代初，國協的主要工作是在於形成出口共同聯盟。因為除了新加坡之外，菲、馬、印度尼西亞、還有泰的主要出口大宗都是熱帶地區的一些特殊農、礦產，如天然橡膠、錫礦等，且佔世界該貨品的總出口率達三分之二以上，所以形成出口共同聯盟來防止彼此惡性競爭以及對外一致性的談判是必要的。但是這種形態的農礦業出口對於該區域的經濟發展助益不大，所以國協的國家近年來也想積極發展工業。

國協裏的國家和非洲的許多國家一樣，是第三世界中最晚獨立的一群國家。傳統殖民地的利益仍然存在，一般生活水準很低，國家組織行政經驗等都不太夠，多少仍是在西方國家卵翼之下成長。且

新加坡與馬、印，或者是馬與菲之間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都發生了許多政治地緣性的衝突。即使如此，ASEAN 的合作從六六年以後仍然持續進展，因為的確有此需要。

到了七零年代，尤其是七五年以後，因為國際政治經濟環境都有大的變動，使國協內的合作速度大為增加。一方面是因為國協中的對外貿易關係從以前最密切的美、英、荷轉移到日本，使得國協中傳統殖民的勢力慢慢消退。另一方面則是石油危機使得國協中了解彼此合作的重要性（雖然印尼也在 OPEC 之中）。在政治方面所產生的衝擊更大。在七五年越南、柬埔寨等國易幟，美國勢力大幅的退出中南半島以後，「中立性的自保」便成為國協內國家的一致性外交政策。和中國關係的正常化、和北方強權國家的等距離外交政策都開始實行。其中因為日本在亞洲所扮演的角色愈來愈重要，國協五國也和日本談判要求她在國協中進行互補性的區域性工業投資，如在新加坡建立柴油引擎廠、在泰建立尿素廠、在菲建立過磷酸廠等。

也許台灣，甚至南韓等國都應該加入國協，和國協內國家在國際政治經濟上的步調慢慢整合起來。一個擴大、而更具多樣性的 ASEAN 將使國協對外談判的力量更增強，也將給國協內國家提供一個更廣泛的人力、資金、技術與消費的互補性的區域市場。擴大的國協的對外談判力量，其對日本的地理位置以及市場的重要性，還有亞洲一些其他大國的制衡，以及日本本身外貿穩定對她的重要性等等這些因素都將使國協可以較佳地控制與處理日本在國協中的直接投資。情況至少要比美國與拉丁美洲的關係要好得多。

---

## ● 結語

---

不可避免地，我對台灣未來經濟發展的走向談的非常抽象。一方面我只求一個原則上的確立，後續工作與許多具體問題的解決都需要做進一步更廣的策略性研究。另一方面我希望提示：建立一個東南亞中立性的共同市場和台灣未來的政治、經濟走向二者間的關係很有彈性。即使台灣未來走向北歐式高度合作化的國家或甚至更社會主義化的話，這一條與亞洲第三世界國家共同整合與合作的路途仍然非常值得考慮。

從波蘭的獨立工運談起，談到工會運動的目標、批評了個人自由主義者對工運的看法，闡述工運的更深刻目標在於「改造社會，重拾人的尊嚴」，使「人人都勞動」，「沒有不勞而獲的人」，「人不再被他所創造的成品所奴役」。最後更進一步人要「不斷超越」的理由，亦即是不斷的革命，如此才達到工運的最後總目標。

這篇三、四千字的短文，論述了這麼豐富的内容，而且一氣呵成，條理清晰，讓人了解許多觀念，也涉及（雖未明言）拉丁美洲「解放神學」是怎麼邏輯把革命原理與宗教神學結合在一起。你可能不完全同意文中全部觀點（論者對作者將工運與教會相比擬，即不能完全同意），但它提出的觀點都值得我們去搞清楚。

— 一編者識

# 從波蘭獨立工運 談起



· 高風 ·

波蘭團結工聯領導人華勒沙榮獲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這個消息對華勒沙本人及他所領導的獨立工運而言，不但是精神上的極大鼓舞，也是他們進一步與華沙當局抗爭的政治資本。很少有工會運動像波蘭團結工聯這樣引起國際的注目，並受到全世界正義人士的支持與認可，團結工聯在世界工會運動史上可說是寫下了極光輝的一頁。

工運是上個世紀就有的東西，但在工運前面冠以「獨立」二字，却是近年來才有的事。在獨裁國家中，「獨立工運」的意思是指獨立於政府控制的工會運動；在現今的「民主」國家中，「獨立工運」則指獨立於黑社會及資本家操縱的工會運動。

任何一個工運都是在鮮血與淚水中成長的；工運經過一個世紀以來不屈不撓的發展，時至今日，不但一般人都明白工人自組工會的必要，就連工運的敵人，也必須順應激流，不敢否定工人組工會的權利，然而他們却在暗中抵制、破壞或操縱工會的運作。因為如此，在波蘭等地才有人想在現有的工會之外，再另組不受控制之獨立工會，以有別於那些受控制的現存工會。

工會運動的目標常常被人誤認為只是改善工人福利而已，持有這種看法的人，往往到後來會敵視工運，認為工運「走火入魔」或者「過火」等等。這種把工運只當作工人爭取福利的看法，基本上假定了工運是一種爭權奪利的事情，在這假定的背後，便是主張「自私是人性」的自由個人主義哲學。這個哲學因此主張：因為人自私，所以人會去爭權奪利，但是每個人都有爭利的權利，在認可工人有爭利之權的同時，也一定要認可他人（資方）有爭利之權，否則資方也就不會認可工人的爭利之權；由於一方之得利，往往是他方之失利，所以一定要由自由市場決定一個平衡點，當雙方都在那個平衡點上時，雙方的利益都因此而擴大，所以工運必須適可而止。這就是自由個人主義的看法。

把工運當作爭權奪利之事的人，也許就把波蘭團結工聯看成工會與共產黨爭權，工人不只要「先鋒隊」的「間接專政」，工人要自己統治波蘭；或者把美國團結工聯看成工人在這個人吃人、狗咬狗的社會裏，為着赤裸裸的利益而鬭爭，却以美麗的言詞做修飾等等。這些人可能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

，而工運的目標之一，其實就是要這種人轉醒過來，看見人應與禽獸不同，人不應是為爭生存而生存，人自私的表現是病態社會制度的結果，當人透過工運去改造社會後，人終究可以重拾人之尊嚴。

獨立工運的初期具體目標，當然是「工人有其廠」這個理想，但這不只是指生產工具所有權之歸屬，而是生產線上之工人亦能參與管理工廠之工作，即一種徹底的工人自治：從市場決策、產品設計與開發到作業流程之設計等等，都有勞力者之參與，從而打破嚴格之分工制度，使勞心與勞力的分界消失。

有些人常認為工運終極的目標一定是某種特定的形式，如：各地工人形成以某一生產中心為主的自治社區。每個自治社區都是彼此平等的，自治社區之上沒有更高的權力機構，國家消失了等等。

還有人以為不必把工運終極的目標侷限在某種烏托邦的設計上，工運終極的目標是要人人都成為工人，即一個勞動（勞心與勞力）的人，也就是真正的人，因為人的本質是勞動（這是人異於其他動物之處）。由於不再有不勞而獲的人，也因此人人都變成真正的人。在這種看法裏，強調的是人的勞動決定了勞動成品的價值：人是他所創造之物的主宰，而不應被他所創造出的成品所奴役，反過來決定他的價值。雖然在今日的社會裏，我們常常看到工人所創造的產品，變成了與工人敵對的主人。（比如一部豪華汽車，就成了製造它的工人的惡夢，它象徵了工人想追求却永遠不可及的生活，因此它映照出工人永不可能改變的悲慘命運，它也彷彿成了另一階級對工人嘲弄輕視的聚焦。工人成了奇怪的藝術家，不但不欣賞自己的創作，反而仇視。）勞動成品透過市場操作可以決定工人薪資，或者決定這種產品的工人還有沒有用等等，勞心者亦復如是。當產品變成商品，人又成了商品的奴隸時，人亦變成商品，而工運的目標，正是應當改變這種商品化了的社會，使人成為人。

不過以上這種看法，依我之見，還有一種缺點，那就是這種看法的最高目標，只是「人成為人」，而這裏講的「人」畢竟是個有限的生物，仍然逃脫不了無意義的渺微（*TRIVIALITY*），人固可成為自己的主人，但生命的意義，甚至歷史的意義，究竟在哪裏呢？人的終點是死亡，死亡使得一切都變得似乎無意義了。

但是人真的是有限的嗎？人沒有無限的成份嗎？我們注意到，人的確有無限的期望（*ASPIRATION*），因而驅使他不斷的尋求超越，既然是不斷地超越，超越的過程才是重要有價值有意義的，超越的「結果」，就成了我們超越的目標——超越永遠沒有「終點」，所以只要人不斷地超越「不管結果是什麼」，人永遠是勝利者，因此人即使終於死亡這個結果，人也沒有失敗；死亡對人的威脅並非死亡本身，而是死亡所象徵的，即奮鬥的徒然，生命的無意義，但是如果因為不斷超越，奮鬥就無所謂徒然，因為奮鬥的結果亦成為超越的對象，生命的意義，奮鬥的報償就在那不斷超越的行動的本身，所以死亡不能再威脅我們，人可以說戰勝了死亡。

當我們把「不斷超越」的概念，放在政治的系統中時，我們就看到它可以替工運提供一個視野更寬廣更激烈的目標。工運的目標不再是建立一種烏托邦，而是人的不斷超越今世的政治社會經濟制度及文化，人在參與與工運中，不但成為人，還成為「超人」。超人的本質從這個觀點看來，絕非一固定之狀態（不是一個名詞），而是一超越過程之性質（是個形容詞）。簡言之，超人的本質是「革命的」。

如果人決心對他心中的無限期望有所認定（*COMMITMENT*），人就必須成為一個永恆的革命者。一切人可以達成的目標都不再是神聖的了，當人停止超越而說：「這已經接近真理了，這已經接近天堂了，這已經接近奮鬥的終點了，革命可以停止了。」人就墮入了一種「偶像崇拜」。

工運很像是人的教會，教會的原意不是指教堂，而是指一群人所構成的結合體，這結合體有共同的精神目標。因為若參與工運者是被那無限期望（可以想像成「神」）所感召，在參與中，人就已經得到了救贖；因此，不論工運的成功或失敗，亦不論社會或經濟科學的預測（如資本主義經濟是否會崩潰等等），人只聽到那無上地斷言命令：要革命！這是神的最大誠命。

一切尋求超越過去及今世的社會運動，因此都被放在同一角度來評估，工運和婦解、民權運動、同性戀權利……等等一切，都完全一樣，並不再具有特殊的優先地位。

人要滿足生物需求是件自然的事，也是必然的

事，同樣地，人要成爲人，也要很自然及必然的事。這樣說來，人如果要成爲人，還談不上人是自由的，因爲自由必須超越必然性的限制，故人只有在成爲超人時，才得到真正的自由。因此，如果人只是爲了滿足生物需求而參與社會運動，或者只爲了現實一個人能像個人樣活着的社會而參與運動，都不是真正的自由人。只有那爲着尋求超越而參與運動的人，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及解放。對於最後一種人而言，參與的本身，即尋求不斷超越之過程的本身，就保證了自由以及意義。對前面兩種人而言，如果發現追求的理想國永遠不能實現時，他們就無法對運動賦予意義，理想國或一套完美社會設計的幻滅，對他們而言，就是意義的幻滅就是終點。但是不斷尋求超越的人的基本出發點却正是那個終點——如果今世就是理想國，他們也藉超越，也要那理想國幻滅。

不是所有的社會運動都是尋求超越的，超越與倒退有別，革命和反革命亦有別，因此追求超越者必須使用理性及科學，對他所身處之社會與文化有所分析及了解。但是一切科學只能指出「是什麼」而不能指出「應該怎樣做」，所以最後仍然必須對人的本性及歷史的意義（即，超人的本性）有一種

信仰、一種認定，才能尋求不斷超越。很多人認爲對人性及歷史意義較具洞察力的觀察，都在重要的宗教典籍及不朽的文學作品中才能發現。同時，有的宗教典籍比其他宗教聖書提供較豐富的宗教象徵，可供一宇宙性的（UNIVERSAL 意指不限種族文化宗教派別之意）神學理論發展之架構，有了此一架構便可據之來分析其他宗教典籍及文學作品。另外有的宗教典籍本身便是許多不朽文學作品之靈感來源，那麼這一宗教典籍，便亦有很特殊之地位。有些宗教較其他宗教與哲學理論關係密切，這也是此一宗教的地位較其他宗教特殊，因爲一宇宙性的神學必須以哲學爲根基。許多人覺得東方的基督教（基督教源於東方，其思路基本上是東方式的，只是後來流行於西方，常被誤爲「西方基督教」）正具有上述的特殊地位，也因此企圖從基督教神學來發展本文中的談到的「不斷超越」等等概念。關於這一點，有機會再談。

追求「不斷超越」的人與要使「人成爲人」的人，從歷史上來看，一直是並肩作戰的伙伴——直到後者拒絕繼續革命爲止，兩者才會成爲敵人。

## 稿約 — 這-是-您-的-刊-物 — 稿約

民主大家來，台灣是大家的台灣。「民主台灣」是您的刊物，是所有關心台灣、贊成民主者共同的刊物，而不是作者、編者少數人的。我們最大的目標，不單是在林林總總的海外刊物中增加一份可讀性高，富有知識與資料的刊物而已。我們更希望這份刊物能成爲一個橋樑，溝通不同的意見，增加對台灣的關懷與認識。讓我們知道，有共同理想的人到處都有，而且愈來愈多。讓有心人士不覺孤立無力，在海外或回國能爲我們的故鄉，爲社會正義而努力。

因此我們特別需要您的來稿，或來信討論、批評、或捐款、介紹朋友。我們題材很廣、只要跟台灣有些關係。方式不拘，專文，隨感，漫畫，文藝等等都行。我們力求包容性大，只要不流於謾罵或不實，各種意見立場都歡迎。當然，我們會有開放

而慎重的審稿，以向讀者負責。代表我們意見的，將以本刊，本會與編者按語表達。長度亦不限，但最好在二萬字以下（這是篇幅所限），過長者請先與編者聯絡。

請橫寫。我們有稿紙備索。我們很窮，暫時發不出稿酬，但可以贈送五本給您的朋友（來稿請同時開列名單）。

關心台灣，提倡民主本是光明正大的事。但一些嚴峻的事實，特別陳文成事件的先例，使大家都很小。我們對來稿來信，都將絕對保密。歡迎筆名聯絡，但請附上通信住址與電話。

來稿與信寄到：「民主台灣」編輯部

O S D M T  
P. O. BOX 53551  
CHICAGO, ILL. 60653

・卜今・



第五十一州？  
第三十二州或  
美利堅合眾國的

台灣——

## 1 美國參議員討論與決議台灣前途 ☆☆☆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位於華盛頓國會山莊的美利堅合眾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了所謂的「台灣前途決議案」。不熟悉世界地理的人或許會誤認台灣和波多黎各一樣，是美國的屬地之一；否則美國國會怎能公然討論，甚而「決議」台灣的前途？然而，台灣的確不是美國的一部份，至少法律上，政治上都還不是。

如果，類似內容的議案在位於北京人民會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討論且獲得通過，其意義當然有所不同。

如果，類似內容的議案在位於台北陽明山中山樓的中華民國國民代表大會上，或是在位於霧峰的台灣省議會上討論且獲得通過，其意義當更有所不同。

可惜，討論台灣前途且作成決議的，竟然是身在距台灣數千里之遙的美國參議員們，這究竟代表了什麼意義呢？

讓我們回顧幾幕史實，或許可以略窺其中的梗概。

## 2 “最密件”的袖裡乾坤 ☆☆☆

遠在一百多年前，一八五七年三月十日，美國駐中國使節彼得·派克（PETER PARKER）以「最密件」向美國國務院遞交一份報告，他在這份文件中寫道：

「……台灣作為一個煤補給的來源，是建立一條自加利福尼亞州延伸至日本、中國的汽船運輸線的最有利條件。這個島嶼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不再是中國的一部份。一旦台灣在政治上，一如它在地理上一般與中國分離的時候，美國應即刻佔有台灣。這項行動對美國的利益是顯而易見的。」（註一）

由這位當時美國駐中國外交高官的口中陳述的對台灣的野心，較諸當今的「台灣前途決議案」，更要直接了當得多。

派克畢業於耶魯大學神學院，是個受過醫學訓練的傳教士。當他於一八三四年第一次抵達中國時，在廣州開了一所眼科醫院，在中國奠下了西方神職人員透過醫藥服務在中國傳教的基礎。他和霽可親的個性很快地就贏得了當地中外人士的好評，廣交各色各類的朋友。因此，在一八三七年美國無武裝船摩里森號（MORRISON）對日本的探察任務中，派克也參與了一角。他於一八四〇年返回美京華盛頓，利用裙帶關係攀緣上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厄尼奧·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於是輕易地就擠身外交圈中。派克是當時少數精通中文的美國人之一；一八四五年美國駐中國使節團正式成立的時候，派克被任命為該團中文秘書和翻譯官。此後十多年他始終留任中國，逐步高升，不久即成為美國駐華外交官員中最具中國經驗的資深外交官，在當時的中美關係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一九五五年九月，派克終於被任命為駐華代辦，成為第一個精通中文並由駐華使節團內基層出身的駐華高級官員。

## 3 十九世紀美國向海外擴張的背景 ☆☆☆

一九世紀中葉的美國，大致上完成了美洲本土上的擴張，到一八五四年已擴展成為擁有三十一州，八大領地（TERRITORY），地跨兩洋的大國。當時美國國內以農業為主的南方各州與以工業為重的北方各州為了爭奪勞工人力，就黑奴問題時起衝突，對立的形勢日益尖銳。為了緩和內部的緊張壓力，同時為不斷增產的工農產品尋求更多市場，向海外擴張就順理成章地成為必然的主要政策。當時歐洲各帝國殖民主義列強在蠶食了非洲、中南美之

後，正開始瓜分亞洲的行動。爲了擠身世界列強，拓展海外勢力，美國在亞洲不甘後人。一方面在中英鴉片戰爭事後的和談中插足，迫使中國於一八四四年簽下了「中美望廈條約」，不費一兵一卒就取得了與英國同等的優惠待遇；另一方面更積極執行所謂的「砲艦外交」。一八五三年美國海軍艦隊在馬修·培瑞（MATHEW PERRY）將軍的率領下敲開了日本的大門。

#### 4. 顛覆台灣的“戰略地位”與“煤礦”☆☆☆

爲了鞏固「砲艦外交」的實力，並確保太平洋上越洋商船運輸線的安全，在東亞尋找一個良好的煤補給站就成爲一個重要的戰略政策。培瑞建議琉球與台灣是符合這些戰略構想的理想地點，並且認爲「美國有必要在此區域實行領土管轄權」，同時更自命「負起在此區域建立根據地以確保美國在東方航行權的責任」（註二）。由此可見，美國對台灣的領土野心，至少在一百三十年前就已經是美國政府官員們積極執行的帝國主義政策之一了。

事實上早在一八四七年，美國與英國海軍就已經對台灣島上的煤礦進行了有系統的調查。差不多同一個時期，美國的「半島與東方汽船公司」（PENINSULA AND ORIENTAL STEAMSHIP COMPANY）與台灣島上的住民簽下了合約，以七塊錢一噸的價錢買下了七千噸煤。一八四九年七月，美海軍雙桅艦海豚號（DOLPHIN）在艦長奧格登（OGDEN）指揮下駛入基隆港。當地的地方官員與百姓亟力阻止奧格登欲勘察附近煤礦的企圖，然而這位艦長仍設法偷運出了一些礦煤樣本，送返美國國內化驗。據一份正式的探察報告上記載，基隆煤礦的質量比英國利物浦的煤質還要好。報告中並警告說「有了如此便利的煤源，可以減少美國對歐洲煤源的依賴。這將很快地引起其他國家對台灣的注意」（註三）。顯露了對台灣欲擒從速的心態，想要先拔頭籌，以免遭到其他國家干涉的後患。

#### 5. 從尋求發財到確保擁有的利益 ☆☆☆

海豚號探察台灣之行的另一目的是找尋另一艘美國商船水魔號（KELPIE）的生還者，水魔號於自廣州返美的航程中，在台灣附近觸礁沉沒。當時在廣州與香港都傳說，船上有部份生還者被台灣島

上的高山族俘獲。罹難者之一的兄弟小奇帝·耐（GIDEON NYE JR.）是彼得·派克的老友。奇帝·耐剛在商場上失意，損失了一大筆錢，正想找尋東山再起的良機。海豚號的台灣之行引起了他的興趣，藉著找尋失蹤兄弟的下落，他開始密切注意利用台灣資源發財的可能。

一八五四年培瑞將軍率艦隊抵達台灣，引起了更多美國人對台灣的興趣。一個歸化爲美國籍的秘魯海軍軍官羅賓聶（ROBINET）與奇帝·耐一拍即合，合夥組成公司，積極在台灣探勘佈署，最後強行取得了樟腦的壟斷買賣權，並在高雄港建立武裝根據地，號稱是「保護」高雄免遭所謂「海盜」的襲擊。這些美國商人更在港口高高升起美國國旗，視高雄如己地。不久美國人的囂張行徑引起了當地人民的不滿，起而反抗。武裝的美國商人以武力要脅鎮壓，迫使當地住民屈從，儼然成爲有實力的獨立地方當局。

爲了確保他們在台灣擁有的利益，耐與羅賓聶計劃向美國政府進言，只要美國政府首肯他們的建議並且願意承擔保護的責任，他們就在台灣成立一個獨立的台灣政府，先脫離中國的統治，伺機再與美國合併。

奇帝·耐將這個主意告訴他的老友派克，獲得這位美國駐華高級外交官員的熱烈支持。當時派克正因主持修訂「中美望廈條約」的工作無甚進展，急欲找尋其他表功的機會。耐與羅賓聶奪取台灣的主張完全符合培瑞想要運用台灣煤礦資源的戰略構想，正可讓派克一展才華大爲表現一番。於是派克在一八五七年二月十二日向國務院遞交一份公文，內附耐與羅賓聶將台灣收歸爲美國保護屬地的建議。公文中陳述：「台灣給美國帶來航海與商業等多重利益，美國政府不該在這項行動上退却」（註四）。換句話說，美國政府應當勇往直前，即刻併吞台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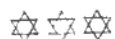
#### 6. 併吞台灣的各種準備動作 ☆☆☆

十天之後，派克與當時美國駐中國海軍艦隊總司令詹姆斯·阿姆斯壯（JAMES ARMSTRONG）將軍在澳門秘密聚會，計謀以先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中美軍隊在廣州附近的衝突事件（該事件的肇因是美國希望在修訂「中美望廈條約」的過程中獲得更多好處，有意製造事端以做爲談判籌碼，因而覓機

挑釁，擴大為武裝衝突，美國軍隊甚至攻下了一處中國要案）為藉口下手，奪取台灣，作為對中國政府的報復行動，並且認為此舉在「國際法公認的原則下」也是站得住腳的（註五）。如此，併吞台灣行動的客觀口實也找好了，萬事具備，所欠的只是在美京華府的最高當局同意認可這項行動這一股東風而已。

三月十日，派克不耐等待，再度發出前文提及的公文報告，其中更主張「美國佔領台灣有助於這一個區域內國際勢力的平衡。英國在亞洲有錫蘭、星加坡、香港，它應該沒有理由可以反對美國占有台灣」（註六）。

## 7. 英美爭食獵物



英國當然不願台灣這塊美味由美國獨享。三月二十一日，英駐港海軍將領向原非美國人的羅賓遜表示：「台灣不該再由無法制止當地住民濫殺失事船隻乘客的政府所統轄」（註七）。並試探性地探詢羅賓遜是否反對英方派遣一名海軍觀察人員進駐台灣。

轉籍為美國人的羅賓遜終究對美國較為忠誠。他立即將英方的意圖通告派克。派克立即致電英國駐華使節約翰·包林爵士（SIR JOHN BOWRING）表示「一旦台灣在政治上脫離中國，美國具有佔領台灣的絕對優先權」。他所持的理由之一是「美國國旗在該島上飄揚已超過一年多」（註八）。同時派克與阿姆斯特壯再度密商，共同決定應儘速派遣美國海軍進駐台灣，設立總部，因為「總部的設立與島上的美國領土在未來可能與他國就台灣問題起爭執時，將具關鍵性的重要地位」（註九）。英美這兩個新舊帝國主義盟主正生動地扮演著一幕爭食獵物的醜劇。

## 8. 美國南北戰爭對台灣的影響



綜合這種種美國官員與商人當時對台灣的舉措，美國佔領台灣，收為保護領地的情勢如箭在弦，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所幸，美國內部南北對立的緊張局面日益高漲，美國政府在兩度改選總統之舉，無暇顧及遠在東方的台灣問題。派克等人多次的建議進言，日久失去了原有的衝擊力，終究沒有得到任何官方的認可，未能採取最後的步驟。

一八六七年美國商船流浪者號（ROVER）在台

灣南端海面沉沒。據說船員被島上的居民所殺。六月十三日，美國海軍貝爾（BELL）少將率戰艦哈福特號（HARTFORD）與懷俄明號（WYOMING）登陸台灣，美國軍隊一百八十一人登岸與當地居民激戰，雖然島民終被逐入山區，但美軍在陣亡一人，中暑十四人的代價下，最後也只得無功而退，未達長久佔領台灣的目的。

美國經歷多年對台灣的覬覦，終究不得掠取台灣。然而美國垂涎台灣的種種行徑，激發了日本對台灣的野心，始則與美國聯手勘察台灣，繼而後來居上地擺脫美國而單獨行動，終於導致甲午戰爭後日本要求割讓台灣的惡果。

## 9. 第三十二州或第五十一洲



回顧了這幾段史實之後，難免叫人有所揣測。

一八五七年，在幾個美國處理亞洲事務的文武官員及在台灣有商業利益的美國商人的大力推動下，台灣幾乎成了美利堅合眾國的第三十二州。

一九八三年，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了所謂的「台灣前途決議案」，雖然在內容上較諸派克等人吞併台灣的主張要含蓄許多，但是所謂的「台灣前途問題」公然成為美國國會的議程，不再只是外交官員或商人們的建議進言，在政治的層次上更上一樓。過些年月，台灣會不會真的成為美利堅合眾國的第五十一州呢？

### 附註：

註一：彼得·派克書信錄，美國參議院文件第二十二卷第三十五之二冊第一二〇八頁。

註二：培瑞將軍書信錄，美國參議院文件第三十四卷第三十三之二冊第八十一頁。

註三：「中國寶藏」（THE CHINESE REPOSITORY）一八四九年七月號。該月刊於一八三二年至一八五一年期間在廣州、澳門等地發行。

註四：同註一，第一一八四頁，第一二一一頁至第一二一五頁。

註五：同註一，第一二一一頁至一二一八頁。

註六：同註一。

註七：同註一，第一二四六頁。

註八：同註一，第一二四七頁至第一二四九頁。

註九：同註一，第一二五〇頁。



# 清末台灣的一個考察

——并試論如何正確地認識  
日人治台史（上）



戴國輝 原作  
林真理 改譯

一九八三年五、六月間，台灣的黨外刊物間曾發生過一個小型的論戰。論戰的起源是「生根」第八期的一篇文章「後藤新平」。這篇文章的作者及該刊編者將日據時代台灣的一個統治者後藤新平視為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引起了台灣一些反帝國主義者的批判。

批判的角度着重在反對該文認賊為父，但對於台灣現代化的問題則並未深加探討。剛好台灣史學者戴國輝先生七月初來芝加哥，在本會的夏令營討論會中談到此事。戴先生遠在十多年前便已注意到這個問題。當時日本學術界也普遍認為台灣的現代化是日據時代日本統治者奠定的。戴先生以嚴謹的學術研究，發現在日本佔據台灣之前，台灣已有相當現代化的基礎。戴先生這個研究成果，剛好彌補了台灣「現代化」論戰的不足，特此推薦給讀者。

本文原文為日文，刊於「仁井田陞博士追悼論文集」第三卷，勁草書房，一九

七〇年。譯者林真理按語說：「它曾經給日本學界以及在日留學生界帶來過不小的衝擊。論文雖成文於一九六七年，它具有的創見，在當前的台灣仍有深遠的意義。」本文雖已有譯文，但譯得不理想，流傳亦不廣，因而重新改譯，並得戴先生贊同，加上若干新材料。

前兩期刊出「前言」，「台灣開發小史」及「洋務運動在台的背景」。「前言」深入討論了如何認識日人治台史，反應了戴先生史識與史觀。「台灣開發小史」及「洋務運動在台的背景」則以社會經濟史學的觀點與方法來整理洋務運動前的台灣開發史及經濟、社會背景，襯托出日後洋務運動所以能在台灣成功而在大陸失敗的基本原因。本期則介紹初期洋務運動的實況，並分析洋務運動在台灣的特殊性。

——編者識

## 二、洋務運動在台灣的實況

### 1 台灣的特殊性與初期在台洋務運動

所謂洋務運動者，一般係指第二次鴉片戰爭，即英法聯軍之役終了以迄第一次中日甲午戰爭（1860～1894）的三十五年間，由清朝官方自上而發動的一種自救運動。

運動的主要策畫者，為當年已開始具有買辦傾向的當權派大官僚們。他們日後因而形成「洋務派」。

#### 洋務運動的內容與目的

他們認為，並不須改變其體制結構，更無需洗心革面改造其精神「深層結構」，僅僅借披西方資本主義的外衣即可挽回頹勢，且亦可試圖維護他們的封建支配體制。

洋務運動當初的主要目的有二：1 欲藉運動的「成果」，來壓制國內的反體制運動。特別是因社會經濟結構的逐漸解體而惹起且不斷高漲的農民運動。2 以毒制毒，欲藉「洋為中用」來加強防務，以防備與對抗日益逼迫的外來軍事威脅。斯時，西方殖民主義先鋒隊的進軍喇叭及槍聲，已在國界各地高鳴響徹。

很顯然，洋務運動一開始就涵有濃厚的軍事色彩。因此，我們亦可把洋務運動視為，以軍事目的為中心的一種「近代化」運動，或者是「西化」運動。

儘管洋務運動具有濃厚的軍事性格，但因洋務運動所開創的軍需工業以及所加強的防務諸措施，必然地將會帶動「民需」部門產業的開展。

因限於篇幅，拙文將自限主題，只就非軍事側面來作探討，希有所見諒。

我們必須先確認，洋務運動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及其本質，是不曾因地——大陸沿海地域與台灣島嶼——的差異而有所不同的。

#### 洋務運動在台灣的特殊性

但只要依據「比較分析」視角來展觀，我們亦不難尋出台灣所獨具的特殊性格和條件。

第一，我們可以發現，洋務運動在台的實施時期，較大陸的運動要晚許多。它創始於大陸洋務運動的第二期，也就是「官督商弁」時期。有關在台開展日期諸問題，我們俟後還會詳述。

第二，就地理政治學（GEO POLITICS）的觀點而言，本為南海孤島的台灣，雖免受輕視是不待言的。可悲的是，斯時的當權集團，仍然保持其「夜郎自大」的「中原正統」價值本位觀，不但未能早覺出「西方的衝擊」所帶來者為何種內容與何種情勢。他們依然故我的把台灣當著邊陲「化外」之地來看待。

除了上述傳統心態的作祟以外，同時期的台灣，很顯然又不是屬於當年洋務主流派，特別是北洋派的勢力範圍。台灣因而不受重視是有其道理的。這一點，值得我們特別留意。

第三，我們有必要提出，同期間台灣社會經濟的特殊狀況：1 台灣經濟已具有如前所述的規模，其商品經濟的成熟度亦達到相當高的地步。2 台灣經濟就其進出口而言，包括移出入和輸出入的「貿易平衡」上業已形成順差。樟腦及茶葉等的台灣新特產，在國際市場的聲價已逐漸被肯定和接受。故

若單就台灣一島經濟的立場來言，台灣經濟本身已足以抗衡「洋貨」和鴉片的進口。台灣很充裕地已形成貿易的出超。「島嶼經濟」的優越性日進月步地在醞釀。3. 台灣農村的階級關係有異於對岸大陸諸省。我們雖然無法尋出有關證據來詮釋和印證。但眾所周知，漢族人士在台的拓墾歷史並不長久。尤其是中北部和東部（花蓮與台東）的新開墾地域的階級關係顯然地有異於大陸農村，是不必贅言的。

#### 當時台灣的社會經濟矛盾有異於對岸大陸

當年的先住台灣人（NATIVE TAIWANESE），除了平埔族已達到農耕生產初期階段而外，其他的高山諸族，一般來言還停留在打獵、補魚，最高者亦不過是過著「燒圓式」極為原始的農耕方式的階段。

雖然，嘉南平野以南較早被漢族蠶食，開拓為美田沃野外，中部以北的台灣却因泰雅族的人數眾多且抗擊力量可觀，漢族的入侵蠶食只得牛步漸進，其範圍一直到清朝中期尚停滯於山麓以西較為平坦的沿海平野地帶。

故而，在這一地帶的耕種農戶的的確確流了血汗，以頭顱換來他們的「開墾地」，且確立其自耕農或「小租戶」的地盤。

晚清，因大陸農村經濟的破產，新推出一大批破產農戶向台灣「求墾殖」的原始障、檜樹林地帶進軍。一步一步的迫使泰雅族人向後山深谷退守，新來漢族開拓人士則伐樟木、蒸樟腦，開水田播種水稻，開闢地栽植甘蔗以求生存。

類似的推展，晚清期的中北部台灣以及東部的一小部分平野地帶亦可發現自耕農或「小租戶」的出現，及小農經營的開展。結果促進了「國內殖民地＝台灣」的「民富」的累積。

從此可以判定，類如上例的台灣中北部、東部農村的階級關係與正在面臨鴉片、洋貨的大量入侵加速解體的大陸沿海一帶農村的階級關係，在本質上是具有其差異的。先進南部台灣的平野地帶，因拓墾歷史早且久，因而佃農、「小租戶」、「大租戶」的關係相當地「成熟」，當然我們需要另文別論。但這一期間，中北部、東部的新開墾農村在社會經濟上的主要矛盾却並不呈現於階級矛盾上，仍然

顯現於種族矛盾——高山諸族與漢族——上面，自不待言。台灣洋務運動有關民需部門的茶葉、樟腦，包括帶有部分軍事色彩的硫磺、煤炭主要生產於這個地帶。因而我們特別點出中北部、東部的有關社會經濟概況。4. 一般而言，晚清期台灣經濟主流已非以自然經濟、自給自足一埒制為主要基礎。幾乎所有的農產物皆以輸出國外或移出島外為目標而生產者（當然高山諸族的經濟生活另當別論）。

當時，台灣南部的平野地帶，開墾歷史早且久，因而佃農，「小租戶」、「大租戶」的關係相當地「成熟」。中北部、東部的新開墾農村自耕農或「小租戶」才出現，社會經濟的主要矛盾並不呈現於階級矛盾上，而是種族矛盾——高山諸族與漢族——上。

5. 已有「郊」行商人資本家或從買辦地位巧妙地逃出，並樹立自家地盤的商人、商業資本家在台灣出現。逐漸擴充其勢力及活動範圍。這些新興的商人、商業資本家大多不與中央權力機構無直接關係，他們中的一些先進人士，甚至於遊戈於清廷和外國諸勢力之夾縫中，尋「孔眼」而出入歐洲、日本、東南亞、對岸大陸等市場。他們從而通達國際情勢（註42）。但他們始終仍然保持著「店」在台，「家」居於閩的雙棲生活方式。

由以上的檢討，在洋務運動的創始，與其視為由清廷官方單方面，自上往台灣「強制」下注而實施，勿寧說在洋務運動，的確確具有它本身，以其本位的經濟發展階段與基礎，而加以國際情勢在台灣圍已見有風聲鶴唳之勢。日蹙緊張為契機，而自大陸誘引進來者較為中肯。

#### 台灣洋務運動的開始

在洋務運動，肇端於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註43）。當時，總理船政大臣沈葆楨在有關於台灣防務奏摺中，為加強在台防務的一環，他建議清廷架設陸上及海底電綫。以便台灣府與台灣南

部（糾紛頻起之地）之間，以及台灣島與對岸福建之間的訊息迅速傳達。架設電纜工程，後來成爲在台洋務運動的一件大事。

一八七四年，因「牡丹社事件」（爲明治政府第一次侵台軍事行動）而被委派「辦理台灣海防事務」的沈葆楨，當他處理上述事件的善後之後，進一步建議福建巡撫移駐台灣，以加強台灣的治理，除此以外沈亦爲了鞏固台灣防務起見，積極地嘗試刷新台灣的行政、促進東部的拓墾、勞衆動資獎勵開山闢路，並整編駐台軍隊以及築建臨海砲台等等的新措施。

洋務運動要務之一的槍砲及輪船之試造，曾國藩、李鴻章及左宗棠等洋務派頭頭，大致已在大陸有過試辦。沈葆楨很可能欲繼其後，自台向大陸的洋務運動來個呼應，他對台灣煤礦的開採以及原料鐵礦的試探表示過濃厚的興趣。

由葆楨明言「開煤、鍊鐵有第資民力者，有宜參用洋機者，就近察勘，可以擇地而興利。」可窺伺其一斑。沈進而亦婉轉地指摘「南洋派」一味偏重洋務於東南諸省，而忽視一向與東南諸省有著「唇亡齒寒」般密切關係的台灣爲不當（註44）。

#### 煤礦的開採

事實上，沈在其任內，即特別致力於美英兩國早已留意，正在伺機入侵雞籠煤礦的開採。

首先，葆楨於一八七五年一月十二日所上奏的「台煤減稅摺」（註45）中表明，應除去稅制上對台煤的限制，俾使台煤最低限度能與日本產煤相互競爭爲要緊。蓋，當時的通商稅則因受西方列強之強制，洋煤進口稅僅爲每噸五分，但土煤的搬入關稅却反高爲每噸銀六錢七分二厘。因而洋務運動中所增設的船政局和軍需工廠所需煤炭，幾乎全部仰賴洋煤。土煤（台煤不過是其一例而已）的開採被逼居於甚爲不利的地位（註46）。

同年五月，沈雖被擢昇爲兩廣總督兼通商大臣，但由於前述的上奏被採，他一面推辭就任新官（後來乃趕赴任），一面聘請英國人士霍薩（DAVID TYZACK）來台探查煤礦，根據其調查報告草擬並呈「台北議購開煤機器摺」，建議有關當局購買新式開鑿機器和聘用外籍工程師（註46），以便

開展盛舉。

翌年，即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當局聘來了外籍工程師，新式機器亦陸續運到，乃正式進行開採雞籠八斗煤礦。其開採督辦則經福建巡撫丁日昌的推薦，復得李鴻章和沈葆楨的贊同，委派精通船政的廣東題奏道、葉文瀾到任。

再者，丁日昌巡撫亦爲洋務派大官之一，故他不但督辦開採礦源，並親至台灣視察與督促下屬調查硫磺、石油等（註48）。尤值我們注意者，他經過調查後，在台嘗試開採，大陸未曾試掘過的石油資源（註49），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創舉。

是年，八斗煤礦裝置了日產數百噸的機器，挖鑿直徑十二、五呎的豎坑二百九十五呎，而在坑底二百七十呎深處掘到厚三呎的煤炭層，算是開端有成的好徵兆。它頭一年的日產量僅止於三十~四十噸。但第二年（一八七七年）不但重新裝置了供通風用的基拔式風扇（GIBBAL FAN），亦復新掘直徑八、六呎的豎坑深達八十八呎，日產量大幅增加，遂達二百噸的高產。據外籍工程師所紀錄，該礦的煤質甚佳，至於同坑的儲炭量亦可達二十萬噸（註50）。

#### 架設台灣的第一條通訊電纜

丁日昌，他在巡撫任內，不僅實際上開採了煤礦，他並恢復了因沈葆楨的離任而中斷一時的電纜敷設工程。

光緒三年（一八七七年），丁把電線自福建搬運入台，委命游擊沈嗣先指揮福建船政電報學堂學生蘇汝灼等，自八月十八日至十月十一日，不到兩個月的短期間內，架設完成了安平——台南、台南——鳳山（至鳳山樞後）間的兩條幹線，一共九十五華里。

值得日後國人感興趣者不外是，丁有意識地不假借外籍人士的相助，而純以國人自己的能力來完成該項工程（註51）。這一點，除了應得贊賞外，似乎已顯示出，大陸洋務運動中，國人所獲得的經驗與外來科技已有不少。其部份成果乃可應用台灣，搞出一些成績來。

日昌亦沒有忘記台灣傳統的名礦產硫磺可作爲

火藥原料的重要性。他企圖統產統銷硫磺於大陸各省。光緒三年，特命葉文燾在產地立「碑界」布告禁止民間私製外，亦復廉價收購已成的私製品。他試算，藉收購統銷可獲得一千一百兩利潤，準備轉此利潤為資金並策劃建設新式工廠。

丁在福建巡撫（當然兼管台灣）任內（光緒二年至六年），除了力圖在台開展新式產業；例如開採煤炭、石油等等外，他曾對台灣的茶業和樟腦業亦作了初步的調查（註52）。

岑毓英於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年）接了丁日昌的棒，到任福建巡撫，直至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岑幾乎在洋務運動上未曾留下可被注目的成績來。倒是他的部下台灣道劉璈，有意發揮他精練的政經才幹。

#### 煤礦開採好景不長

令人扼腕的是，唯一稱得上振興產業成功例的煤炭開採，好景却不甚長，在劉璈到任（光緒七年）時已陷入於經營不振。

其原因概在於，相沿成習良久的官吏之腐敗、貪污以及無能。有關掌管官吏，不但虛報收支，還「私銷」中飽私囊。偷懶且無能的官吏們，當然無法策劃運銷體系和拓展新市場。出了坑道的煤炭只好堆成爲煤山，存貨的增加必然地導致開銷之累增。因而形成經營不振的惡循環，悶悶累積重重便難於克服。

單就存貨的實況觀之，正如劉璈奏云：「煤井全年所出之煤，不下百萬石之多，除船政局搭銷少許，各輪船銷亦無多，現積四十餘萬石，尙在待銷。」（註53）明示給我們，當年，年產量的三分之一已堆成煤山，無法銷出。

劉又云：「刻下日本、英、美各國之炭，銷於上海、香港各口者數十倍於台灣。查上年上海一口，銷英煤一萬八千噸，日本炭四萬四千噸，台灣煤四千噸（註54）。」足見台煤在對岸大陸市場居於極爲不利的地位。對於因台煤的銷售不佳和存貨累增所造成的損失，劉璈亦嘆云：「台北礦……該礦只開一處，每年已見煤百數十萬石，能值銀二十餘萬元，局用不過數萬兩，徒以存煤不銷，籌銷而未得其道……是本有大利，而轉爲大害（註55）」。

劉將台煤滯銷之原因，歸咎於「地」（認雞籠位於僻遠之地，往來商船過少）和「商」（有信譽

剛問世不久的「初生之犢——台煤產業」却怕虎。這隻虎名謂西方帝國主義，動用「魔爪」準備把中國資本主義的「幼苗」捏死在搖籃。「魔爪」之一就是控制關係，藉以阻礙台煤銷售大陸。

的大商行不願經銷台煤）。他雖受歷史的限制因而認識有其局限性，但劉的認識時務頗爲不足且不夠精細明確却是事實。

本來，大陸洋務運動所創設且較近於台島的有江南製造局、馬江船政局、上海機器局等。其實這些新廠局與有關船隻所需燃料的煤炭量，超過台煤的總產量綽綽有餘。只要煤價適宜，「地」不至於成爲問題才對。

阻礙台煤銷售的主要原因，決非在於劉璈所指的「地」與「商」。

#### 台煤銷不出去的原因

我們認爲，第一，當年的洋務運動缺乏全國通盤性的策劃與領導。北洋派和南洋派各搶其山頭。

第二：台灣既因地理的位置而不屬於洋務派主流的北洋派勢力圈之內，但它又無法得到「鄰近」南洋派地盤的支援。日見衰退的湘系，已無法醞釀催生「南洋派」勢力圈的氣候。很不幸地，台煤陷入了「北洋派」勢力圈和未成熟的「南洋派」勢力範圍的夾縫困局中，難於尋出「生機」以培養剛問世不久的「初生之犢——台煤產業」，是不難想像的（註56）。我們的「初生之犢」却怕虎，這隻虎，名謂西方帝國主義。這隻虎，動用種種「魔爪」準備把中國資本主義的「幼苗」捏死在搖籃。「魔爪」的一種就是控制關稅。束縛了中國人的自主權利。

我們該知道，阻礙台煤有利地銷售大陸的最主要的因素確是關稅規定。誠如「請減出口煤稅摺」中所云「洋煤每噸稅銀五分，土煤每擔稅銀四分，

合之一噸實有六錢七分二厘，若加復進口半稅，已合每噸銀一兩有奇，盈絀懸殊至二十倍之多（註57）」。本來土煤需要負擔關稅已失常理，不僅如此，它還得負擔洋煤者的二十倍，洋煤因而能夠保持其絕對優越的地位，理由連稚兒亦可明察的，有何值得我們去添描蛇足。

我們相信，劉璈者並非不知其實因。很可能他已體認到關稅規定者所牽涉的國際關係非淺，區區小官有何可言及，因而迴避談亦說不定。

劉璈推出了「節糜費」、「禁失耗」、「足器用」、「廣銷用」等四大方針，力圖三年內和緩其經營的危機，但效果却不鮮，距克服難題亦甚遠（註58）。

我們很可以肯定，劉璈對改善台煤運銷及經營不振的「善意」和努力。但我們亦不得不指摘，劉的確未能明察問題的本質，他所提出的上揭四大改善方針，充其量也不過是枝葉末節的小「功夫」而已。我們又可以假定，劉為一位能力甚強的清官，但他的屬僚却很難保證，都免疫於晚清時期的官場各種陋習。他可能因而得不到合作，不易發揮他為改善而下的多種努力。我們又知道，道台所掌的權力本來就極其有限，加上劉璈亦未能與東南各省洋務運動的首腦們建立起友善且富於協調的人際關係，當然這些又間接地削弱了劉璈的權限和能力。迫使他難於收到預期的改善效果。

#### 建議創設軍火工業

迨至光緒九年（一八八四年），劉道台為了圖備情勢緊急之需，他又建議創設「修配鎗礮火藥局」。以圖製造台、澎兩地所需彈藥及鎗礮。新設工廠在藍圖上當然又包括有修配鎗礮的項目。

但因所需資金龐大且找不出適當的人才來督辦，退而求其次，於同年臘月二日改奏創設「火藥廠」（註59）。

#### 台灣洋務運動也倡議「民需」產業

在台初期洋務運動，正接近尾聲時，自島外飛進來，有關「民需」產業部門的洋務倡議，倒叫我們非留意探討不可。那就是光緒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公元一八八五年二月七日），洋務派大員之一

的左宗棠與閩浙總督楊昌濬聯名提出「試辦台糖遺利以濟餉源摺」，建議派遣製糖技術人員前赴美國，購買新式製糖機器及招聘外籍工程師，以求改革製糖，特別期待能藉機引進精製蔗糖方法。左等準備等待中法戰爭結束後在台實施（註60）。

這個有關製糖方面的洋務倡議與前述台灣商業資本家沈鴻傑的嘗試，是有其不謀而合的「時代胎動」在。

誠如前述，沈某從德國引進製糖機器，在新營嘗試改良製糖方法（遺憾的是，我們無法確認其確實時期，但自文脈觀之，與左等倡議大約為同一個時期）。沈的嘗試與左之倡議，我們都不該忽視它給中國近代甘蔗糖業史帶來的重大意義。

#### 台灣的洋務運動比大陸者晚十五年

探討迄今，我們可以得知，台灣的洋務運動比起大陸者，大約要晚十五年左右。其原因不外是，台灣位於南海邊疆之地，清廷有關人員亦遲遲未能洞察，圍繞著台、澎兩島的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的緊急新情勢及重要性。

惟，沈葆楨、劉璈等在台推行初期洋務運動的官員們，由於有較長的時間來觀察並作實地觀察調查，故似乎對台灣經濟的潛在力量有所掌握和認識。

儘管如此，但他們一只有需遊說清廷中樞當權派，以便推動洋務運動的實際工作時，他們通常亦只好藉「台灣為東南七省的門戶，因而地位特別重要」云云為口實（註61）。或者是，站在支持南北洋務運動為重點來強調。誠如「萬一台灣為彼（指外來勢力）所襲，地大物博，取多應用，凡我欲為不得者，彼皆為所得為，南北洋務將無安枕之日，是誤台即誤國矣，由辦之不早辦也（註62）」云云，只把台灣放於次要或是附屬地位來主張並說明情況。

至於專心致力並忙於確立北洋勢力圈的李鴻章，當面臨「牡丹社事件」的緊急驚慌失措狀態時，特命派遣洋務派的幹員黎兆棠為「福建署理台灣道」以協助沈葆楨。但日軍自台撤出，一俟「牡丹社事件」塵埃落定時，旋即召回黎某另就「津海關道員」（北洋洋務的要職）（註63）。這一招，無疑是印證北洋派頭頭李鴻章，不但有意輕視台灣洋

務，根本上對台灣洋務並不具有任何長遠計劃。李等北洋洋務派人士，乃可以輕視台灣的存亡，但絕不能讓他們北洋派的「生命線」=北洋，和京畿受到任何威脅。

---

### 初期洋務運動的兩種特色

---

---

#### 台灣洋務運動的財源

---

再者，對如何確保洋務的財源時，駐台官方則有如下主張。「且固台防必練兵，欲練兵先濬餉，籌餉款於內地，利有時竭，不如開餉源於台灣，利可無窮（註64）」，或亦云「不特山前已闢地方，可期整理，即山後山中似闢未闢各區，墾務、礦務、材木、水利等項皆利源所賴。開辦得法，則農、工、番、漁皆足寓兵，亦皆可籌餉（註65）」。說的真堂皇，邏輯亦不能說不夠分明。問題却在當年的官場是否有人才，有組織，有能力，有魄力，把上述見識與方針附諸實施是為關鍵。事與願違，晚清的無能官僚，上書是一套，實做又是一套。他們既沒有耐心亦缺乏信心去求開「源」的治本作法。他們的實施僅止於治標却是真實。所求者不外是姑息捷徑的方式以索取他們所要的財源。

在台清廷官吏，第一著就是向台灣鄉紳伸手籌捐，第二著便立碑禁止民間利用土法私製硫磺，並廉價收購私製硫磺成品以求開源。

當局另亦藉官辦洋務為口實，多方阻礙民間自力在傳統產業求發展的各種企圖，好似自力依土法開採煤礦等等事業（註66）。

值得我們留意的另一件要事是，當時似乎並沒有實施，直接對農民增加課捐的政策。這一舉可能是面對外來侵略的緊急，於不得不優先考慮防農民反抗，以先求島內治安而所作的施策所致（註67）。

在台的初期洋務運動，如上所述，其具有兩種特色。一為：由官僚主導和獨占。二則：洋務的推進帶來了抑制民間土法傳統產業的進展。不過洋務實施於煤礦或石油礦的探採時，附帶地引進了西方近代科技，我們不該忘記這些新科技都是先於大陸諸省洋務的第一招。這一點確實具有其歷史意義值得我們後人肯定。事實上，引進來的採煤新技術，後來成為開採大陸開平煤礦的先進楷模（註68）。

復次，洋務運動在台的初期嘗試雖帶有軍事色彩，但多亦具「民需」側面。換句話說，它甚容易轉換為民生產業或同時成為「社會資本」活用的一些先行投資。這一個側面比起純軍事工業的創設對日後民生經濟的開展，含有不少潛藏的促進因素。

電報線的架設，先是軍事利用，日後當然可轉為產業經濟資訊的傳達網來活用是個「社會資本」的典型例子。煤炭、石油的開採，當年的主要供給對象當然是有關軍需部門。眾所周知，煤炭、石油概為近代工業的重要動力源。至於所引進的有關開採的新技術，只要承接有人，當然亦可以轉移變為「民需」部門以及其他民生有關產業部門來活用。

這一段期間，在台洋務運動雖還未能見到「官督商辦」方式的推行，但有關近代製糖技術的引進，必然地將給民間商人、商業資本家——特別是經營茶葉、樟腦、砂糖外銷的商人、商行——帶來正面的「刺激」（INCENTIVE）。

這一種「刺激」往往亦可轉變為「觸媒」，再給台灣經濟鼓起一種新的風氣。

---

註：

4 2：參照前引「台灣通史」第六冊，列傳各項目。

4 3：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編輯室編「洋務運動」第六冊，三二五頁，劉銘傳；「劉

壯肅公奏議」（台灣文獻叢刊第二七種）第二冊，二五六頁。再者，劉指為同治一〇年，唯據「洋務運動」之文脈可判定為一二年，有待考證。

- 4 4：參照沈葆楨：「福建台灣奏摺」（台灣文獻叢刊第二九種），「請移駐巡撫摺」條，一～五頁。
- 4 5：參照前引「洋務運動」第七冊，六七頁。
- 4 6：前引「福建台灣奏摺」一三～一四頁。
- 4 7：同上，五九～六〇頁。
- 4 8：參照同前「洋務運動」第七冊，七二～七四頁。
- 4 9：參照孫毓棠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下冊「台灣石油礦的試探」條，五九三～五九七頁。
- 5 0：參照 J. W. DAVIDSON, OP. CIT., P. 481。
- 5 1：參照前引「洋務運動」第六冊，三三四頁，同「台灣通史」第三冊，五三四頁，同「台灣文化志」中卷，八〇〇～八〇一頁。
- 5 2：參照「洋務運動」第七冊，七〇～七五頁「光緒二年八月二四日閩浙總督文煜等奏」，「光緒二年一二月一六日福建巡撫丁日昌片」，「光緒三年三月二五日福建巡撫丁日昌片」等。
- 5 3：劉璣著「巡台退思錄」（台灣文獻叢刊第二一種）第一冊，「致上海招商局唐觀察煤務由」條，三三頁。
- 5 4：同上「詳論煤務屯銷利害由」條，三六頁。
- 5 5：同上同條，三五頁。
- 5 6：「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下冊，六五四頁所收錄的「益聞錄，光緒八年十月十五日」條，略謂：「津友來函，言近日開平煤窰因中國人欲速見功，開至三十丈即行停止，故日僅出煤五百墩，不敷中國各輪船機器製造局中之用，是以當事諸君擬再添開一礦，相助為理云」，可知在洋務運動展開過程中，煤礦不足，但台灣不屬於北洋主流派的勢力範圍內，故其市場受限制。再者，上引書下冊，六五五頁所收錄的關冊一八八四年分（下篇，頁一六～一八，天津）云：「日本煤『入口』大減，原因由於開平煤礦產量漸增……」，可見逐漸給予日本煤打擊是由於在李鴻章主持下的招商局使用開平煤為輪船用煤，因此開平煤礦能發展且景氣進佳也。
- 5 7：參照「洋務運動」七卷一四〇頁，「請減出口煤稅片」。
- 5 8：參照前引「巡台退思錄」第一冊「致上海招商局唐觀察煤務由」條，三二頁和「籌銷論」三九頁。劉自光緒八年二月（舊曆）至光緒九年四月之間，為改善煤礦經營，提出多達二三件之文書。
- 5 9：參照同上引書第二冊「稟請設立修配鎗礮藥局由」條，一〇〇～一〇二頁和「稟籌商先設火藥廠次再擴充情形由」條，一〇二～一〇四頁。
- 6 0：前引「洋務運動」第七冊五七九～五〇八頁「試弁台糖遺利以濟餉源摺」（光緒一〇年一二月二三日，會同浙總督楊昌濬已革巡撫張兆棟銜）。
- 6 1：前引「福建台灣奏摺」、「請移駐巡撫摺」條四頁有云：「況年來洋務日密，偏重於東南，台灣海外孤懸，七省以為門戶，其關係非輕……」。
- 6 2：前引「巡台退思錄」第三冊，「稟陳台防利害由」條，二五六頁。
- 6 3：參照李鴻章著「李文忠公選集」（台灣文獻叢刊第一三一種所收）第一冊，「保黎兆棠補津關道摺」條（九三～九四頁）。
- 6 4：前引「洋務運動」第七冊，「光緒二年八月二四日閩浙總督文煜等奏」條，七二頁。
- 6 5：前引「巡台退思錄」第三冊，「稟陳台防利害由」條，二五六頁。
- 6 6：根據上引書第一冊，「籌銷論」（三九頁）所指出，民煤之移出將妨害官煤之銷售一事，可以類推。
- 6 7：參照同上引書「稟復兩飭調移山後勇營加招土勇並勸捐城工兼另勸紳捐助防務由」條，二二四～二二八頁。
- 6 8：參照，前引「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下冊，六二七～六二八頁，「直隸總督李鴻章批」條云：「著照所請，先在磁州台灣試辦，派員妥為經理等因……徒以磁州煤鐵屢次委員往查，運道艱遠……因而中止。台灣開煤已照洋法辦，直境函應仿照試行……」可以推知。



民主大家來 民主大家來 民主大家來 民主大家來 民主大家來 民主大家來 民主大家來

民主大家來

民主大家來

民主大家來

民主大家來

民主大家來，台灣是大家的台灣。「民主台灣」竭誠歡迎讀者來信，討論已發表文章的內容，刊物的編輯方向、個人的讀後感，以及對時事的簡評，等等。

您不必洋洋灑灑寫一大篇，也不必有什麼寫稿經驗。只要心中有所感觸、有所思慮、有話要說，那就儘量提筆寫下，就像是寫封信一樣，寄來給我們。

如同所有來稿一樣，來信歡迎用筆名。但請附聯絡住址、電話。編者了解客觀存在的顧忌，會慎重處理，絕對保密。來信請寄：OSDMT P. O. BOX 53551, CHICAGO, ILL 60653。

民主大家來 民主大家來 民主大家來 民主大家來 民主大家來 民主大家來 民主大家來

# 再談 了解中國

李哲夫

## ——與 林中平先生對話

林中平先生對「台灣人民」與「了解中國」提出四點感想與意見（民主台灣，32期），的確是有心人的反應。在討論這些問題時，大家容有不同的觀點，短期內我想不容易達成簡單的結論。以下，我僅就林先生提出的四點，分別澄清我個人的管見，並無意採取「辯服」其他看法的態度。

（一）「台灣黨外為什麼不談中國問題的一主要原因是政治禁忌……」。在本年七月初的討論會上，參與者都有此一認識。當時有人用到「失敗主義」來形容台灣黨內、外的「恐共」現狀，也許此一用詞，稍嫌強烈。但是一

個共同的認識即是，台灣黨外在島內爭取參政，「中國問題」是台灣前途不可忽視的重要題目，如果黨外只能停留在「蜻蜓點水式的談到中國共黨……」顯然與問題本身的重要性不成比例，黨外的民主要求的層次，則仍受制於執政國民黨的理念框框，被動地侷限自己論政的主題。認識「政治禁忌」的存在，並不等於接受禁忌的現實，黨外人士以往的成就最好的測量標的，就是逐一突破現存的「政治禁忌」。林先生對此一看法應能同意，因為他的大作「黨外只需操心人權嗎？」（民主台灣，31期）就針對黨外人士必需擴大他們的政治視

野，提出有力的呼籲。這裡可以指出，林先生的不同意見，關鍵在於他對「中國問題」的評價。他說：『畢竟，如果台灣黨外在政治、經濟、社會鬭爭上有了決定性的突破後，「中國問題」自然會提上議程……』含意就是，對台灣政治、經濟、社會提出主張，可以排「中國問題」於考慮之外，這樣的看法涉及評價問題，林先生在討論他其他三點意見裡也多多少少，基於此一評價。我將在討論其他三點時，回到這個關鍵問題上。另外，我還要談談黨外人士的「人格」問題上，即林先生的第一點主題之一。我想林先生對黨外「人格」的形容

注目在所謂「掌權」的黨外人士上。如果把台灣黨外的民主運動，看成是隨時間轉移的過程，則台灣黨外的「人格」並不定於一種型態，也不應該停留於某一段期間所形成的人格特性。當「中國結」與「台灣結」的爭論泛濫時，最不願意參與此一臨近「政治禁忌」的討論者，便是黨外「既得利益」者，已經定型的一種「人格」。新一代將要崛起的黨外人士，必也感到，如林先生所提倡，擴大政治視野的必要。他們面對的挑戰，就是衝破仍未解除的政治禁忌。相對之下，黨外前輩忙於穩步在前期鋪下來窄狹的一條政治地氈上，已經失去領導所需的衝刺力。並且，現實上，可以增補立、監委員，國大代表的黨外人士，遠超過慢慢凋零的佔位者。新生代能有多少信心，全盤賭注在「體制內」玩「音樂佔椅子」的遊戲？「台灣結」與「中國結」的討論，事實上已經試探性地把「中國問題」提上了議程。更甚者，在台灣以「第三世界」的概念，討論台灣過去，現在及未來的國際地位者，也遠超過拿此一名詞當政治時髦的小圈圈。較為慎密的學術探討而涉及「現代世界系統」的論說模型，也正方興未艾。

(二)關於「第三世界」的概念，林先生分開「一般性的意識形態」與「策略問題」之別。其實，「第三世界」一詞有時僅用來指經濟尚屬落後國家，我不清楚林先生指的是否這樣一個「一般性」概念。如果按照較政治性的用法，「第三世界」則指那些不與美國及蘇聯為中心的兩強權集團認同結盟的國家。這後者的觀

念既是「意識」的也是「策略」的。因此，已經充當美、蘇任何一方的「衛星國」，即使是窮而落後，也應從「第三世界」分出去。林先生把「台灣人民」「南韓人民、菲律賓人民、東南亞人民、還有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智利等人民」，特別把人民與這些地方的政權劃分開來，大概也就是循這麼一個定義吧。這裡他的假設是「人民」並不同意與當前的世界二強權結盟，甘為他們的「衛星國」吧！？但這個只是理論上的假設，仍需相當小心地與事實相求證。就以台灣當前的意識及策略上的紛爭來說，台灣人民的那一部份屬不屬於第三世界就不很容易確定。台灣當局的國民黨政權，清楚地作他們的抉擇，其生存之道，唯有抓緊作美國衛星國這一途，所以才會有台灣「防衛地位重要性」的強調，才會有「美國放棄台灣及放棄自由世界」的政治宣傳。其實，大多數充當世界強權的衛星國政權，如南韓、菲律賓及南美洲一些國家，他們有共同的「主子國」但他們之間從未建立彼此間共有共榮的根本基礎。這些政權的角色可比擬殖民時代派在殖民地的督府官員，他們在當地的政權也靠他們對殖民母國是否能效勞而定。林先生認為此「中國經驗」更為切身的是「第三世界的另一批伙伴」。若指的是這些「在歷史經驗，世界政治經濟大結構下」產生的衛星政權，則我要問，為什麼台灣至今未能腳踏實地與「南亞國家聯盟」或南韓或菲律賓等建立有效的結盟關係？若林先生指的是第三世界的人民伙伴，欲與他們交換爭民主，

反壓迫的鬭爭經驗，則為什麼對同文同種的中國人只能「深深祝福中國人民能夠爭得真正的自由民主」？林先生又說「十億人的大形象也絕不必然使台灣對之懾服。」當然，懾服了就變被動，迴避問題。面對問題，提出可行的辦法，正是不被懾服的表現。對於台灣「非軍事化」的討論，也只不過是關心台灣將來，而心理上不被「懾服」的年輕一代人，開始深討問題的一個起步。我想，台灣將來與第三世界人民，即拒絕充當強權衛星的不結盟立場的人民，站在同一陣線上，「非軍事化」之類的問題會更形重要。而中國共產黨是以「反霸」為其基本的國際外交政策，展望台灣未來的命運，為什麼一定要自限於與「第三世界中另一批伙伴，交換經驗呢？

(三)對於台灣的軍武問題，林先生很快地進一步討論「海空軍的軍事化」與「陸軍的非軍事化」，而忽視「台灣這條小老虎的力量以及它背後的撐腰人」。言下之意，好像軍武是一種中立的存在力量，誰要用它就可以隨意支配似的。我們怎能忽視今天台灣政權仍擁有任何有效軍武力量，或用此一力量來把持台海對峙現狀者，絕不是台灣人民所能「指揮」的呢？再進一步，看美國佈署全球戰略的情況，過去三十多年，既使在台灣的國民黨政權一廂情願，美國在台灣地區也逐步削減她自己的負擔，由美軍直接進駐到供應台可防禦軍武是以售購的方式進行之。本來國際商務貿易就是跟隨着旗幟，軍武的交易更是受戰略權宜的影響，遠超過自由市場競爭的原則。至目

前為止，美國仍公開地表示「維持台海地區的安定」政策是與美國利益一致的。當然台灣當局以及不少「局外人」希望這個政策無限期地延續下去，因此造成目前不少「奇異的配偶」式的妥協合作跡象。我擔心的是，美國的戰略佈署一旦有其他新安排而能達其最佳利益時，這些「當局」與「局外」人士是否也要緊跟美國的新政策路線「放棄」台灣呢？這問題引起我一個小小的建議，當台灣島內的黨外人士及海外關心團體等談論「台灣結」與「中國結」這些台灣近代史特殊的產物時，是否也應該正面討論「美國結」為同一個時空下的歷史產品呢？這是一個相當複雜不容易剖析的主題。不過簡單的一個推論是，如果「台灣結」與「中國結」是感性重於理性的意識，「美國結」也是個相當類似的東西。圍繞着這些「結」的問題作出發點，恐怕不是解開「台灣問題」及「中國問題」這個「死結」的關鍵辦法。

最後，林先生對「主動與中共接觸」的觀察，是相當接近事實的。我只提出有短的另外一點：要「主動」接觸溝通，我們要能與諸如前面三點問題連串起來。如果台灣人民對目前台海兩岸問題不能在基本立場及政治視野上，突破國府當局的理念框框，如果與中共接觸交流的場升不能發揮啟蒙新方針新政策，而僅僅停留在抗議性的反應，則我們在「中國問題」的爭論，不足以自稱「主動」。

讓我回到前面曾提及「評價」問題來結束這已經嫌長了的覆信。對於一些設定的前題，日積

月累而不去質疑，往往成為人們「評價」事物的潛在基礎。前面第二點林先生似乎相信「中國問題」與台灣未來無重要關係，第三點，林先生相信台灣目前的有效軍武力量可以不定期地維持下去，而第四點，相信中共對台政策是由看不見的一隻強手在後面指定。在台灣特殊的政治教育及環境下，這類問題都是超乎人民權利之外的「國策」大題目，不容質疑的。我們在不知不覺裡承認對此類問題無能為力，也不知

不覺接受了某些定論的「真實性」。記得約二十年前，西方的宗教信仰曾受一本著作題為「上帝之死」的危機性的震撼。當人們把自己未能掌握的事物，丟之腦後，歸諸於對「萬能」的信賴時，若有人提出這個信賴根源的本身也在動搖時，人們當會有激烈的反應。可是當感性的反應退潮時，人們會發現某些事物過去因為無能為力而寄托給萬能主宰，已經轉入到自己抉擇的責任範圍之內，我們對這一點是樂觀的。

## 建家

### 「黨外要照鏡」是「鳥文」

編者先生：

“民主台灣”32期，寧人先生“黨外要照鏡”一文，說到李教的“鳥相”，使人覺得十分不舒服。

我不知道漢語中居然有“鳥相”這樣的詞彙，也不知道“鳥相”真正是什麼意思，但顯然這不是好的字眼。用這樣的字眼來形容李教，而沒有提出任何證據，這不但是人身攻擊，而且是十分下流的謾罵。

李教的議論，我們容或有不同意的地方；但是他的戰鬥精神，是應當肯定的。他的這種勇氣，正是許多可以回去，却躲在海外高喊民主台灣的人，所該深深慚愧的。

寧人先生用這種下流的詞彙來形容李教，我們感覺是“莫非寧人是個鳥人，否則怎麼寫這種鳥文章？”不知寧人先生覺得怎麼樣？

—讀者

## 寧人的答覆

編者先生：

要感謝「一讀者」先生的來信，讓我有機會知道我那封短信竟引起如此的誤會。

我很同意「一讀者」先生對李教的評價。事實上，我個人對李教的貢獻與才華一向是十分欽

敬的。拙信說「……（李教）的獨特洞察力與學問，是多年不倦的努力工作形成的……」可以證明我對李教並無不敬之意。如果「一讀者」先生再仔細看過拙信，當會發現文中並無批評李教之意。拙文的要點只在批評一些想

學李敖表相的人。「一讀者」先生誤解了。

誤解的原因當然來自「鳥相」兩字。「鳥相」是近幾年在台灣年輕人間流行的一個俗語，其真義不易說清，大約類似「神氣」。當我們說某個人很「鳥」，通常意指那人因有某種特長而顯得很神氣或自負。

李敖才氣之高與自負之深是人盡皆知的。在台灣圈子的朋友（特別是年輕人）便常以「鳥相」來形容李敖。李敖聽了，不僅不以為忤，反而十分得意。這個

在台灣相當流行的用法，被我借用來海外，却不料引起這麼大的誤會。

未注意到海外讀者對台灣新俗語的陌生，不加註解便採用，這是我要向「一讀者」先生及其他誤解的讀者們抱歉。

然而，拙文即使「鳥相」一詞用語不當，全文並無攻擊李敖本人之處。「一讀者」先生却得了「人身攻擊」的結論。從這裡似乎看到爭紛容易發生的一個原因：人們太容易只因一、兩個字詞便引起出許多判斷。爭論往往

由於形式外表之能夠接受與否，而不注意實質內涵是什麼。或許，在推進民主運動之時，也要培養一些幽默感。

最後，不論「一讀者」先生作出怎樣的判斷，他勇於將他個人意見表達出來，讓別人有機會解釋或檢討，這是筆者深為欣賞的態度。請編者代轉這個心意與感謝。

寧人 上

1983年12月15日

### 民主台灣訂閱單

訂閱「民主台灣」\_\_\_份共\_\_\_期  
(每份每六期10元)請寄下址：

1. 自\_\_\_期至\_\_\_期

姓名：\_\_\_\_\_

住址：\_\_\_\_\_

\_\_\_\_\_

2. 自\_\_\_期至\_\_\_期

姓名：\_\_\_\_\_

住址：\_\_\_\_\_

\_\_\_\_\_

3. 自\_\_\_期至\_\_\_期

姓名：\_\_\_\_\_

住址：\_\_\_\_\_

\_\_\_\_\_

贈閱一期給

姓名：\_\_\_\_\_

住址：\_\_\_\_\_

\_\_\_\_\_

以上共訂費美金\_\_\_\_\_元。

我願捐款美金\_\_\_\_\_元。

支票寄：OSDMT

P.O. BOX 53551

CHICAGO, ILL. 60653

Organization for the Support of  
Democratic Movement of Taiwan  
(OSDMT)  
P.O. Box 53551  
Chicago, IL 60653

Return postage guaranteed

Nonprofit Org.  
U. S. Postage  
PAID  
Chicago, IL  
Permit No. 3293

5149  
ST. #2  
IL 60615